

二〇二一  
秋季号  
复八十七期

87

# 清华校友通讯

87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秋二〇二一年



清华校友总会

CN 10-1674/G4  
ISSN 1006-7663

传播母校信息  
报道校友业绩  
联络校友感情  
弘扬清华精神



ISSN 1006-7663  
刊址 清华大学同方部  
电话 010-62792246  
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定价 20元





◀ 清华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院



▶ 高温气冷堆碳中和制氢  
产业技术联盟在清华成立



◀ 第五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  
在清华大学召开



▶ “栋梁——梁思成  
诞辰120周年文献展”  
在清华大学开幕



▲ 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主楼举行



▲ 清华附小学生代表献花



▲ 杨振宁讲话



▲ 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世纪物理情在清华大礼堂举行

庆

贺

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

# 清华校友通讯

二〇二一  
秋季号  
复八十七期

*Qinghua  
Xiaoyou  
Tongxun*



- ◆ 与党同龄的“百岁国宝”王希季
- ◆ 青海缺氧，但不缺清华人的奋斗精神（靳力）
- ◆ 学术生涯的三次选择（隋森芳）
- ◆ 朱凤蓉 张利兴：大漠里走出的“将军夫妻”
- ◆ 彭珮云的清华园岁月
- ◆ 许渊冲：一生“诗舟”播美，百岁仍是少年
- ◆ 郑哲敏口述：我的留学和回国经历
- ◆ 影响和改变我的清华体育（史宗恺）

清华校友总会 2021 年 10 月

清华大学校友通讯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87

复秋二  
八〇  
十季二  
七  
期号一



刊 址 清华大学同方部  
邮 编 100084  
电 话 010-62792246  
投稿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 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国内刊号 CN 10-1674/G4  
国际刊号 ISSN 1006-7663  
发 行 清华校友总会  
印 刷 北京精彩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定 价 20 元

1934 年创刊 1980 年复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  
编辑单位 《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出版单位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委员会 华建敏 贾春旺 李蒙 方惠坚 贺美英  
柳斌杰 王凤生 胡显章 叶宏开 庄丽君  
万俊人 白永毅 钱锡康 徐心坦 田芊  
周家憲 孙哲  
编辑委员会 史宗恺 向波涛 唐杰 宗俊峰 覃川  
周明胜 范宝龙 胡钰 杨士强 李军  
郭谦

刊名题字 刘达  
名誉主编 贺美英  
主编 史宗恺  
常务副主编 袁浩歌  
执行主编 宋述强  
副主编 杨帆 黄文辉 解红岩  
编辑 田阳 任风远 张昕

订阅金额 中国内地 80 元 / 年、200 元 / 3 年，港澳台 160 港币 / 年  
国外 40 美元 / 年

线上订阅 “清华人”小程序认证校友可通过【校友服务—期刊订阅】  
在线订阅



邮局汇款 收款人 清华校友总会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100084)  
现场订阅 清华大学同方部  
发行电话 010-62782238

# 目 录 *Contents*

## 党旗下的清华人 ——————

- 7 与党同龄的“百岁国宝”王希季 / 赵 聰
- 12 党龄 83 年 107 岁的马识途：入党宣誓时的许诺都实现了！ / 张 杰
- 13 把理想信念扎根于祖国大地 / 邓焕彬（1987 级水利）
- 17 华能首批电厂建设者张铭——“铭”记我心，不忘来时路 / 李昕葳
- 20 青海缺氧，但不缺清华人的奋斗精神 / 靳 力（1999 级计算机）
- 23 我和“于都富硒米”的故事 / 陈 聪（2009 级经管）
- 26 杨孟飞校友获得首届航天功勋荣誉称号 / 宗 和

## 今日清华 ——————

- 27 3800 余名本科新生、9000 余名研究生新生入校报到 / 新闻中心
- 28 清华研发 领跑世界——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首次临界 / 田姬熔
- 29 联合国委任薛澜教授为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委员 / 公管学院
- 29 庆祝建党百年 清华积极参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 新闻中心
- 30 清华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院 / 吕 婷
- 清华之光
- 31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学生团队荣获第十届全国海洋航行器大赛特等奖  
/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 31 徐建鸿教授荣获 2021 年度“亚洲杰出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师奖” / 化工系
- 31 我校学生超算团队获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ISC21）总冠军 / 计算机系

## 我与清华 ——————

- 32 学术生涯的三次选择——写自我在清华大学工作五十年 / 隋森芳（1970 届精仪）
- 34 我与学弟王玉明院士的情缘 / 梁 肃（1964 届精仪）
- 37 有缘精仪系 难忘精仪系 / 田 芊（1970 届精仪）
- 40 我和《清华校友通讯》的四十年 / 郑文会（1959 届土木）
- 43 三代人三十年的清华缘 / 高乔·布尔根（2003 级博，化学）

## 清芬挺秀 ——————

### 榜上有名

- 45 清华校友助力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任务
- 46 杨倩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 清华校友逐梦奥运 勇立潮头
- 48 大漠里走出的“将军夫妻” / 颜维琦 刘宇航

51 罗绍基：坚持改革创新 情系水电人生 / 卢 鉴 陈 婧

53 吴硕贤：理纬文经织锦成 / 黄蓉芳 龙 锰 叶作林

55 潘毅：全球视野与中国情怀 / 李 静 张 超

59 坚持成就梦想 细节决定成功

——在 2021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 夏德明 (1998 级电机)

61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在 2021 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 吴蓓丽 (2001 级博, 生物)

## 紫荆花开

---

63 壁越厚，越要向星辰大海去破

——访在甬创业清华校友 / 陶天野 张 霞 (2019 级新闻) 熊星玥 (2019 级外文)

70 “我在大学拍《大学》”——访电影《大学》导演 / 张 敏 董鲁皖龙

## 名家轶事

---

73 我为父亲抄书稿——钱穆先生《读史随劄》的写作与出版 / 钱 行

76 黄钰生：教泽遗爱永留西南边疆 / 刘六生 宋文龙

79 吴仲华任职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拾遗 / 顾金亮

81 彭珮云的清华园岁月 / 钱 江

83 原子弹爆炸前的“三人签字” / 黄 萌

## 校友联络

---

85 清华大学第二十三次校友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 关 悅

86 第四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在线举行 / 校友总会

87 陈旭出席 2021 年清华大学广西选调生座谈会 / 广西校友会

87 过勇赴贵州访问并看望慰问校友 / 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88 “清华校友君子文化传承发展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 君子文化项目组

89 量子科学挑战认知 技术应用改变生活——校友学习日第 27 讲开讲 / 继教学院

89 多地区校友会组织《大学》观影活动 / 宗 慧

## 各地校友会简讯

90 海南校友会举办欢送新生活动 / 海南校友会

90 瑞士校友会举办夏季徒步活动 / 瑞士校友会

90 大纽约地区校友会 2021 线上迎新会圆满举行 / 大纽约地区校友会

90 赣州地区校友召开送新会 / 千 舟

91 2021 级天津新生座谈会举行 / 天津校友会

- 91 “石家庄清华校友之家”揭牌仪式举行 / 石家庄校友会  
91 贵州校友会看望驻村校友 / 贵州校友会

## 回忆录

---

- 92 我的自述 / 钱端升 (1919)  
97 难忘清华 / 薛传钊 (1950—1952 经济)

## 史料一页

---

- 105 清华校友的凝聚力 / 金富军  
108 庚款负笈 自强追梦——由一张留美清华同学老照片说起 / 袁帆 (1975 级建工)

## 怀念师友

---

- 114 雨露滋润 铭记师恩——纪念先师梁思成先生诞辰 120 周年 / 吴树祥 (1958 届建筑)  
119 七绝·怀念虹进同学 / 柏占山 (1972 级建工)  
120 怀念可尊敬的老领导刘达同志 / 王凤生 (1964 届水利)  
126 许渊冲：一生“诗舟”播美，百岁仍是少年 / 史竞男  
134 郑哲敏口述：我的留学和回国经历 / 熊卫民 采访整理  
142 西南联大郭旭老学长逝世 享年 99 岁  
143 怀念一位真正的好人——孙安利同学周年祭 / 张比 (1969 届工物)  
144 原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常振铮同志逝世  
145 张宁馨老学长在台湾逝世 /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145 艺术设计家、教育家崔栋良先生逝世  
145 科技部高新司原司长冀复生学长逝世

## 荷花池

---

- 146 影响和改变我的清华体育 / 史宗恺 (1980 级工物)  
148 父亲与清华体育二三事 / 何吉林 (1970 届无线电)

## 清华真情

- 151 情系清华 奋斗 60 年——忆 1955 级水利系动 01 班 / 张兆琪 张庄 (1960 届水利)

## 回馈母校

- 157 李真、张广平校友捐赠母校设立“杨振宁教育发展基金” / 基金会  
158 “清华之友——徐葆耕纪念奖学金”成立 / 新闻学院

## 诗词书画选登

- 159 秋日的荷塘 / 冯弘伟 (1988 级汽车)

- 159 花开奥运 / 易松孟 (1991 级力学)
- 159 为杨倩奥运首金题赞 / 李同振 (1970 届工化)
- 159 书法 无问西东 / 何玉如 (1962 届建筑)
- 159 诗词书法 / 袁国盼 (1970 届土建)
- 160 沁园春·登零零阁抒怀 / 雷源忠 (1970 届汽车)
- 160 清华二号楼忆 / 张云贵 (1970 级建工)
- 160 浪淘沙·郑州 / 高国龙 (2009—2011 博士后, 环境)
- 160 油画 胜因院 / 吴正毅 (1961 届精仪)
- 160 荷塘暑晨 / 金峰 (1982 级水利)
- 160 七律·赞神州奥运健儿 (平水韵) / 魏赠应 (1962 届土木)
- 160 七律·立秋感怀 (平水韵) / 魏赠应 (1962 届土木)

封面 清华园工字厅 绘画 吴冠英 设计 王鹏

封二 清华要闻

封三 庆贺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

插页 今日清华

清华大学第23次校友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校友联络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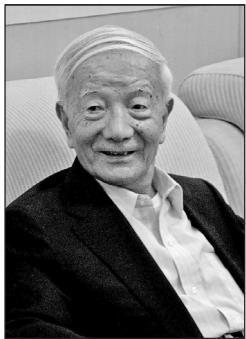
摄影 李派 曹文鹏 解红岩等

插页设计、电子排版 吴振鹏



## 与党同龄的“百岁国宝”王希季

○赵 聰



王希季学长

2021年7月26日，是西南联大1942届校友、“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学长的百岁生日。王希季学长与党同龄，作为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技术负责人、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设计者、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首任总设计师，他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9年，国家颁授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如今仅有3人在世：92岁的孙家栋，92岁的周光召，而年纪最大的就是王希季，今天满100岁，与中国共产党同龄。

### 历经辗转入航天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开启了一段叱咤风云的百年辉煌历程。也就相隔两天，7月26日，王希季在云南昆明的一个白族家庭里出生。

父亲王毓崑是商人，生意场上沉浮多

年，不愿孩子再身陷商海，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他们能学一门手艺，过一种能养活自己的平安日子。但王希季不甘平庸，从职校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入读工学院机械系。

在西南联大，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机械学大师刘仙洲先生让他吃了第一个零蛋。在一次测验中，刘仙洲先生给出题目，要求计算准确到小数点以下三位数。王希季举起计算尺刷刷算完。可后来一看成绩：零蛋，因为计算结果的小数点下三位是根据计算尺估算的。

“刘先生给了我零分，让我终身受益。搞工程的人必须要坚持零缺陷。我考试中的小数点下三位就是缺陷，如果有缺陷，工程就会变成零。”后来成为航天专家的王希季，与“零缺陷”工程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在大学时期，王希季萌生了“工业救国”的想法。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后他



王希季的西南联大学籍卡



2007年10月，王希季学长回清华参加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活动，与时任党委书记胡和平在新落成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前合影

进入兵工厂，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到了昆明的电厂。

1948年，王希季踏上了留学旅程，前往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留学。1949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取了科学硕士学位。

就在王希季准备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时，国内传来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次年3月，王希季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继续读博，他答：“从我出生时起，国家就一直在混乱中，支离破碎。我出去读书时国内还没统一，回来时已经统一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就这样，他毅然放弃了国外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一批中国留学生一起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到了祖国。

同在船上的还有华罗庚先生、朱光亚先生等人。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王希季回国后，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任教。随后，加入中

国航天。

### 射出探空第一箭

1958年，王希季所在的系被调整到上海交通大学，当他准备赴德国教学两年时，突然接到了去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的通知，承担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研制任务。

这个任务有多重要？1957年，苏联发射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3个多月后，美国将一颗名叫“探险者一号”的卫星送入了太空。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高瞻远瞩的伟大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参与研制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这支队伍，绝大多数都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人，平均年龄只有24岁，有的年轻人甚至还没毕业就拿着组织的调令报到了。

那年，王希季只有37岁，被任命为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当时设计院的研制条件十分简陋，既没经验，又没资料，也没专家，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勇于挑战的王希季二话没说，带领着“娃娃队伍”，开始了边学边干的艰苦探索。当时，控制头



1950年王希季留学归国途中，在“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上

体分离的定时钟表机构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小台钟改装的；点火装置是将普通小电珠的玻璃敲碎，取出其中的灯丝再裹以硝化棉制成的……

仅用了短短9个月的时间，由王希季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T-7M”就奇迹般地诞生了。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郊区一个用稻田改建成的简易发射场上，“T-7M”已经昂然屹立在发射架上，它的飞行高度预计为8~10公里。

发射场上没有电，隔着一条蜿蜒的小河，在用芦席围起来的“发电站”里，一台借来的50千瓦的发电机已经开始工作。由于没有任何通信设备，王希季站在用麻袋堆积起来的半人高的“指挥所”里，用挥舞的手势和大声的喊叫，指挥着“T-7M”的发射。

发射成功了！王希季冲出“指挥所”，扯开已经嘶哑的嗓子和大家一起忘情地欢呼起来。这次试验成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燃料火箭技术取得的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此后，中国的探空火箭数十次飞上天空。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熟悉探空火箭的历史。毛泽东唯一视察中国航天的足迹留给了“T-7M”。探空火箭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第一，为我国后续气象事业和航天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开创了我国生物试验火箭成功回收的先

河，也为我国以后开展载人航天工程积累了重要经验。王希季功不可没。

### 攻关“长征一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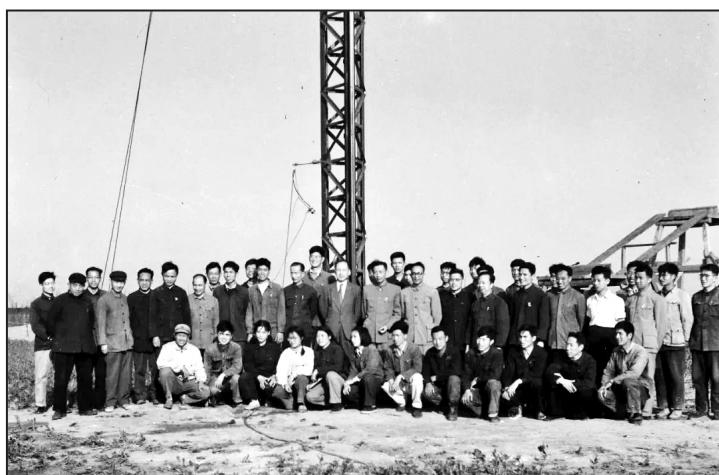
完成研制探空火箭的任务后，又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找到了王希季。

1965年，在“两弹”建设基本完成之后，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上海机电设计院承担卫星运载火箭总体任务，由上海迁至北京，正式改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

新任务中，他负责主持中国第一个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卫星上天，得靠火箭，又是一项如此重要的任务。

王希季感到庆幸。他曾经动情地说：

“作为一个专家，我不否认个人的天赋和勤奋，但是，如果党、国家和人民不交给我这些任务，我怎么可能去研制？如果不给我这些环境和条件，又怎么会出现我这



“T-7M”探空火箭发射和回收成功后，王希季、钱学森等在火箭发射架前合影

样一个人呢？”

王希季是一个头脑清醒、求真务实的人。他苦苦思索，怎么设计一个方案，既能够达到足够的运载能力，又可以节省许多研制经费，时间上也能够满足发射卫星进度要求？

他做了大量调查，在全面考虑空间、地面、材料、技术等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将导弹技术与探空火箭技术相结合，液体的推进剂火箭和固体的推进剂火箭相结合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以中程液体推进剂导弹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研制一个固体推进剂火箭作为第三级的运载火箭方案。这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

对王希季来说，用尚未研制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作为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的动力装置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它要可靠地在300千米左右高空点火，并在180转/分的条件下工作，难度非常大。

时任七机部四院副院长的杨南生说：

“至今我都非常钦佩和感激王希季！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上，敢于采用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固体火箭为第三级，需要有相当的魄力与勇气！”

1967年，按照国防科委要求，“长征一号”总体任务移交给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院）负责，王希季再次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

两年后，“长征一号”成功把“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王希季再次为国家、为航天立功。

### 返回式卫星的大总师

“长征一号”移交后，王希季马不停蹄，全身心投入新任务，研制我国首个返



20世纪90年代，王希季在卫星总装现场  
回式卫星。

当时，返回卫星研制难度之大，令很多人望而却步。王希季带领研究团队制订了几个设计方案，经过一次又一次地争论、讨论，他们最后确定了充分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能力，采用弹道式返回方式，由返回舱和仪器舱组成大返回舱的方案。这个方案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国返回式卫星的基本方案。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穿云破雾飞上了太空。当人们沉浸在发射成功的喜悦中时，王希季却提着简单的行李，匆匆地赶往卫星测控中心。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还要等待着送走的那颗卫星再听话地返回地面。有人说，那几天，他连睡觉都“睁”着眼。

三天后，天空中终于出现了那顶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在王希季看来，那是盛开在天空中的一朵最美的奇葩。伞下拽着的，就是那个让他望眼欲穿的、被大气层烧得黑糊糊的回收舱。它飘过崇山峻岭，准确地落到了预定的回收地点。

这颗卫星的回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叶剑英副主席在卫星试验结果报告上挥毫批下7个大字：返回式

卫星有功！

对返回式卫星，王希季长久牵挂。

1994年，王希季73岁，老话说，73、84是老年人的“坎儿”。当时，我国的航天事业形势严峻，不到半年时间里，连续两次卫星发射受挫。这年7月，我国第16颗返回式卫星发射，王希季简单收拾行装，奔赴大西北。发射第二天，他又赶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与另外几位老专家一起参与卫星测控和回收任务。

1996年10月20日，我国第17颗返回式卫星发射，王希季再次出现在酒泉。这是一颗最新型号的返回式卫星，由他主持制定型号技术方案。这颗卫星上的搭载物多达17类，有用于心肌观察和病理反应实验的小乌龟，有从刚出生的幼鼠脑细胞中提取的神经元，有不同品种的植物和菌种，还有一面五星红旗和一面紫荆花旗——航天人为香港回归特别准备的厚礼。

这一年，王希季已经75岁了，和大多数航天人一样，他用最质朴也是最浪漫的方式，热爱着他的祖国。

### “祖国没有忘记我”

王希季目光远大，从造火箭到发卫星，又将目光投向了应用卫星和太空资源的利用和开发。

王希季一直呼吁研制发射地震电磁监测试验卫星。“汶川地震，如果我们事先有地区连续的空间监测的热和电磁效应的图像，可能会有预报。”王希季建议将空间手段与地基监测相结合，建立天地一体化的立体地震电磁监测系统。

王希季是白族，耄耋之年，依然没有忘记建发电厂解决民族地区能源的初心。2009年，88岁的王希季与三位院士联名写

信，建议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研发百万千瓦级的空间电站，以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

王希季晚年一直倡导把太空作为国家疆域的一部分来看待。他常说：“天，中国人是有份的。在太空这个世界各国争夺的新领域，中国不仅要有一席之地，更要扩大到一片之地。”

王希季很有个性。作为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经常扮演少数派的角色。在他的一份干部考察表上，写着这样一个缺点：有时比较固执，不好商量工作。

王希季没有虚心接受，在“对组织评价的意见”一栏里郑重其事地写道：“总评价高于本人评价，谢谢。但在技术问题上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有时候少数人坚持的往往是正确的，可能我总是当这种少数派吧。”

在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利益等大是大非面前，王希季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

王希季一次又一次为国家需要“转行”，深藏功与名。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当已经78岁的他站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白发老人，为中国航天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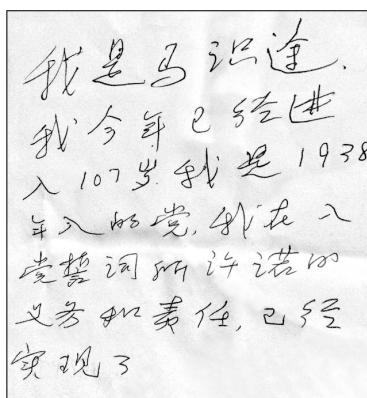
“祖国没有忘记我！”78岁的王希季突然红了眼圈。

202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五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这项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抬头写的是“孙家栋、王希季等老同志们：”。

是的，祖国没有忘记您，人民更不会忘记您。现在，全国人民一起祝您：生日快乐！

（转自《中国航天报》，2021年7月26日）

## 党龄 83 年 107 岁的马识途： 入党宣誓时的许诺都实现了！



马老手写，女儿马万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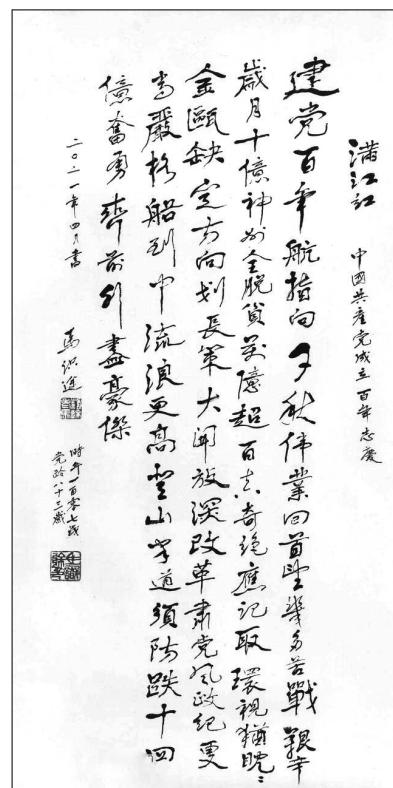
7月1日上午8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107岁的马识途早早起床，在书房里全程收看了电视实况直播。

直播里，礼炮声声，红旗飘扬，马老目不转睛。作为有83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员，走过峥嵘岁月的革命家，他岂能不心潮澎湃！

16岁的重庆少年马千木，遵从父嘱，离川北上。出夔门之时，作诗一首：“辞亲负笈出夔关，三峡长风卷巨澜。此去燕京磨利剑，国仇不报誓不还。”1938年3月，在位于汉口富源里的湖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23岁的马千木从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手上，郑重接过一份《入党申请表》，认真仔细地填好，在签名处签上“马识途”并表明：“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23岁的马识途庄严地举起右

拳，一字一句地宣誓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在七一前夕，马老还特别根据“满江红”的词牌，作了一首《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周年志庆》，并将之写成书法，在书法展览中展出。只见马老写道：“建党百年，航指向，千秋伟业。回首望，几多苦战，艰辛岁月。十亿神州全脱贫，万亿超



百真奇绝。应记取，环视犹眈眈，金瓯缺。定方向，划长策，大开放，深改革。肃党风政纪，更当严格。船到中流浪更高，登山半道须防跌。十四亿，奋勇齐前行，尽豪杰！”

时光荏苒，转眼83年过去了。如今已

进入107岁的马老看完此次直播，他心潮澎湃，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1938年，我在入党宣誓时所许诺的义务和责任今天都实现了，我无愧亦无悔。”

（转自公众号“封面新闻”，2021年7月1日，作者张杰）

## 把理想信念扎根于祖国大地

○邓焕彬（1987级水利）

邓焕彬，中共党员，199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2003年获清华大学土木系土建专业工程硕士学位，2012年获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博士学位。曾任惠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惠州市港务管理局局长、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等。现任惠州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2020年9月荣获广东省委、省政府表彰的省级抗疫先进个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已从清华本科毕业近30年。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回眸充实。

###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人生道路，总会被那么几句话深深影响着、指引着，虽历久而弥新。对我而言也深有体会，那是在35年前，1986年初，一辆破旧的大巴摇晃在山区小镇蓝塘镇通往惠州地区行署所在地惠州的崎岖山路上，车上一老一少的师生侧着身子聊了起来，“焕彬，这是你第一次出远门，我们家乡为什么穷？看看这些又陡又弯又险的山路就明白了。”“老乡都说走出杉树



邓焕彬学长荣获“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坳，就是跃出山门，读好书就是我们山里人唯一的出路。”“你读书用功，这次作为学校唯一代表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是难得的机会，相信你一定会取得好成绩，我不怀疑你的实力，这里我倒是有个问题，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你思考过没有？”学生回答说：“老师，您刚才不是说了山里人读书的目的就是要跳出山门吗？”老师笑着说：“走出杉树坳，走到外面的世界是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学好本领不能仅为自己个人的所谓事业，这是非常狭隘的观念。一定要把学到

的知识和本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才有意义，你要明白周恩来总理提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精髓所在。”老师一边语重心长，学生一边倾听并默默点头。“评价一个人的事业是否成功，并不是你有多少财富，而是你对社会作出了哪些贡献”，老师接着说，“对社会有贡献，并不是虚的概念，有很多种方式，行行出状元，做勇攀科学高峰的科学家可以，做建设祖国的工程师也可以，比如说修桥造路、修善积德，修好我们走的这条路，让更多的人走出大山，让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也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当然，要想为社会多做事，首先要听党话、跟党走，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你要在党的指引下，做又红又专的人，才能更好为人民服务，实现人生价值。”老师一路循循引导，学生茅塞顿开。立志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有用又红又专的人才，成为了我的人生追求，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这样扣上了，是那么朴实真挚，永铭于心，未曾改变。

### 勤奋比聪明更重要

这个世界从不缺聪明人，要立志做一个“笨人”，把勤劳摆在第一位。爱迪生也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有人问我，你怎样能够从一个连县重点中学都不是的普通乡镇中学考上清华大学，难道是天分过人？其实，我深知自己是很普通的人，要想读好书，取得好成绩，勤奋比聪明更重要。学习没有捷径，唯有多下苦功夫，别人读一遍，我读三遍，一定要搞懂弄通，绝不敷衍了事。要克服一切困难，不吃饭、不睡觉都要学习钻研，只有比别人花费更多

的精力和汗水学习思考，才能取得比别人更好的成绩。这些习惯，不仅在上学的期间，后来在工作中我也一直保留着。我一直认为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用选学，才能学到真本领，不断提升自身素质能力，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也是激励我三次走进清华门的动力源泉。我感觉在清华不仅要学到知识和本领，更重要的是学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这种顽强拼搏、力争上游的精神，一直激励我前行，每当感觉到动力不足的时候，我喜欢回母校走一走，就会产生充足电的感觉，又可以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无论工作日还是假日，我不太愿意闲着，每天都想保持“不下班”的工作状态，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有时在假日，朋友问：“你在哪里呀？”“在办公室。”“又加班呀？”“是在上班，没有加班。”我想人生的时间是有限的，要尽量把时间用在干事情上面。清华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我要以别人双倍的努力，也相当于争取双倍的时间去实现工作五十年，履好这个约。

### 基层是一片广阔天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每一条路上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关键要踏踏实实、满怀信心地走。在“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惠州”的感召下，1992年，我乘着小平南巡的东风回到家乡广东惠州，也可能是全班同学走得最基层的一位。首先在交通部门工作，主要负责交通规划计划和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兑现我为家乡修桥造路的儿时梦想。要修什么路、怎么修好路是我要思考的问题，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常常利用周末到

基层调研，几乎走遍了惠州的每一个山村，全面掌握真实路况，手绘出全市的交通图，哪怕是一条条小小的村道，其中都清晰可见，有效促进了全市的公路建设。在此基础上，我主持编制了惠州市的多项交通发展规划，比如提出“五横三纵”高速公路网规划，指导了惠州近20年的高速公路建设，至2020年底，近千公里的“五横三纵”高速公路网全部建成，为惠州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有一条高速公路直通老家，实现了山里人的梦想，也算给老师有了一个交代，心里油生一丝安慰。同时，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编写出版了《农村公路建养管理实务》《公共基础设施PPP项目管理》等5本专著。在交通部门工作25年多，见证了惠州交通许多发展奇迹，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普通铁路、城际轨道、沿海港口、民航机场都是从无到有、上规成网，公路通车里程翻了两番，康庄大道遍布乡村大地，现代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基本成型。惠州的发展也是全国发展的缩影，作为其中的参与者、建设者，我由衷感到高兴和自豪。

2017年末，我调到惠州市政府办公室从事政府文稿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工作，



邓焕彬（中）到东江惠州大堤调研，检查堤防安全

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挑战。政府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要有很宽的知识面，需要保持很强的求知欲，加强各方面知识学习，才能写出好报告。我通过加强基层调研，夜以继日潜心研究分析各行业经济数据，全面掌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供市领导决策参考。在三年多时间里，团结带领市府办的亲密战友，撰写了2018—2021年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60多篇调研分析报告、800多篇领导讲话稿和参阅材料，以文辅政，服务发展。

### 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

2020年春节前，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历史大考，在同时间赛跑、与疫魔较量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体会到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都有非凡的意义。那是2020年1月18日，接到消息称惠州已发现首例新冠肺炎阳性病例，我作为协调医疗卫生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第一时间赶到收治病人的惠州市中心医院，向专家了解疫情，得知该病类似2003年的非典，目前还没有特效药治疗，马上明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打响，要尽快组织构筑起全民防疫的坚固防线，我责无旁贷要冲在防疫最前线，保护好全市人民的健康。鉴于事态严峻，市里当即就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市政府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工作组，启动疫情防控阻击战。随后该领导小组升级为以市委书记为组长，下设办公室，简称市防控办。我任市防控办副主任，总联络人，具体负责综合组工作。市防疫办就像作战参谋部，统筹调配全市防疫力量协同高效运作，形成合力应对疫情。此

## □ 党旗下的清华人

后的近400天里，我一直坚持“5+2”“白+黑”，坚守在防疫第一线，以办公室为家，经常工作到深夜，昔日车水马龙的大街只有我一部车冷清清地走，心情难免沉重。尤其难忘的是2020年1月24日除夕晚，我们仍在办公室坚守，工作人员无法找到仍在做生意的饭店打快餐，只好买来麦当劳汉堡作为年夜饭，当时心想有机会守护人民的健康，牺牲点个人的休息时间，哪怕是除夕夜也是非常值得的。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掌握有关新冠肺炎的防控知识以及国家和省有关工作指引，结合惠州实际，根据疫情变化，研究拟订各项防疫对策措施，为全市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有效保证。坚持科学防疫，善于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开展疫情大数据分析研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I级、II级阶段每天出一期疫情研判报告，给市领导及时做好疫情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主导编制惠州一系列防疫大数据系统（惠州防疫通行码、惠州防疫健康登记、社区防控跟踪管理系统、境外来惠人员管理系统、跨境货车司机来惠提前申报系统等等），科学精准开展疫情防控，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做好疫情信息上传下达、左右沟通工作，保障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协调统一，每日主持召开各工作组联络员例会，认真落实上级防控措施和领导指示要求，果断协调处理遇到的问题困难，对惠州在珠三角率先实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动态清零、实现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抗疫成果作出了一定贡献。2020年9月，我荣获广东省委、省政府表彰的省级抗疫先进个人。

## 为群众办实事是永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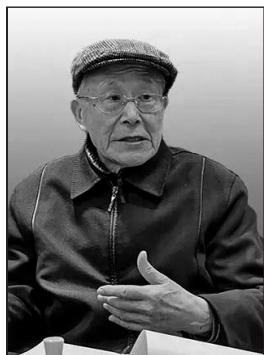
35年前的那场谈话，老师“要对社会作贡献”的教诲，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不管是做学问也好，还是从政也好，始终都要多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事。去年底，考虑到我在清华是学水利的，市里提倡专业人干专业事，组织又把我安排到惠州市水利部门工作。实际上，我虽然学水利专业，但一直没有在水利行业工作，现在又要重整行装再出发。到水利部门工作后，我继续发扬自己脚踏实地、勤调研爱钻研的作风，第一时间深入一线调研，了解水情民意，认真研究分析水利发展形势，编制了惠州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打造水利强市”的总体构想。在我看来，水利行业与交通行业一样，都是支撑和保障人民幸福生活的公益性行业，只是从不同角度造福人民。就像在一个足球队里，交通是进攻队员，每建成一条路，就像进一个球，正向拉动经济发展，因此交通人要多修路多进球；水利是防守队员，护卫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被水淹一次就是失一个球，水利人就是要筑牢防线争取少失球，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无论交通还是水利，都在为群众办实事，心是永恒的。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实学实干，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我深知，前面的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必定充满着挑战和希望，唯有不怕困难，在每一个平凡岗位上，敢于担当、迎接挑战，大胆创新、奋力拼搏，才能做出优异业绩，报效祖国和人民。

# 华能首批电厂建设者张铭

## ——“铭”记我心，不忘来时路

○李昕葳



张铭学长

在华能蓬勃发展的漫长岁月里，有这样一位走在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前沿的老总工，华能创业者名单上有他的名字：

他是首次引进成套设备谈判的参与者；  
他是华能首批35万千瓦机组运行规程的探索者；

他见证了华能多个“第一”的突破……  
他叫张铭，一个有着48年党龄的原南通电厂总工程师。白发皤然，从容有序，朴实纯粹的本色，让他坚守电力人的初心不改，眼中温和而有力的光芒，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 清华学子的报国梦

作为新中国早期的一批“天之骄子”，1956年张铭选择了清华大学发电厂电网及电力系统专业，他的目标明确：“国家电力能源紧缺，想要从源头解决缺电问题，就要去深入研究提升电网安全

性、可靠性和保证电能质量。”毕业后，怀揣梦想的他回到南通进入天生港电厂。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直到今天，张铭还清楚地记得48年前面向党旗大声立下的真切誓言，“这是我人生的新起点，党和国家给了我成长成才的一方天地，我要担得起重任，打得了头阵！”

当时张铭所在的天生港电厂算是国内规模较大的电厂，但最大的机组容量仅为12.5万千瓦，“那时电不够用，断电是常有的事。”张铭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力行业机组小、电网小、不稳定、技术落后，日趋严重的电力供需矛盾让缺电成为当时的中国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处在改革发展前沿的江苏、福建等地缺电形势尤为严峻，电力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1985年5月22日，《国务院关于建设大连、上安、南通、福州等四座电厂问题的批复》宣告了中国电力行业新纪元的开启，也悄然改变了张铭的命运。

“四个电厂项目同时启动，每个电厂都要配置2台35万千瓦的机组，这是举国之力推动电力发展。当时我们听到消息都相当振奋。”更令张铭没想到的是，时任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总经理汪德方早就听说了南通有这么一个技术过硬、英文极佳的电力人才，不久就将他聘为南通电厂副总工程师，并作为技术组副主谈，前往

## □ 党旗下的清华人

北京参加华能引进成套设备谈判。已进入不惑之年的张铭从此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力事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党和国家信任我，那就要拼尽全力。”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张铭就一头扎进密密麻麻的英文资料里，“我们必须先要弄懂、吃透，这样不管对手是美国、日本、加拿大还是意大利的供应商，都有底气和他们谈判。”

外贸无小事，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合同的功亏一篑。在谈判中，华能专家们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有限的预算下选择既有国际先进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机组。

张铭至今还记得在北京回龙观宾馆会议室里的往来周旋，“外国供应商们为了压缩成本始终在钻空子，但是我们坚持以国际标准来要求设备，绝不让步。”彼时，严重缺电的中国，机组利用率极高，“35万千瓦大功率机组一旦跳机，会对电网造成重大冲击，所以机组的可靠性指标必须非常严苛。”胶着的谈判进行了5个多月，终于在1986年2月26日尘埃落定——华能进口成套设备合同正式签约。这一刻，张铭仿佛看到，在波澜壮阔的黄海岸边，一片滩涂之上已经矗立起了一座现代化电厂。

### “第一个”电厂从零开始

根据协议，南通电厂一期2台35万千瓦机组将引入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三个不同国家的汽轮发电机、锅炉和热控等设备。作为最懂这些“大家伙”的人，张铭很自然地参与到中外设计联络会中。

“我们要紧盯设备的设计、制造情况，考察进口设备主辅机制造厂，一摊开图纸，

就要和外国专家讨论几个小时。”那时的他，不是在北京就是在去国外的路上。

电厂建设一路过关斩将，进展迅速。然而搞了半辈子机组运行的张铭却被制定新机组运行规程这个任务难倒了，用他的话说：史无前例，千头万绪，一切从零开始。与新机组相比，国内机组容量较小，不在一个水平，而国外机组虽然现代化程度高，但设备复杂，极为多样，并不符合华能建厂之初就明确的——力求在安全范围内做到统一管理的要求。

“没有合适的参照，真的很难很难！”张铭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依然眉头紧锁。难在这一切标准制定的参考只有薄薄几册英文原版的设备说明书；难在制定运行规程不是简单地指导运行人员如何操作机组，更要结合电厂实际情况和新机组的性能、结构，基于提高生产安全系数、降低管理难度进行综合考量。

千头万绪，须下一番苦功夫。“当时懂英文又懂生产的电力人才少之又少，更别说看懂都是专业术语的说明书”，近6个月的时间里，张铭带着5个专工，抱着英汉大词典，不分昼夜逐段逐句翻译说明书，力求原汁原味。“技术是枯燥呆板的，只有把说明书吃透了，规程才能



张铭（左）在南通电厂升压站与意大利专家合影

有依有据，几万个操作口令，错一个都不行。”张铭对运行规程的要求甚高，“这关乎事业，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工作作风。”时隔8年，参与电厂二期运行规程制定的原苏通电厂副厂长肖芝林对张铭的严格仍历历在目：“例如汽包水位高低、跳闸保护定值、延时时间等重要内容都要有出处，在说明书的第几卷、第几册、第几页要标注出来，张总都会去核验，设备入厂后，他还会再核对一遍设备上的标识。”

令肖芝林记忆犹新的，还有南通电厂启用的华能第一个集控模式。“当时电机、锅炉、控制都是分开学的，电厂几乎都是分控，”肖芝林回忆：“张总认为我们的设备行，技术人员也一定能做到，逼着我们每天都在昏天黑地地恶补知识。”专工们虽被“虐”到叫苦不迭，却也被张铭丰富的经验与扎实的理论知识所折服，“我们非常相信张总，他后来也成为我们这些理工男的偶像。”

1989年5月，南通电厂一期1号机组并网成功，三年的埋头苦干，喜悦、泪水在这一刻得到释放，一向冷静的张铭也很激动，同时胸有成竹：“因为我心中有数。”

就在电厂准备趁热打铁推进一期2号机组并网时，一场特殊事件导致外国专家全部被召回。在此如此关键时刻撤走技术支持，对南通电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是等待遥遥无期的外国专家组还是自己上？每个人的答案没有丝毫迟疑：“国家投资这么大，电力这么紧缺，早一天发电，就能早一天作贡献！”

顶着巨大的压力，张铭只能凭着已有的经验和数据向前摸索，一点点向成功的

可能性靠近。“张总一直冷静有序地指导大家，在外国专家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成功并网。”肖芝林骄傲地说。

## 一生的牵挂 一辈子的事儿

说起张铭，大家都对这位老党员严谨的工作态度、技术经验交口称赞，“总工的职责很明确，就是确保机组的安全稳定。”为了机组有时他的强硬态度会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女儿张慧辉说：“跟我比起来，机组更像他的孩子，他整夜整夜在运行上，花的心思比在我身上多。”从设计图纸到诞生、蹒跚学步到满负荷稳定运行，张铭一直是南通电厂机组的最强守护者。汽轮机的大轴偏心度准不准？控制室的二次表牢不牢靠还是去现场看一看；锅炉管壁还扛得住吗？可别爆管了，要用手去摸一摸厚度……

如今，张铭已经退休20余年，每年他还总会穿戴整齐参加南通电厂的职代会，从未缺席，这几年妻子生病需要照顾，他才终止了参会。“电厂一直是父亲的牵挂，看到电厂的发展和变化，他很开心。”女儿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际，父亲看到可以捐款的新闻后，立刻拿出2000元塞在自己手中，并嘱咐道：“一定要带到电厂。”

“共产党员是一辈子的事儿，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张铭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通人，张铭如同这座滨江临海的老城，不善言辞，却包容汇通。他走过河海，也曾走出国门，始终奔跑在中国电力的前沿，保持着那颗炽热的初心。

（转自公众号“中国华能”，2021年4月22日）

# 青海缺氧，但不缺清华人的奋斗精神

○靳 力（1999级计算机）

本文是6月26日靳力学长在计算机系2021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有删节。

我是1999到2008年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硕博连读的，毕业后跟爱人、同学王晓英一起到了青海工作。我一开始在青海省信息中心当副主任，干的是信息化、电子政务这类跟专业相关的工作；之后到西宁市城西区挂职任区委常委、副区长；再之后到青海湖北岸的海北藏族自治州任发改委主任。然后，又到海东市平安区任区委书记；书记干了5年多，2021年2月份调到现在的岗位，是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省招商局副局长，分管数字经济。

13年时间，我已经干过五个工作岗位，可以说是从专业到经济、政治，又回到了专业。这个历程中，一路风雨、一路

汗水、一路体验、一路美景，目前仍在实现理想的途中。

大家可能会好奇，青海到底怎么样？基层工作到底怎么样？我想说，确实艰苦，自然条件也限制，海拔高、缺氧。但是，我常说，青海缺氧，但不缺精神。拿我工作过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来说，州府所在地是海晏县西海镇，海拔在3000米以上，到了那里是真的能感受到缺氧。我办公室在五楼，冬天要想一口气上去肯定受不了，必须在中间停一停休息休息，要不然心脏就跟你闹，是那种跳到嗓子眼的感觉。那里一年有八个月是供暖期，六月飞雪简直再正常不过。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却留下了咱们老一辈科学家，包括老一辈清华人的足迹。西海镇还有个名字，叫“原子城”，是我国最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1964年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在那研制的。这是个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的地方。说起来十分的幸运，我是1999年入学，当年9月国家表彰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其中有14位清华人。我们那时正在军训，学习了不少前辈们的故事。谁能想到十几年后，自己能有机会来到前辈们曾经工作的地方！每每想到这些，我真有一种跨越时空的豪迈之情，也总想去学习前辈们的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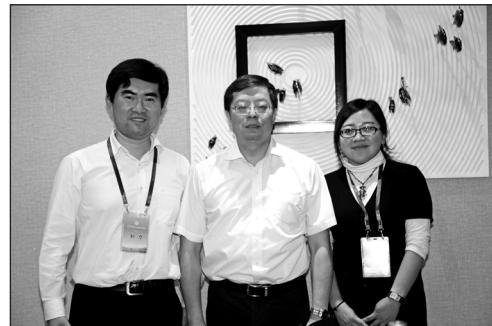


靳力（前排中）在基层调研

神，在这里与大家共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传承。

青海自然条件艰苦，那么经济条件怎么样呢？我先说说精准扶贫。我在担任平安区委书记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精准扶贫。全国832个贫困县，平安区是其中之一。为此，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搞了特色果蔬、食用菌的种植，大力发展了牛羊养殖，搞好特色文化旅游、电商扶贫，美化绿化好城市环境，做精做优城市管理，吸纳更多农业人口就地进城、安居乐业；在农村，我们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解决了道路硬化、安全住房、安全饮水、垃圾处理等问题，实施了易地搬迁、教育扶贫、医保兜底等惠民项目，大幅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在摘帽之前连续两年，我们获得了省内专项考核的优秀。

今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了全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绝对贫困的消除。毫无疑问，这是个令人鼓舞、彪炳史册的大事情。但是，大家知道脱离绝对贫困的标准是什么吗？在收入上的标准是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每年4000元。在我们平安区，2020年的数据是建档立卡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0000元左右，全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00元左右。虽然比4000好多了，但仍然是个很低的数字。相比之下，在座选择就业的同学们，你们将要拿到的薪水是多少？恐怕是这个数字的好多倍！咱们的社会内部就是面临这么大的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这正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具体体现，



2016年9月，邱勇校长（中）与靳力（左）、王晓英夫妇合影

也是在未来几十年要着力去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咱们的专业在扶贫中还是很起作用的，比如电子商务，就给农村带去了不少活力、不少收入，像平安区，近三年的电商带货就从无到有，去年已经实现了三千多万元的销售额，今年预计要过亿元。还有各电商龙头，近几年就做了大量的农产品销售，为贫困地区造福不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视野更开阔一些，人文关怀更强烈一些，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关心社会、关心人民、关心祖国，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上面说了青海环境艰苦，尤其是农村经济落后，那我们的前景怎么样呢？如何实现跟全国同步基本建成现代化呢？青海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我们的生态地位十分重要，我们有全国最大的盐湖资源，有全国占比最高的清洁能源产业。发挥这些优势，就得靠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尤其是要靠咱们科技界和产业界在理论、技术、工程实践上的创新。

这里我就分享一个时间见证产业奇迹的故事，那就是光伏发电。还记得小时候，刚学地理，拿着地图一个省一个省地认，当时我就知道，青海是个地广人稀的

## □ 党旗下的清华人

地方。这一点在我到青海工作之后有了更深的认识，偌大的一个柴达木盆地，32万平方公里，常驻人口才60万，大量的土地又十分贫瘠，没法耕种，甚至很多土地上草都不长。就是这片土地，恰恰是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方，被划为我国太阳能发电的A类地区，光伏发电理论装机容量达到32亿千瓦。这个装机容量，意味着年发电量可达5万亿度。而我国去年的总用电量是7.5万亿度。也就是说，仅靠太阳能，青海一个省可以提供全国总用电量的三分之二，还是清洁能源！

说到这儿大家觉得这故事很美好，但是等等，这太阳能资源存在这么多年了，怎么也没听说开发出来多少呢？事实也是如此，到去年，青海全年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才开发了资源量的很小比例。其原因是过去用来发电的光伏组件太贵了，2010年的时候每1瓦的光伏组件要卖到20块钱，折算到生命周期的发电量，那时发1度电的成本要超过1块钱，不靠国家补贴就完全没有经济性，自然发展不了多大规模。但在这十年之中，青海省也坚持不懈地打造光伏产业，建立了从硅的基础原材料到光伏组件生产的完整产业体系。随着政府的引导、企业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事情终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十年间，光伏组件的价格竟然下降了90%，最近这些光伏电站招标的光伏组件，折算出的上网电价，已经低于了当地火电厂的上网电价，这经济性终于来了。

当前又适逢国家提出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目标，需要大量的清洁能源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甚至是替代部分火电供给。6月上旬，习近平总书记到青海考察，提出青海资源能源安全地位

更加重要，并把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作为对青海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要求，可以说这方面发展的前景十分光明。对待青海太阳能这个事业，应该说我一直是很关注的，只是没想到产业和技术发展得这么快。当然，要发挥出上面说的那么大的产能，还要解决储能、载荷、输送等等一系列问题，清华大学还有其他机构的不少专家教授包括产业界，都在从事这方面研究和实验，在青海省也有全国最全的太阳能发电和储能技术的实证基地。我当前的工作也跟这个有关，最近在跟系里和业界探讨，看看能不能把便宜的清洁能源用在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数据存储备份、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欢迎老师和同学们关注。

所以你看，选择到青海工作，有环境的困难、发展的困难，但也有感人的精神、不懈的奋斗者，更有美好的前景、做成大事业的机遇和空间。人生是一条长路，我相信每一个同学选择的前方都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有辉煌、也会有困难，都有可以仰望的星空，也都必须要脚踏实地。希望同学们行稳致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无愧人生。

清华大学刚刚度过110周年的生日，今年又是建党百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特殊的疫情、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奋斗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这为在座的同学们增添了新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考察时说，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 我和“于都富硒米”的故事

陈 聪（2009 级经管）

2009年夏，还在读高三的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眼已经整整12年了。当年9月，我考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学习，在美丽的清华园度过了9年时光。博士毕业后，我考上了中组部选调生，进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工作。

刚到清华接受入学教育时，邓稼先等学长前辈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王淦昌学长掷地有声的“我愿以身许国”更是令我心潮澎湃。清华前辈矢志报国的感人故事，身边校友鲜活生动的模范事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不断坚定了我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理想。我立志要到祖国需要的岗位上发光散热，多做实事。

今天，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作为年轻的党员也向党组织报告，自己在践行初心的征途上，始终保持着“出发”的状态、奋进的姿态。

2019年，作为选调生，根据组织安

排，我来到原中央苏区贫困县江西省于都县梓山镇挂任镇党委副书记，投身脱贫攻坚战第一线。当时，梓山镇总人口约7.2万人，建档立卡贫困户2623户11602人。我和于都富硒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依山傍水的梓山镇富硒土壤资源丰富。中国地质调查局抽样调查显示，梓山地区表层土壤中硒元素的平均含量达到 $0.35\text{mg/kg}$ ，富硒土壤面积约1660公顷。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于都县梓山潭头社区和蔬菜基地视察工作，临行之际，总书记嘱咐，这里有丰富的富硒土壤资源，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让富硒农产品在市场上更加畅销。来到梓山后，我一直在思考，打造富硒品牌，助力脱贫攻坚，我能做些什么？

## 牛刀小试 增收有望

2019年11月的一天，我到张军村开展工作，发现村部堆着几十袋稻谷。村书记说这是合作社种的中稻，大概有一万多斤。我问：“为什么没卖出去？”村书记说：“价格太低了，一斤一块三都卖不到，还想再等等看。”我忽然想到，既然梓山土壤富硒，那么这些中稻很有可能就是富硒稻谷。于是，我迅速联系了粮科院国家粮油质量检验测试中心，采集样本寄到北京进行检测。果然，发现这些大米中硒含量为 $0.064\text{mg/kg}$ ，满足国家富硒大米标准。



脱贫攻坚期间，陈聪（左）走访贫困户

随后，通过委托企业加工和包装，张军村以5元/斤的价格售出了近7000斤富硒大米，增收3万多元。其他几个村的采样检测结果也令人欣喜。这一发现使梓山大米卖出了更喜人的价钱，成功助力当地农户脱贫增收！旗开得胜，这提振了我们打造富硒品牌的信心，激发了当地发展特色农业带动脱贫的内生动力。

### 明确思路 目标清晰

当然，打造富硒大米品牌，靠散兵游勇、小打小闹终归是不可持续的。富硒米想要卖出好价钱，必须是精品米，只有优质富硒米才能获取市场溢价。因此，必须大力提升当地稻米的种植水平，走规模化、优质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通过不断地走访调研和思考，借鉴五常大米、万年贡米等品牌米的经验，我们逐渐探索出了打造于都富硒米品牌的清晰思路：结合本地的土壤资源优势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对口支援优势，建立梓山万亩富硒水稻种植基地，对接龙头企业，培育和引进职业农民，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提升稻米品质，并争取优质粮食工程项目支持，实现优粮优产、优粮优价，最终达到农民增收、稳定脱贫和产业振兴的目标。

### 借力龙头 构建体系

待项目实施起来，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梓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梓山面积十分开，六分半山半分田，村庄道路一分余，河流塘库占半分。”这首民谣十分形象地描绘了梓山的地理特征，地少山多。全镇山地面积约18万亩，而耕地面积只有3.7万亩，人均不到半亩地，且大部分耕地属于山垅地、小梯田，种植以人

工为主，成本较高，加上外出务工人口增多，甚至出现了良田撂荒。当地粮食产业基础也比较薄弱，种植品种零散，精深加工能力缺乏。因此，仅仅依靠当地力量打造品牌很难。

怎么办？拉外援！2019年11月至今，我们联系了包括中粮集团、中化农业、江西粮油集团、赣粮集团、北大荒集团等在内的十多家企业，并邀请了20多批专家团队来梓山调研和洽谈合作。2020年5月，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扶贫办的协调支持下，经过多次考察论证和沟通接洽，中化农业和梓山镇达成了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打造万亩富硒水稻基地。由中化农业提供一体化种植技术解决方案，并派驻团队开展规范化的技术指导和标准化的田间管理，建立品控溯源体系，对接粮食收购企业；由梓山镇动员和组织各村合作社、农户按要求参与种植。同时，还拟定了“第一年规模化生产、第二年优质化发展、三到五年品牌化建设”的目标计划。

### 项目落地 初显成效

合作框架搭建之后，如何动员农户积极参与种植？这个问题也很棘手。该项目涉及面广，协调难度较大。受地形条件、人工投入等因素影响，当地的种植成本较高，种植理念落后，加上农业靠天吃饭，面临的风险较大，农户一般不愿意轻易改变种植习惯和品种。面对困难，我们迎头而上，借着县里大力抓双季稻生产、整治撂荒地的政策东风，积极筹备，稳步推进，确保项目落地实施。

首先是整治撂荒地。2020年3月，镇里开展了治荒专项行动，我主动请缨，担任了该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抗疫期间



陈聪（左）与中化农业农艺师在富硒水稻基地巡田管护

我们深入一线组织各村复耕荒地，共整治撂荒地3000亩以上。组织修建农田水利设施，新建高标准农田1500亩。全镇累计平整翻耕约1.5万亩水田，为规模化种植创造了前提条件。

接着我们广泛开展宣传，统一思想认识。在镇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多次召开村书记主任专题会议，并到村入户开展动员和宣讲，调动农户积极性。针对当地长期以来“分散、落后”的耕种模式，我们建立了中化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开展各类技术培训50余场，广泛传播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和理念。一系列的宣传逐渐让大家认识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是打造富硒品牌的基础和前提，是脱贫致富、产业振兴的方向。

其次是降成本。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扶贫办的协调对接下，我们积极向中化农业总公司争取优惠，如农资品打折、拌种剂免费发放等，将每亩投入品成本控制在260元以下。中化农业还破例为梓山项目提供了200多万的授信额度，投入品可先使用后付款，极大减轻了农户的负担。该项目还申报了国家优质粮食工程，获得了专项资金支持。

在前期的不懈努力下，梓山富硒水稻基地项目顺利落地。全镇24个村、1500多个农户参与了种植，在赣南丘陵地带进行了规模化、标准化水稻种植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建立了示范农场，开展种植实验，培育培优品种，提升品质，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户干；搭建了智慧农业系统，实现病虫害的精准防控，并为富硒品控溯源提供了科技支撑；实施了统一的布局供种、飞防植保和田间管理，进一步降本增效。项目取得了初步成效。2020年，梓山镇的晚稻种植亩均成本下降了100元以上，产量增加到了1000斤以上，每斤干谷市场化收购价格超过了1.38元。示范田种植的高端优质富硒米售价达30元/公斤，带动合作社和农户大幅增收。以张军村为例，集体经济收入由原来的不足5万元，目前已经突破了70万元。2021年5月10日，梓山镇和赣粮集团合作打造的“于都富硒米”产品还成功亮相2021中国品牌日，受到了广泛关注。

## 产业融合 富民长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随着富硒产品知名度越来越高，我们抓住机遇，积极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借助中化农业等平台，我们积极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激发内生动力，提升致富能力。梓山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已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67个，家庭农场29个，贫困户入股率达90%以上。当地的产业共同体已经成型，利益联结更加紧密，已脱贫的农户既可以获得土地流转收入，又可以加入合作社获得分红收入，还可以在产业基地务工获得劳务报酬。

## □ 党旗下的清华人

我们还积极培育乡村旅游业。2020年江西省旅游发展大会、农民丰收节江西活动主会场等系列活动先后落点于都梓山，我们顺势组建了旅游合作社，开办富硒食堂和特色民宿，开发了红色研学、农事体验等趣味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去年即使受疫情影响，潭头村合作社收入仍突破了300万元。今年3月，通过我们的积极申报对接，梓山镇顺利入选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项目，未来的空间更大了，后劲更足了。

###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是满载着初心和使命的地方。遥想当年，

长征出发前夕，苏区受到封锁，物资极其匮乏，于都百姓倾其所有，为红军贡献了79390担粮食，一位老人甚至将自己的棺材板献出来给红军搭设渡江浮桥。这些故事无不让我深受感动、深受教育，更时刻激励我奋进前行，为老区多做实事、做好事。

2019年，总书记曾在这里发出了伟大号召，“现在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去年，于都县顺利实现脱贫，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作为清华校友和一名挂职干部，我非常荣幸能够投身其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会传承好长征精神，不忘初心使命，助力乡村振兴，打响富硒大米“于都造”的品牌，让来自长征源的大米走进千家万户。

## 杨孟飞校友获得首届航天功勋荣誉称号

8月29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了授予20名同志首届航天功勋荣誉称号的决定，以褒奖在建设航天强国事业中建立卓越功勋、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探月工程三期探测器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杨孟飞（2001级博，计算机）获此殊荣。

杨孟飞，1962年10月生，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计算机应用专业，获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获博士学位。

杨孟飞是我国空间技术领域专家，长期从事空间飞行器领域的科研工作，在空间飞行器高速再入返回、甚高精度姿态控

制和高可靠控制计算机等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创造性成果。在30余年科技攻关征程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方案，解决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中的诸多难题，曾荣获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突出贡献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突出贡献个人等荣誉称号。2017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完成奔月之旅后成功着陆，人类时隔44年再次从月球带回月壤。作为“嫦娥五号”探测器总指挥、总设计师，杨孟飞带领团队出色完成了“嫦娥五号”探测器研制工作，并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收官之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宗和）



## 3800余名本科新生、9000余名研究生新生入校报到

2021年9月2日，初秋的清华园迎来一批崭新的面孔，3800余名清华大学2021级本科新生如期来到美丽的清华园，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

2021年，清华大学共录取本科新生3800余人，其中内地学生约3500人，来自全国31个省份1000多所中学，其中农村及专项计划实施区域新生占比约21%。港澳台学生约70人，国际学生约250人，来自全球约40个国家和地区。少数民族占比约11%，包括满族、土家族、藏族、维吾尔族、仡佬族等25个少数民族。年龄最小的新生出生于2007年，将在求真书院开启逐梦之旅。

今年是强基计划实施第二年。清华大学强基计划以书院制培养、理工双学士学位等亮眼设计，吸引了15000余人报名，最终960余名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优秀学子通过基础能力测试、综合素质考核及体质测试的选拔如愿进入到心仪的书院。

去年11月，丘成桐数学领军计划项目获批，正式开始招生。经过层层筛选，69名有志向、有天赋、热爱数学的学生在今年来到了清华园，在求真书院畅游数学殿堂。求真书院将通过“3+2+3”的本博贯通模式，为国家培养一批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能够引领中国乃至世界数学及相关应用领域发展的领军人才。除了丘成桐数学领军计划，新生入校后，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人工智能班、今年新成立的量子信息班、数理基础科学班以及钱学森力学班等特色培养项目还将进行校内选拔。

今年是清华大学自强计划实施的第

11年，截至目前，共有来自全国28个省份700多所中学的3000余位学子通过自强计划和国家专项计划就读清华大学，其中不少学子已经毕业，并奔赴祖国建设的各个行业。2020年我国全面脱贫，自强计划将延续下去，配合国家的乡村振兴方针，继续为来自乡村的自强学子创造机遇、点亮梦想。2021年，清华大学通过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共录取学生426人，超额37%完成招生计划。

在正式开学上课之前，学校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带领新生走进清华、融入清华。听取成才报告，参观校史馆与艺术博物馆，观赏《马兰花开》话剧演出，观看迎新晚会，参与新生赤足运动会，新生将切身感受清华110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彩的校园生活，体悟清华人自强奋进的精神力量。

9月3日上午，清华大学2021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9月4—5日，清华园迎来了9000余名2021级研究生新同学。其中79%的同学第一次走进清华园，研究生新生中男女比约为2:1，包含来自106个国家的1024名国际学生。与此同时，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也正式迎来了一批朝气蓬勃、青春洋溢的新主人。便捷的信息化报到流程、井然有序的指引服务、贴心细致的防疫安排……崭新的研途之旅已经启程，2021级研究生新生们将携手共进，扬帆起航。

9月6日上午，清华大学2021级研究生开学典礼、全校研究生开学第一课相继举行。

(新闻中心)

## 清华研发 领跑世界

### ——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首次临界

9月12日9点35分，山东石岛湾。随着反应堆控制棒逐步提出，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逐步趋近并首次达到临界，机组正式进入“持续核反应”状态，这意味着由清华大学与华能集团、中核集团共同参与研发建设的世界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向正式启动运行、实现并网发电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主控室内，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干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华能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舒印彪，中核集团董事、党组副书记李清堂，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高温气冷堆重大专项总师、清华大学核研院院长张作义等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在不久的将来，这座全球首座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将逐步实现商业化应用，标志着我国在世界先进核能技术领域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飞跃。

与大家熟知的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压水堆核电站不同，石岛湾核电站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路线——高温气冷堆技术。从上世纪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到本世纪初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三代清华核能人、数百位科学家历时三十余年，在高温气冷堆技术领域孜孜不倦、潜心钻研，从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到“200号”热功率10MW的实验堆，再到石岛湾核电站示范工程建设，清华核研院携手合作伙伴稳扎稳打、步步推进。2012年12月，石岛湾核

电站正式开工，项目凝聚了超100亿元人民币的工程建设及研发投入，逾千人全时工作、数万人参与工程，研发制造15000多件核岛设备。其中包括2200个世界首台套设备与660个创新型设备，形成约5万张设计图纸、10万页文件资料。这台新一代创新型核电机组在山东石岛湾拔地而起，奠定了中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国产化率93.4%，数十项核心技术难题破解攻关，率先实现第四代核电技术落地。

“固有安全性”是高温气冷堆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堆型用材与设计的自身物理机制保证了即使在严重事故下，不采取任何人为和机器的干预措施，反应堆堆芯也不会熔毁，放射性物质不会大量外泄。同时，石岛湾核电站采取的小型模块化技术路线，更为核电站的安全性能提供“双重保险”，大大解决了困扰业界已久的核电应用安全难题。

未来，石岛湾核电站的顺利运行将带来每年14亿度的发电量，可以为200万居民提供生活用电，减少CO<sub>2</sub>排放90万吨。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特有的反应堆出口高温特性，既能为化工、石化等工业领域提供高品质蒸汽，又能助力钢铁工业、煤化工减少CO<sub>2</sub>排放，更有机会实现大规模低成本核能制氢，为中国乃至世界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贡献更多“绿色力量”。

（田姬熔）

## 联合国委任薛澜教授 为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委员

7月22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通过了联合国秘书长对24位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CEPA）的专家提名。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作为该24位荣获提名的专家成员之一，将以个人身份担任联合国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委员，任期四年，从2021年8月1日起至2025年7月31日止。该委员会职能是支持经社理事会的工作，促进成员国公共行政和治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并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和进度审查。

薛澜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公共政策

与公共管理、科技创新政策、危机管理及全球治理，并在这些领域中多有著述。2000—2018年，他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2018年9月起担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同时兼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席院长等。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杰出贡献奖、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等。

（公管学院）

## 庆祝建党百年 清华积极参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时刻，一座庄重大气的红色新地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北京正式开馆。清华大学与各参建单位和有关方面协同攻关、艰苦奋战，精益求精、探索突破，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和创作百年艺术精品的艺术追求，共同完成了这座展示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精神殿堂。清华参与的工作和精彩作品主要有：

**广场群雕《伟业》** 以美术学院曾成钢教授为主创，创作周期超过三年。作品长15米，宽4.5米，高8米。《伟业》的时间跨度是20世纪70年代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作品紧扣“人民群众”和“现代性”

二词，表现了65位各行业的代表人物，奋进的姿态和自豪的表情是人物的主基调。

**展览馆建筑装饰设计** 设计工作历时近三年，进行了数十轮的修改与比选。美术学院组成了以常沙娜先生为总顾问、副院长杨冬江为设计主创的工作团队，设计成员包括张宝华、石硕、张熙等装饰、空间设计领域的专家以及博士生团队。设计采用当代、简约的审美风格，彰显向心、进取的精神内涵。此次外立面装饰工程所涵盖的柱头、柱础、额枋、花格、入口以及馆徽全部采用清华美术学院的设计方案。

**展览馆标志、门票、请柬等设计** 美术学院何洁教授为负责人的设计团队，承

担了展览馆的标志设计任务。标志以中国共产党党徽和党史馆建筑外形为核心视觉元素，意在突出党史馆视觉形象的符号性和独特的视觉效果，从而有利于识别、认知和传播。与此同时，团队还设计了请柬、门票、收藏证书等与党史馆开馆相关应用项目。

**序厅漆壁画《长城颂》** 由美术学院程向军教授团队等20余人参与创作，漆壁画高15米，宽40米，共由100块2米×3米的胎板组成。采用中国绘画鸟瞰式构图，

表现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岁月磨洗的长城，至今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报告厅序厅岩彩壁画《黄河壶口瀑布》《长江三峡》** 由美术学院崔彦伟副教授作为主创，两幅壁画高2.62米，长14.42米，画幅类似长卷，以长江三峡和黄河壶口瀑布为主题，利用强烈的景观标识性，唤起人们对长江、黄河的心理认知以及内在情感，借物喻情、托物言志，象征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寄托着中华民族博大浩荡的精神气象。（新闻中心）

## 清华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院

9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成立碳中和研究院。成立仪式在主楼接待厅举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清华大学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建敏，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教育部党组成员、副校长钟登华，以及科技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清华大学领导出席了成立仪式。曾嵘副校长主持仪式。

仪式上，华建敏、解振华、张玉卓、钟登华、陈旭、邱勇、曾嵘、贺克斌共同为研究院揭牌。

党委书记陈旭宣读成立决议。校长邱勇在讲话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式成立碳中和研究院，学校将努力发挥多学科优势，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全力以赴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作出重要贡献。华建敏表示，“双碳”目标是我国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清华大学成立碳中

和研究院，再一次彰显了清华大学的国家情怀和使命担当。钟登华表示，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在国家“双碳”战略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科技顾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美国科学院、工程院、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约翰·霍尔德伦，联合国原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第六任执行主任、“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埃里克·索尔海姆，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创始院长、牛津大学科学与工程前学部主任亚历克斯·哈利迪等发表视频致辞。

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由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担任。贺克斌在会上介绍了研究院的发展规划。研究院旨在支撑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实现国际技术引领，出战略思想、出关键技术、出综合示范。（吕婷）

## 清华之光

###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学生团队荣获第十届全国海洋 航行器大赛特等奖

8月28日，第十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决赛在上海交通大学拉开帷幕。本次比赛由中国科协与工信部指导，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国际船舶与海洋工程创新与合作组织等单位联合主办，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承办。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学生团队（海洋工程研究院研究生王凯甬、舒明瑞、李明阳、荆宏政、王经纬）项目“水面球形航行器”荣获本次大赛新概念创意设计A2组冠军，并被授予特等奖。

项目团队提出了水面全向滚动球形航行器这一全新理念，并可携带多种遥测传感器，为海岸地区碳中和、碳达峰等科学问题的探究提供可持续、环境承受力强的观测手段。该项目能够为海洋观测、环境保护、海上科考提供移动观测节点和通信定位节点，为海洋航行器设计提供了新思路。目前，该项目已经申请了PCT国际专利和多项中国专利。大赛共吸引来自境内外389所高校和科研院所8985名师生参与。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 徐建鸿教授荣获 2021 年度 “亚洲杰出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师奖”

近日，化工系徐建鸿教授荣获2021年度“亚洲杰出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师奖”。该奖由日本化学工学会（SCEJ）设立，每年在亚洲区域内遴选具有杰出认知、观点和成就的化工科技工作者。徐建鸿

由中国化工学会推荐获奖，并受邀在2022年3月举办的SCEJ第87届年会上作获奖报告。徐建鸿主要从事微化工过程与多相微流控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和化工学科前沿，注重从基础到应用的贯通式研究，在微分散新方法与模型化、微尺度传质特性以及新型微化工设备开发及其工业应用等方面获得了一系列原始创新研究成果。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中国化工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化工系）

### 我校学生超算团队获国际大学生 超算竞赛（ISC21）总冠军

7月1日晚，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ISC21）总决赛结果公布，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组建的清华大学学生超算团队夺得总冠军，同时取得LINPACK基准测试最高性能奖，获得双料冠军。

受疫情影响，本次竞赛改为线上举办。各参赛队伍需在新加坡国家超算中心集群（NSCC）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Niagara超算集群上运行竞赛应用。在取得ASC21超算竞赛亚军后，超算团队仅有一个月时间备战此次竞赛。在保证期末考试、毕业设计等学习任务顺利完成的同时，大家凭借丰厚的参赛经验有针对性地积极备赛，最终取得总成绩与LINPACK基准测试双料冠军。本次决赛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3支队伍参赛，清华代表队由6名计算机系本科生组成，他们是张晨、钟闰鑫、陈嘉杰、王雨田、翟明书、宋泽宇，指导教师为计算机系助理研究员韩文弢和副教授翟季冬。ISC21超算大赛与ASC超算竞赛和SC超算竞赛并列为世界最具权威性的三大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

（计算机系）



# 学术生涯的三次选择

## ——写自我在清华大学工作五十年

○隋森芳（1970届精仪）



大学时代的隋森芳

我1970年3月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清华大学机械厂，在机械厂发动机车间（当时机械厂生产汽车）当上了“新工人”。这期间我做的是最基本的工种，开过刨床、铣床和车床。干了两年工人之后被调到车间技术组，开始画图，后来我还设计了两台专机，用于发动机外壳加工。1973年上半年，获悉清华大学要成立研究生班，在校内的“新工人”中招40人。我积极报名，并幸运地被固体物理班录取。后来我们才知道，1971年杨振宁回国向周恩来总理呼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周总理很重视并指示国家有关部门把基础科学的研究搞上去。按照这一指示，清华大学在1973年建立了固体物理、物质结构、激光和催化四个研究班。固体物理研究班当时挂靠在工程物理系，我被老师指定为这个班的班长。由于离开课堂

很久了，大家学习很刻苦。我本科学的属宏观范畴的学科，主要用牛顿力学；而固体物理描述的是微观世界，主要用量子力学。开始我是有些不适应的，固体物理班的老师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很快就爱上了这美妙的微观世界。从机械厂到固体物理研究班，思考问题从“宏观”到“微观”，这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转折。

研究班可能办了不到两年，由于社会上“反右倾翻案”不得不停办。1975年我被分配到学校半导体车间，在那里我做过光刻、外延和电测量等半导体工艺。1978年，我国学位制度改革，我们当时已分散到各系的研究生班的同学们重新聚在一起。又经过两年多的学习，1981年获得清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之后，我留在固体物理教研组任教。开始固体物理还在工程物理系，1982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复系，我们就到了物理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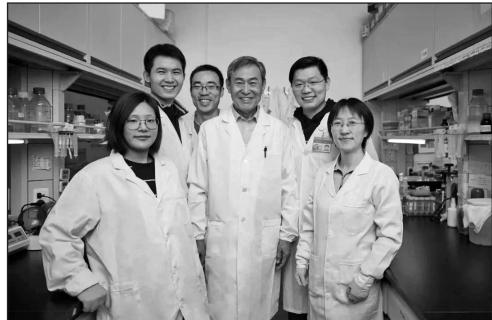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上生物物理学正在成为热门学科，它利用各种先进的物理技术研究生物学问题，结合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生物学。当时系里邀请多位美籍华生物物理学家讲学，我在活动中参与了组织接待的工作，同时结识了许多相同领域中的朋友，感受到生物物理学作为新兴学科未来的巨大发展空间。1984年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时，我毅然从固体物理调到生物系，

成为生物系复系时的第一批教师之一。从物理系到生物系，从固体物理到生物物理，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二次转折。

生物系复系之后，派遣了一批中青年教师前往国外学习深造。我于1985年3月到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Munich）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时任欧洲生物物理协会主席的Erich Sackmann教授。后来从导师那里获悉，我是清华大学张维副校长给慕尼黑工大校长写信推荐的。我在清华的硕士学位被慕尼黑工大认可，并获准可以用英文答辩（据说在该大学我是第一位允许用英文答辩的）。我于1988年8月通过答辩，1988年年底拿到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证书。

答辩之后的几个月，我主要为回国做准备。在导师的支持下，我搭建了一台计算机控制的LB膜仪，并带回清华，用于膜脂-蛋白相互作用研究。另外，导师还把曾用于全内反射荧光测量的一台荧光光谱仪也赠送我带回国。我于1988年底回国，带回来的LB膜仪成为我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第一台设备。那台荧光光谱仪太大了，实验室没地方放置，在生物馆一楼楼道放了很长时间，后来被物理系一位做光学的老师要去了。

1989年，以《蛋白质在脂单层表面的二维结晶》为题的项目获得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基金7万元，这是我回国后的第一笔资助。早在德国攻读博士期间，我读到了1983年*Nature*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抗原-抗体在脂膜上生长二维晶体的电镜研究论文，立刻被吸引住了，觉得用电镜能看到蛋白质的结构真是太重要了，非常适合我的固体物理的背景以及博士论文期间的脂单层膜研究，那时我就想好了回国后要开展这



隋森芳院士（右3）与团队成员

方面的研究。

回清华后，由于生物系没有电镜，只能安排少数几个学生利用学校分析中心和校外的设备接收数据。1989年，实验室启动了蛋白二维晶体的电镜研究，之后安装了MRC图像处理软件包。1996年，实验室又安装了单颗粒电镜三维重构软件包Spider。2000年之后，随着电镜条件的改善，实验室做电镜三维重构的学生越来越多，并成为我清华实验室的主攻方向。现在回顾起来，回国时选择生物大分子三维电子显微学（后来的冷冻电子显微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三次选择，并逐渐成为自己学术生涯的主线。

目前，冷冻电镜技术已经成为结构生物学的主要技术，可以解析生物大分子和细胞的结构，正在把生命科学的研究推进到原子水平，成为生物学和医学研究及药物开发的基础。

2009年，由于在蛋白质电镜三维重构方面的工作成绩，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7年，由于在“中国冷冻电镜领域的先驱开拓性工作和人才培养”，我获得了中国冷冻电镜杰出贡献奖之终身成就奖。

# 我与学弟王玉明院士的情缘

○梁 肃（1964届精仪）

我认识王玉明大约是1990年，我那时候是天津市科委副主任，受天津市一机局总工程师王武先生的邀请，参加一项科技成果鉴定会，该成果的发明人就是王玉明。王玉明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个，一是，王玉明是清华大学1965届毕业生，算是我的学弟，那时候在企业一线工作的清华学子还是很少的。二是，这项成果的水平很高，专家最后的鉴定意见是“国际首创”和“国际领先”。他发明并研制的流体动压非接触式机械密封件，工作在超高速、重载荷条件下，无泄漏，无磨损，长寿命。我相信这项成果将会在高端大型机械设备上得到应用。

1996年初某一天，王玉明突然来找我，说他要辞职，要创业，希望我能帮助他。我当时是天津科委主任兼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情况是这样的，他原来所在的企业是一机局机械密封件厂，国有企业，后与英国克兰密封公司合资，再后来是外方独资，他是独资公司的总工程师。但是，外方不许王玉明继续搞石化等流程工业大型高速透平压缩机密封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因为它直接威胁到外方的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他一气之下，就要辞职，自己创业。我问王玉明，你已经55岁了，现在作为世界最大的密封公司独资企业的总

工程师，地位和待遇都不低了，辞职意味着丢掉铁饭碗，风险太大了，慎重考虑一下吧。他毫不犹疑，坚信能办好自己的高新技术企业，下决心辞职创业。我当时还兼任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和高新区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经商定成立鼎名密封件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万，王玉明占54%（其中包括30%技术股），高新区总公司出资23万，占46%，王玉明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总公司派人出任董事长。两年多后，由于企业经营良好，高新区增资控股，占51%。

作为技术发明人，又有企业工作经验，担任高新技术企业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王玉明，研制出合格的产品不是问题，但是要把产品卖出去可不那么容易。他的产品主要是为大型石化企业配套，而这些



2021年4月23日，在京津冀清华校友共迎母校110周年华诞座谈会上，梁肃学长（右）与王玉明学长讲述他们的故事

大型石化的大型关键机组所用的密封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你一家新成立的小企业，没人理睬，尽管我们的产品有很好的性价比和服务优势。从国外进口一台大机组密封大约需要50万美元，而我们自己研发的密封只要50万人民币。即便有如此大的价格优势，我们也拿不到订单，因为这类大型国有企业有外汇，不在乎这点钱，用国外名牌企业产品如果出现问题无话可说，因为是世界最高水平，而用国内知名企业的产品，如果出了问题谁来担责？

也是上天有眼，给了王玉明一次机会！

1996年下半年，通过一位石化战线的朋友得知，湖南某家大型石化企业进口的大机组密封装置出现事故，需要更换新的密封装置，他们向国外原厂家订货至少要等待3个月。而停产一天企业损失100多万元。王玉明得知这一信息，立即赶赴该企业，看了现场，了解问题所在，心里有了底。他介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性能，可以完全满足对方的技术要求，甚至答应：如果出现意外包赔损失。为了进入这个高风险、开发难度极高的市场，只能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当时真让人捏着一把汗。结果出乎厂家预料，不仅完全符合生产要求，而且后来的生产实践证明其可靠性和寿命超过进口产品，技术鉴定会得到一致好评。鼎名的产品一下子在行业中出名了，逐渐被直接用户、设计院和主机厂所认可，不愧鼎鼎大名。

产品打开了市场，企业的效益就直线上升了。按上面说的产品销售价格50万元的话，利润率大约50%，就是因为产品的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大。企业不大，注册资本金才50万，但是每年为高新区上缴的所得税就有几百万，总公司每年分得



王玉明院士题字

的利润也有几百万，而入股投入只区区23万。有一天我和搞风险投资的朋友说起这个故事，他们说这是一部很好的教材，风险投资成功的关键是你选择的技术，选择的人。王玉明从一个技术人员，带着自己的发明专利，到高新区艰苦创业，培育了自主品牌，五六年间形成了科技小巨人企业，在高端机械密封件领域中赫赫有名。王玉明发明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产品，不仅打破了外国著名密封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迫使其大幅度降价，而且成功实现了产业化，被石油、石化、化工、冶金等行业150多台大型关键机组成功应用，他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成功的企业家。后来，他在预先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评为“全国机械工业优秀企业家”。

第一个目标实现之后的王玉明，在朝着他的第二个目标努力，就是做被社会公认的科技专家，争取当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院士的必要条件是有被社会公认的科技成果，省部级和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就是重要标志。他在高端机械密封技术领域多年来有许多成果，并且如上所说成功实现了产业化，为国家争了光，在国民经济许

多领域得到应用，受到好评，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应该说获奖是没有问题的，但事情也难免有曲折。他在市科委申请科技进步一等奖时，经天津市的一些专家评议评为二等奖，他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无论是技术水平、技术难度、创新性还是工程应用和社会效益方面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能接受的。当时我为他捏着一把汗，因为按照规定，如果申诉没有通过，原先确定的二等奖也要取消。但他坚持自己的申述，表示宁肯不要奖，也要证明他的这项成果具有一等奖的水平。市科委又从北京和全国请来专业比较对口的专家重新审核，结果确定该成果符合市级一等奖条件。在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之后，该项目又顺利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执着。2003年申报院士时，他有两项国家级科技奖：一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在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过程中，还有这么一段插曲。据说工程院接到了举报信，举报王玉明申报材料不实，公司产品的技术经济数据作假。工程院很重视，专门派几位院士来天津市调查，查阅了企业的原始技术经济资料，召开了座谈会，走访了用户，最后的结论是申报材料不仅完全属实，有些数据甚至还留有余地。就这样，王玉明第一次申报工程院院士就通过了。看来，这封举报信和调查结果似乎是帮了忙的。这也表现了作为清华学子王玉明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王玉明当了工程院院士，实现了他的第二个目标。两院院士大多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来自企业的并不多，即使有出自企业的，也都是央企、大型企业。天津市高新区一个不到100人的小企业出

了一位院士，这起码是空前的，不敢说绝后。当了院士怎么发挥作用，不能仅局限在一个企业中，当时天津、北京许多高校都开出优惠条件，希望他到大学去工作，经过权衡他选择清华，因为那是他的母校。

回到清华，他在科研、教学、培养人才、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不必我说。我只想说的是，对于实现他的第三个目标——诗人，创造了条件。对于他作的诗词，我不太懂，不敢妄加品论，他写的诗词很多，很容易触景生情，经常发微信给我，一天一改，不断完善，一周左右定稿，算是高产诗人，已经出版了好几本诗集。他也爱好摄影，利用工作之余，自费旅游，跑遍国内外山河湖海，世界七大洲，南极北极，背着一套照相设备，重量不轻，跑上跑下，等待时机，很是辛苦，当然这也锻炼了他的好身体。每年他都有新作品，漂亮的风景台历年年寄给我。他也喜欢书法，隶书体写得很秀气。他是清华荷塘诗社社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高校诗词工作委员会主任。他给了我5月15日即将举行的诗书画影展、新书首发式暨高校诗词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和中华诗词高峰论坛的信息，从参会人员的阵容就可以看出王玉明在国内诗词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作为企业家，像他这样比较成功的，在全国数以万计。

作为科学家，像他这样成为院士的，在全国数以千计。

作为诗人，能达到像他这样水平的，在全国恐怕只是以百计。

企业家、科学家、诗人同时集于一身的，可能就是屈指可数了吧。

2021年5月12日

# 有缘精仪系 难忘精仪系

○田 芊（1970届精仪）



田芊学长

2021年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精密仪器系毕业20周年的校友返校举行座谈会，邀请了我这位原系主任参加。我欣喜地看到昔日的同学们都已茁壮成长，让我回忆起曾经和青春洋溢的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子；还听到系领导的介绍，看到系馆9003大楼焕然一新，让我感受到精仪系在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的发展与成绩，我由衷为之高兴。

我和1970届的校友们，也在清华110周年校庆时举行了纪念毕业50周年活动，这次纪念活动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被推迟了一年，所以显得尤为难得而令人难忘。我没有想到今生能够上清华大学学习，而且没有料到从此以后一生与清华结缘，更没有料到从此与精密仪器系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之所以与精仪系如此有缘分，这是因为曾经“三进精仪系”。

我第一次进精仪系，是在1964年考入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当时简称为机械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简称精仪系），学

光学仪器专业，分在光0班。精仪系源于1932年成立的机械工程学系，原机械系和土木系、电机系是老清华工科的三大“母鸡系”；现在的精仪系主要是由1959年增设的精密仪器（810）、光学仪器（820）专业发展而来，所以精密仪器系是一个年久而又年轻的系。

但是很遗憾，1966年我们在临近念完二年级时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了学业，参加政治运动。到1969年因那时加强三线建设“备战”之需，我们光学仪器专业的同学们与部分老师和无线电系（现为电子系）等一起迁徙到四川参加建设绵阳分校，1970年我毕业留校。在这些年里，既有愉快的大学生活，又有“半工半读”劳动和分校建设的锻炼，更有纷乱的政治运动的磨练。这是我一段极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无论是在学识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以提高。我非常感谢班主任康立民、李克兰和级主任陈玉新等老师，他们是我进入大学后最早的引路人。

我第二次进精仪系，是在十年“文革”结束后，1979年清华大学绵阳分校迁回北京为清华电子系，我随同激光教研组廖延彪老师一起在我国最早开始了光纤传感技术方面的研究，廖延彪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并成为知心的朋友。1981年我因参加环形气体激光陀螺的研制项目调回精仪系，又回到了熟悉的9003大楼。之

后的十年间，我在精仪系光学仪器教研组曾参加过多个科研项目，增长了学识与才干；并有机会到联邦德国做访问学者开拓眼界和了解世界，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尤其是得到了许多老师从业务到思想、从工作到生活的热诚关怀与很大帮助，光学教研组团结互助、齐心协力搞教学和科研的氛围，让我十分感激并铭记终身。1991年，我被调到校长办公室工作。

在此期间，我参加了冯铁荪老师负责的精仪系和中国计量院合作研究环形气体激光陀螺，配合杜继祯师傅研制长寿命氦氖气体激光器，协助王大珩先生指导博士生研究半导体激光调频光纤传感器，以及参与了梁晋文先生主持的研制大型机件几何尺寸检测技术与装备（大尺寸测量）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等。在研究工作中，我觉得自己学业基础不够、研究能力不足，唯有刻苦学习与钻研，以勤补拙，在集体中成长、在实干中成长。经努力，曾获得过国家及机械部、北京市的科研奖。我深深感到科研工作既需要扎实理论基础，又需要实际动手能力；既要瞄准国际的先进水平，又要解决国家的需求问题；其中既有苦累又有乐趣，需不断探索、不断坚持，有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

我第三次进精仪系，是在1994年又调回精仪系，先任系党委书记三年，又任系主任三年。这六年正是我国深入改革开放之时，学校提出了“争取到2011年把清华大学建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目标，在全系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精仪系在教学育人、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管理体制和办学效益等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我们试点进行了6年贯通培养方案的教学改革、

由教研组改为研究所的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抓好重点学科建设，抓好研究基地建设等，都取得一定的成果。

尤其是，在其间相继建成了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CIMS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清华微米/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等，为精仪系今后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以及推动工业工程学科发展，为成立清华工业工程系奠定了基础。2000年，我被学校任命为公共管理学院筹备组组长，参与了公共管理学院的创建工作，后来又被调到校史研究室工作。但是即使工作调离了，我也始终没有离开过精仪系，一直坚持“双肩挑”和其他老师一起培养着博士生，一直在关注与期盼着精仪系的进步。

我很有幸做了一名教师。自己做了老师之后，越来越想感谢我的老师，也更加怀念我的老师。在精仪系学习与工作期间，曾经有许多老师勉励和帮助过我。我很感恩他们给予我真诚教诲和热忱扶植，教会我如何做事、如何为人。恩师难忘，这里我特别想念冯铁荪老师、梁晋文和王大珩先生。

冯铁荪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入学清华的第一次班会上，光学仪器教研组副主任冯铁荪给我们作了专业介绍，同学们听说他是留苏的博士，都很敬佩他。后来我有机会与冯铁荪老师一起工作了很多年，越来越感到他学识丰富、才思敏捷，而且浑身充满活力，是一个极其能干的人，他是给我帮助和影响极大的恩师。我清楚地记得，在他的带领下进行气体激光器、气体激光陀螺的研制，为了抓紧研究常常加班加点，他和我们一起熬过了许多

不眠之夜。尤其记得，气体激光陀螺作为惯性基准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在研制，但为了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清华怀着敢为人先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展了研究。虽然那时缺少资料和经验，实验和设备的条件很差，但冯铁荪老师总是满怀信心地带领我们攻坚克难。无论是原理的研究还是器件的研制及系统的构建，团结大家开动脑筋解决难题，自己动手制造加工设备。当年那么艰苦地搞科研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让我难忘，他的执着精神和奇思妙想真令我折服。

冯铁荪老师患肝炎多年，却一直不惜身体带病力行，那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废寝忘食的工作激情深深感染了我。在我离开精仪系后，多少年来他仍一直关心我、帮助我。可惜后来冯铁荪老师终因肝硬化而病逝，临终前还专门托其夫人校医院陶大夫，将他多年来悉心收集整理的有关科研资料转交给我。然而我辜负了他并没能完成他的遗愿，这是我至今感到非常愧疚的事。

梁晋文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他是机械制造标准化互换性和光学精密仪器及计量测试领域的专家，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51年在清华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公差与技术测量实验室，为我国精密计量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为解决重型机械、造船、航天等工业部门计量技术的迫切需求，他开创性地进行了机件的大尺寸测量技术与装备的研究，列入“七五”“八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同时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00万美元的援助。这些美元大部分用于购买国外实验设备，我时任实验室副主任负责定购任务。由于我从未干过有点胆怯，梁先生却十分信任我，让我

放手干，有啥问题直接找他。同时让我辅助他指导博士生，进行CO<sub>2</sub>多波长、He-Ne3.39 μm双波长激光器的无导轨绝对尺寸测量的研究，这在国际属首创。他对研究工作，总是在不停地思考提出新的问题，不断地钻研提出新的想法；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实验室讨论和研究解决问题，还奔赴工厂现场调研与指导工作，这种敬业精神令我感动。

梁先生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人满腔热情，我觉得他是慈父般的老师。我经常到他家做客，很随意叨叨家中事。他家庭和睦，他和夫人简秀文老师几十年恩爱如初。梁先生下厂劳动时和我班同学打成一片，同学称他为“梁老头”，还嬉闹要补吃结婚喜糖，他真买了奶糖给大家吃。1998年他金婚纪念时，我特送上贺喜嵌名联：“松梁竹简，有丽秀文采育桃李，从教半个世纪；伴秦晋文风作情侣，相爱五十春秋。”如今梁先生虽已仙逝好几年了，但我仍然十分怀念他。

王大珩院士是我敬仰的老师。有人称王大珩为“中国光学之父”，他对此很不乐意地说：叫我“之父”，那叫我的老师是什么？王老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应聘为精仪系兼职教授，根据第一个博士生徐左的基础提出研究方向为光纤传感器，我很有幸协助他指导博士生。王老对我说，光纤传感是新技术，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我们要抓紧研究，争取有所创新突破。后来决定，进行研究以调频半导体激光器为光源的光纤传感器。但是当时这种窄光谱的半导体激光器国内还没有，在王老的帮助下从日本弄回几个，并联系上海光机所进行研究试制。后来，在此研究基础上申请到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过好几年的努力，研制成半导体激光调频光纤传感测量仪，获授权我国技术发明专利并转让日本，还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三等奖。

王大珩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与他人共同提出“863计划”，这是科学思维也是战略眼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的进展。王老学识广博但平易近人，工作严谨而生活简朴，到他家拜访汇报工作时，我看到家具都是老旧的很是感动。王老还曾跟我说，他到许多实验室看到仪器多是外国的，犹如仪器“万国展”，感到很痛心，殷切希望尽快发展我国的仪器。我和王老接触时间并不很长，但每次聆听他的教诲都深受启发，现在言犹在耳，决心做开创新中国光学事业的“追光者”。2021年4月我收到中国激光杂志社来函，告知了我参与执笔的论文《中国光纤传感40年》，在《光学学

报》创刊40周年之际被评选为6篇“高被引论文”之一。我想以此告慰王大珩先生在天之灵。

我回忆起在精密仪器系的岁岁月月，难以忘记为了精仪系的建设和发展曾付出心血与努力的老师和同学们。我有缘精仪系，感恩精仪系，和精仪系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因为精仪系给予我家的感觉。精仪系现在已经开始了新的创业，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和极大的潜力，将是大有作为的。我希望，精仪系不忘初心，坚持始终，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综合性、研究型的特点，脚踏实地，锐意创新，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育人质量。我衷心祝愿，精密仪器系精益求精、再接再厉，随同清华大学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一定会取得新的发展和更大的成绩！

2021年8月

## 我和《清华校友通讯》的四十年

○郑文会（1959届土木）

看到《清华校友通讯》复84期之后，才猛然想起，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清华校友通讯》的复刊号已经走过了40年的道路。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分，这40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想起看到第一期的时候，我们都刚刚从十年“文革”的噩梦中醒过来。毕业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我们和学校都断了联系，变得生疏起来。是《清华校友通讯》把我们又拉回学校，让我们重新回到了清华园，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在清

华度过的五年半的青春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和《清华校友通讯》走得越来越近，我们和学校也越来越近。它就是我们广大校友的精神家园，是我们了解学校的窗口，是校友们交流的平台，所以每一期我都认真看。我为学校的发展与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杰出校友的事迹感到骄傲与自豪，为一些遭遇过不公平待遇的校友感到同情，有些文章会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会从中找到奋斗的目标、前进的动力、学习的榜样，它成了我亲密的朋友。

40年过去了，我搬了无数次家。每次搬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清理东西，而被清理掉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的书籍，包括文艺书、小说、专业书、外文书等。而唯独《清华校友通讯》从复刊号到现在的84期一本不少地保留了下来，而且一直跟着我从偏僻的远安到了孝感，又从孝感到了武汉。现在它们正静静地摆在我的书架上，成了这有些简陋的书房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和《清华校友通讯》40年的交往，首先要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给9班大一开学时的团支部书记金丽华同学。在她的帮助下，我幸运地拿到了复刊号和后来的复2期、复3期、复4期……正是在她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开始给《校友通讯》写稿件。

1991年清华80周年校庆之际，我写了一篇《母校育我恩情在》的文章刊登在复23期上。从那之后，我班毕业40周年、50周年聚会，以及2001年的全班同学杭州大聚会并畅游杭州、绍兴、宁波、普陀山和2004年部分同学畅游南京、苏州、无锡等地的活动，她都鼓励我写了报道。有时与她合写，也有与张崇岱同学合写。后来有的同学不幸去世，也是在她帮助下，我为邱容处、赵永铭、邬象牟等同学写了悼念文章。使我和《校友通讯》之间的关系又从刊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进展到既是读者偶尔也是作者之间的关系。

也是通过金丽华同学的热心帮助，我认识了不少《校友通讯》的编辑老师和工作人员。我最早认识的是老主编钱锡康学长，他是给8岁的，比我高一年，给我不少帮助。还有徐友春老师等，我都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更得到了他们不少的帮助。



郑文会学长与珍藏的《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后全部刊物

近年来，也是在金丽华同学的帮助下，我又和黄文辉、解红岩两位副主编认识了，并且和她们建立了微信的联系。这样一来我麻烦她们的事情就更多了。小到稿件方面的一些文字问题，大到委托她们办一些编辑工作以外的事，她们都热心及时地帮忙办理，真使我感动。如2018年，我有一位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友，也是清华的校友姜蔼如同学，她父亲姜书麟老学长是清华经济系1932年毕业的，已去世多年。老先生在世时很少谈及自己在清华学习时的情况。在姜同学的心目中，她的父亲可能就是一位不问政治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一次在闲谈中谈到这类事情，我表示可以向学校了解一下。于是向两位副主编请求帮助。

不久，解红岩老师就给我答复了，并且发来了几张照片。其中有姜老先生的学籍卡和两张珍贵的照片，一张是学校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人员合影，还有一张是校级足球队队员合影。在第一张照片中，标明她的父亲是负责纠察工作的。这张照片中还有不少名人，其中就有王岐山同志的父亲王德政。而另一张照片上还有著名的抗日空军英雄沈崇诲。这两张照片完全颠覆

了他们子女对父亲的想象，说明他们的父亲不仅关心而且是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是一个爱国青年，同时又是一个驰骋绿茵场的足球健将。姜同学和她的家人都感到十分欣慰，并对两位副主编，特别是解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后来姜同学又提出想了解她的叔叔姜书阁在学校的情况。她叔叔也是1932年清华毕业的，学的是法律。解老师很快给了我回复，发来了姜书阁老学长在学校时的学籍卡，并且转来了他的资料。姜同学全家更是感到十分惊喜，圆了多年想要了解叔叔在校经历的梦。

前几年，我想起一位老同学卢仁。我们多年失去联系，只听说他在北京林业大学工作。此事我也求助解老师，请她帮我打听一下。很快就有了回音，这才知道老同学已去世多年。当时，由于疫情期间不便去学校了解情况，解老师告诉了我一个联系电话，使我能更多地了解我这位老同学晚年的一些事。最近，我老伴的一位好友孙昆夏女士，她的父亲孙永明是西南联大1944年电机系毕业的，后来响应学校号召抗日参军，到孙立人部队做翻译工作，为抗战作出贡献。解放后在沈阳电力系统工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孙女士也因此受到连累，连高中也不让上，只能上了中专。如今，父亲已被平反，孙女士一家生活平静，老母亲年过百岁，仍然健在。她和家人想了解一下父亲在学校学习和参军的情况。此事我又麻烦了解老师。

很快，解老师从学校档案馆获得了孙永明老学长两张学籍卡和解放前补办毕业证的相关资料。孙永明老学长一生坎坷，对自己的过去一向守口如瓶，家人对此一无所知。解老师将这三份档案文件复印件快递给了孙昆夏女士，还鼓励她写一篇怀

念父亲的文章。这些资料给了孙女士和年迈的母亲以极大的精神慰藉，他们对清华的校友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实我也很矛盾，知道这样会给他们增加不少额外负担，真的很抱歉。可是我又知道，作为《校友通讯》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做好这件事。因为通过这么多年的交往，我已经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和对校友的关心。我想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刊物的编者和读者或者作者的关系，而是超过年龄和职业界限的朋友关系，更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称呼：清华校友。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想起他们，想给他们送去一声发自内心问候和祝福。可是一想他们联系的人太多了，如果每个人都给他们发去祝福，出于礼貌他们要回复，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只能默默地在心里祝福他们工作顺利，事业有成。

看着一大排《校友通讯》从1980年的复刊第一期到40年后的第84期，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好像一队雄赳赳的战士。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想，清华大学的历史，也是由清华的校友们创造的。这40年的《清华校友通讯》，不也正是清华大学40年的编年史吗？它内容丰富、真实、深刻、感人，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我们在这里说真话，说心里话，说真事，说家里的事，也说国家的事和世界的事。正所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展现的正是我们清华人的家国情怀。40年已经过去了，在我们迎接新的40年的时候，祝愿《清华校友通讯》越办越好，和广大的校友一起共同谱写清华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2021年4月

# 三代人三十年的清华缘

○高乔·布尔根（2003级博，化学）

高乔·布尔根（BULGAN Gochoo），蒙古国留学生，清华大学2008届博士毕业生，是第一位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的蒙古国留学生。

## 梦向清华 一念缘起

我与清华的故事，要从三十年前说起。

1991年，我还是在乌兰巴托市第40中学读书的一个普通中学生。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父亲正拿着一沓俄文版的中国各高校留学介绍图册认真研究。那段时间，中蒙刚刚开始恢复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父亲当时是蒙古国立大学化学系的老师，有幸成为第一批赴中国研修的访问学者。他拿着图册向我介绍：“听说清华大学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历史悠久，环境优美，人才济济。如果能去清华大学进修深造，我会感到非常荣幸。”

就这样，“清华大学”四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最终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这也成为他生前最大的遗憾。父



高乔·布尔根和父亲在南京鼓楼（摄于1992年）

亲的遗憾，在我的心灵深处理下了一粒圆梦清华的种子。

## 公派留学 圆梦清华

后来，我考上了蒙古国立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进入蒙古国科技大学矿物研究所并获得硕士学位。

正所谓“心有所念，必有回响”，2003年，我当时所在的研究所有申请赴中国公派留学的名额。当看到清华大学招收博士生时，我非常激动，马上提交了申请表。虽然蒙方审核材料的老师对我的申请材料并不看好，建议我调整一下申报志愿，但是我得到了当时中国驻蒙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王大奇老师的坚定支持。王参赞鼓励我说：“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有志者事竟成，你本硕考取全A的成绩，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不久以后，我收到了那份期盼已久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从此，我与清华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化学系顺利结缘，成为了朱永法老师第一个来自蒙古国的博士生，主要进行光催化、环境催化、表面化学以及环境化学的纳米技术研究和课程学习。

在开始专业课程学习和科研之前，我先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一年汉语，并顺利通过了HSK6级考试。2004年，我终于如愿踏入了清华大学的校门。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我踏进清华大学校门时，内心百感交集，激动、新奇，也有些不知所措和深感压力。

## 恩师教诲 受益匪浅

今天，当我回忆起清华的故事，最感激和挂念的就是我的导师朱永法教授。朱永法教授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化学科学家，在分析化学、环境化学、高分子、纳米技术等领域都有极高的建树。而对我来说，将要进行的科学的研究都是从零起步。

朱老师在学习方面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做科研不仅需要夯实基础知识，还需要提高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事科学研究。此外，在专业知识培养的基础上，学生还应着重于能力的培养，包括动手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等。朱老师教导我们，未来就业将不再凭借考试成绩来衡量一个人的工作潜力，而是需要具备在工作岗位上解决问题的能力。

朱老师还建议学生不要局限于学习化学，同时要学习掌握材料、能源、环境、生物医学等交叉领域的知识。做到在打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他说，也许未来的工作岗位和现在所做的科研工作内容不同，但是二者的流程、方式和态度是相通的，所以在平时的科研工作中，我们应有意识地训练规划实验、分析数据、撰写报告、汇报工作等方面的能力。



高乔·布尔根和女儿在清华学门前（摄于2004年）



高乔·布尔根和导师朱永法教授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合影（摄于二〇〇八年）

认真做科研，丰富实践经验，不畏惧失败。

导师在学业上给予我非常有益的指导。但是作为一个留学生，初来乍到时，我在语言、生活、学习等方面都有些不适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充满焦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分析中心高级工程师姚文清老师，她无微不至地帮助我适应清华的生活。

## 长念母校 家女续缘

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于2008年7月顺利答辩毕业，拿到了化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的蒙古国留学生，完成了父亲的夙愿。

回想在清华求学的那段时光，每次路过清华学堂时，我都会看到门口那块刻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石碑。那时我的汉语还不是很好，只是理解为要好好努力学习，后来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增长，细细品味，我才更加理解了其深意所在。

日月如梭，2017年我的女儿考入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我们的家庭再次与清华大学结缘。至今，这三代人三十年的清华梦、清华缘、清华情，已深深嵌入到我们的记忆里，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心中闪闪发光、涓涓流淌。



## ● 榜上有名

# 清华校友助力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任务

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随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3名航天员将进驻天和核心舱在轨驻留3个月，同时开展机械臂操作、太空出舱等一系列实验与技术试验。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19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神舟十二号飞船成功发射，离不开全体航天人一路披荆斩棘。这其中也有众多清华校友的身影与付出，他们仰望星空，逐梦而行，不断续写中国的飞天梦。据不完全统计，有7位毕业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的校友承担了主要发射任务和空间站航天员在轨工作任务。他们是：

**王翔**（1991级力学），1996年本科毕业，2001年博士毕业（导师姚振汉教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总指挥。2003年底，王翔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工作，从事神舟飞船与天宫目标飞行器交会对接研制任务，带领团队突破并实现交会对接技术。此后，他先后参加了自神舟六号以来多次载人飞船和天宫目标飞行器的研制与飞行试验任务，历任神舟飞船主任设计师、神舟飞船副总设计师、空间实验室系统总指挥等。

**薛辉**（1999级力学），2003年本科毕业，2009年博士毕业（导师李志信教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工程师。博士毕业后，薛辉响应祖国航天事业的召唤，与同为清华校友的妻子共赴酒泉工作，成为当年为数不多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博士。他的主要工作是发射场总体规划论证、航天试验任务总体与质量控制、微纳卫星设计与任务规划等，荣立三等功两次。

**容易**（2001级博，力学），女，2006年博士毕业（导师王希麟教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2-F运载火箭总设计师。2006年，容易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出站后，容易如愿成为火箭院总体设计部一名火箭设计师。工作在运载火箭总体设计一线的她，长期参与重型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设计，开展重型运载火箭型谱设计，带领研制团队开展大直径箭体结构、大型地面试验技术等重大关键技术攻关。

**高旭**（2001级力学），2005年本科毕业，2010年博士毕业（导师方岱宁教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博士毕业后，高旭加入到了神舟飞船的研制团队。从神舟九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一号、神舟十二号，高旭作为新生力量，在前辈的指导下快速成长，如今已独当一面，挑起大梁。

谷振丰（2002级力学），2013年博士毕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航天发射任务副指挥长。在清华读书时，谷振丰曾聆听过神舟五号先进事迹报告会，被深深地打动了，梦想的种子从此在他心里埋下，并化为强劲的学习动力。如今经过50余次发射任务的历练，谷振丰已经承担起指挥协调的重任。

聂海胜（2007级硕，航院），2010年获得清华大学航天工程硕士学位（导师郑

钢铁教授），中国首批航天员，神舟十二号任务指令长。聂海胜于1998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2005年曾与费俊龙一起执行神舟六号任务，2013年与张晓光、王亚平一起执行神舟十号任务。

刘伯明（2007级硕，航院），2010年获得清华大学航天工程硕士学位（导师庄苗教授），中国首批航天员，神舟十二号任务航天员。2008年，刘伯明曾与翟志刚、景海鹏驾乘神舟七号飞赴太空。

## 杨倩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 清华校友逐梦奥运 勇立潮头

8月8日，东京奥运会缓缓落下帷幕。本届奥运会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8级本科生杨倩、2017级本科生史梦瑶代表国家队出征并取得佳绩。首次角逐奥运赛场的杨倩，不仅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也创造了中国射击队单人单届获得两金的历史，更是打破了奥运会纪录。

不仅仅是杨倩、史梦瑶，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接力棒”在每一代清华人手中传递。截至目前，共有14名清华学生在读期间代表我国参加夏季奥运会，获得5块金牌。他们是：

伏明霞（1996级经管），曾是清华跳水队队员，在校期间获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单人3米板金牌。

王义夫（1999级经管），曾是清华射击队队员，在校期间获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金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男子气手枪银牌。

胡凯（2001级经管），曾是清华田径队队员，在校期间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首位跑进奥运会百米第二轮的运动员。在男子4×100米接力预赛中，胡凯参加的中国队历史上首次进入决赛。

刘青（2002级经管），曾是清华田径队队员，在校期间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李翔宇（2003级经管），曾是清华田径队队员，在校期间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赵颖慧（2004级经管），曾是清华射击队队员，在校期间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曹逸飞（2007级经管），曾是清华射击队队员，在校期间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李佩璟（2010级经管），曾是清华射击队队员，在校期间参加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

王宇（2010级经管），曾是清华田径

队队员，在校期间参加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

**易思玲**（2011级经管），曾是清华射击队队员，在校期间获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金牌（中国队首枚金牌）。2016年获里约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铜牌。

**叶诗文**（2014级法学），在校期间获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200米混合泳第八名。此前曾获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200米混合泳、400米混合泳冠军。中国泳坛首个“大满贯”获得者，集奥运会、长池世锦赛、短池世锦赛、游泳世界杯、亚运会、全运会冠军于一身。

**史梦瑶**，2017年进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习，是清华射击队队员，在校期间参加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

**刘晓彤**，2018年进入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入选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排球项目运动员名单。

**杨倩**，2018年进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习，是清华射击队队员，在校期间获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金牌（中国队首金）、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

在奥运赛场之外，还有许多幕后英雄。历史上，清华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有着傲人的贡献。一代代清华人勇于担当，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用青春和热血去奏响奥运的乐章。他们中有：

**荣高棠**（1932级外文），是中国第一位接受奥林匹克勋章的人，第一位带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出征的团长。为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以及1993年和2001年北京两次申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启伟**（1943届心理），曾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

**万嗣铨**（1961届土木），2008北京奥组委委员、北京“2008”工程建设指挥部顾问。

**伍绍祖**（1964届工物），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十几年任期内，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刘吉**（1964届工物），1991—1998年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1994年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

**李炳华**（1967届工化），2008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

**杨义春**（1973级工物），2008北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

**李红**（1986级土木），2003—2008年曾任国际奥委会北京2008代表处首席代表。她是历史上进入国际奥委会行政管理层的第一个中国人。

**叶乔波**（1994级经管），北京奥组委火炬接力中心特聘专家、申奥形象大使、中国奥委会执行委员。

**邓亚萍**（1996级外语），曾获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与女子双打两枚金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与女子双打两枚金牌。退役后曾任2008北京奥运会奥运村部副部长。

**杨扬**（2002级经管），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冠军，是中国首位冬奥会冠军，现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

“无体育、不清华”，未来，清华人将继续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用奋斗和热血浇筑青春梦想，以担当和智慧勇立时代潮头。

## 大漠里走出的“将军夫妻”

○颜维琦 刘宇航



1966年，朱凤蓉（左）、张利兴合影留念

1966年10月，一列闷罐车从北京出发，载着清华大学毕业生张利兴和几百位青年，向远方驶去。终点在哪里？张利兴并不确切知道。只知道，那是天山深处，一个地图上找寻不到的地方——马兰。

两年后，朱凤蓉从清华大学毕业，也来到这里。从此，他们在戈壁滩扎根，成为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亲历者，成为大漠里走出来的“将军夫妻”。

多年以后，当空中升腾的蘑菇烟云早已散尽，平沙莽莽定格为书架上的照片，张利兴挽着妻子朱凤蓉，回到了上海。面对媒体的采访，他们忆起大漠戈壁的青春和爱情，唱起最动听的少年的歌。

### 带着一张合影，出发

1959年，张利兴参加高考，前几个志愿都与原子能相关。“读高中时就知道，原子能是国家需要，所以下决心要学尖端技术。”

不久，他收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大学第二年，清华筹建工程化学系，以加快核技术研究。包括张利兴在内，工程物理系有3个班的学生整体转入工程化学系。

“我们要研究怎么从铀矿里提炼铀，毕业后去的都是艰苦地区。”张利兴说，至于“艰苦”到什么程度，大家没想，只想着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朱凤蓉是张利兴在上海吴淞中学的同班同学。因为高考成绩优异，被录入留苏预备部。一年后，中苏关系破裂，留苏不得不中断，她被选送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就这样，她比张利兴晚一年入学，又成了上下级同学。

朱凤蓉学的专业是同位素分离，那是工程物理系最保密的专业，代号220。

她至今记得系主任何东昌的告诫：“你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佼佼者，都想着成为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但我特别要告诉大家，工程物理系所从事的事业，要时刻准备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说起求学的岁月，张利兴和朱凤蓉不约而同想起那个深夜，沸腾的清华园。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员时，庄严宣布：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当晚，清华大学参加演出的学生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学校。

“当时我已经躺在宿舍床上，就听到

楼道里突然喧哗起来，我也立刻跳了下来，那个高兴呀……”夜里，张利兴和朱凤蓉都汇入庆祝的人潮。大礼堂前，欢呼声和歌声冲上云霄，在天空久久回响。

1965年，毕业分配时，张利兴毫不犹豫地在志愿表里写下两行字：“希望到大西北，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离别的时刻到了。张利兴接到通知：新疆，21基地。21基地还有个好听的名字，马兰。张利兴并不知道21基地有多远，也不知道马兰是不是有马兰花。他唯一心念念的是：带着一张合影，出发。

他鼓起勇气，找到还在学校做毕业设计的朱凤蓉。终于，一张合影，定格了两个年轻人淳朴的笑容，也定格了一辈子并肩战斗、携手奉献的人生。

### 每一天，都身处看不见的“刀山火海”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着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的天……”一首《马兰谣》，诉说着多少奋斗的青春。

“荒凉。”时隔多年，想起初见红山，张利兴脱口而出的还是这两个字。

“除了造好的几排房子，什么都没有，房子里也是空的。”张利兴工作的红山，距离基地生活区马兰还有40公里，车要往山沟里一直开，开到几乎见不到人烟的地方。

1968年秋天，带着两箱书，朱凤蓉也来了。

这个上海姑娘原本可以留在北京工作，学校希望她留校当老师。但朱凤蓉有自己的打算：“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国家需要，我想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到

一线做科研更适合我。”

建设初期的马兰基地，正是用人之时，核试验放射化学诊断急需朱凤蓉这样的专业人才。

起爆后，飞行员驾着飞机穿进烟云，冒着生命危险也只能取回数量极少的样品。而朱凤蓉和同事们要用这极其珍贵的样品，在当时仅有的商用仪器上进行分析。为了将诊断精度提高一点，再提高一点，必须设计出更好的仪器和方法。大家为此日思夜想。

一次，又是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独自一人回宿舍的路上，朱凤蓉和一匹独狼迎头撞上。夜色里，狼的眼睛发出两道幽幽的光。

对峙时，不知哪来的勇气，朱凤蓉把大皮帽子摘下，狠狠丢出去，正砸在狼的头上。狼转头跑了。

“那时候，你一定不能怕，要死死地盯着它，眼神比它更凶更坚定。我已经把腰带抽出来，准备和它搏一搏。”如今想起这段“偶遇”，朱凤蓉一脸轻松，将其视为艰难生活里的馈赠。

她更自豪的是，研究碳粒离子源技术，成功地将检测灵敏度提高了几十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诊断核弹性能有了准确可靠的数据。

“一套诊断方法的形成不是一次实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改进，做出一个个更好的‘秤’。”长时间近距离接触核爆样品，朱凤蓉也为付出了健康的代价，白细胞一度降至2000，而正常人的白细胞不低于4000。

张利兴的工作重心则在地下核试验。1969年9月23日零时15分，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后，地爆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让试



研究所办公楼前合影  
一九八五年，夫妇两人在

验区山体猛烈地摇晃起来——新中国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

为了这一刻，张利兴所在的“地质水文研究室”默默工作了近5年。

“在马兰，每一天，都身处看不见的‘刀山火海’。”张利兴说，“我们这个事业，决定了我们就是在大漠奋力地拼搏，在戈壁默默地生活。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做的是隐姓埋名的人。”

从1958年6月组建中国核试验基地，到1996年9月中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国成功进行了45次核试验。朱凤蓉完整参与37次，张利兴参与29次。鉴于他们的突出贡献，两人先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1969年12月12日，两张单人床拼到一起，张利兴和朱凤蓉结婚了。

同事大姐拿来好看的枕套，借给新人摆一摆。暖壶买不到，战友送来一个。再到基地的军人服务社买些硬糖，战友们分一分，就算是结婚仪式。

在红山，大半年的蔬菜就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和土豆。1974年，女儿降临，朱凤蓉托人从上海捎些鸡蛋来。

辗转几千公里的鸡蛋到了红山。他们找了个纸盒子，垫上棉花，将皮帽放在盒子中央，蛋放进皮帽，插上温度计监测温度，在皮帽四周布放装热水的玻璃瓶，再用皮大衣包裹纸盒子。没过多久，一窝小鸡诞生了！

“红山的日子，也不是只有艰苦，也很美。”朱凤蓉记得，夏天的雨后，远处是洁白的雪山，身边是盛开的野花；还记得忙完任务后，沿着山沟小溪抓鱼的快乐。

其实，他们有太多机会可以离开。1980年，张利兴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到国外进修。两年后，他毫不犹豫，仍旧回到戈壁。

“我们只是从清华毕业的普通的学生，仅仅因为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中，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朱凤蓉说。

如今，“将军夫妻”白发归，如同一对寻常的老人。回到上海，爱唱歌的朱凤蓉和张利兴一起，加入了平均年龄超过74岁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唱起《少年》，他们的眼睛里闪着光。

他们还爱唱《祖国不会忘记》：“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

当歌声响起，耳畔吹来戈壁悠长的风，和着吴淞口的滔滔江声。

（转自《光明日报》，2021年8月28日）

# 罗绍基：坚持改革创新 情系水电人生

○卢 鉴 陈 婧

罗绍基，1933年出生于广州，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此后在电力工业部中南勘测设计院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设计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院长、院长。20世纪70年代，罗绍基任湖南凤滩水电站设计总工程师，建成了我国第一座高112.5米空腹重力拱坝坝内厂房，解决了狭窄河谷厂房布置与大泄洪量的矛盾，节省了投资。该新坝型科研成果“混凝土腹拱坝”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起，任广东抽水蓄能电站联营公司总经理，主持建设、运行、经营我国首例、世界最大的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他推行运行管理改革，使电厂获全国第一个“一流水电厂”称号。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业内评价罗绍基是我国水电工程抽水蓄能技术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为推动我国水电工程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日，罗绍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顾了自己在电力行业66年的奋斗历程。

罗绍基从事水电站设计和建设管理已有66年，今年88岁的他精神矍铄，谈起自己热心水电事业和首倡的广东抽水蓄能领域，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

抽水蓄能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罗绍基说，它是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电把下水库的水抽到上水库内，以水的势能的形



罗绍基学长

式蓄能；在系统负荷高峰时段，再从上水库放水至下水库进行发电，将水的势能转换为电能，为电网提供电力。

他说，在清华读大学时他所学的就是水电专业，毕业后，他曾长期在水电勘测设计单位工作，参与了湖南凤滩水电站、贵州天生桥水电站等工程建设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他回到故乡广东广州，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大规模西电东送开始实施，深圳大亚湾核电站也在筹建中，他认为抽水蓄能电站前景广阔。

他说：“我到了广东以后，就感觉到电力供给有问题。广东的火电多，水电少，用电负荷的峰谷差很大，调节非常困难，电能质量很不稳定。蓄能电站能快速响应，而且容量大，可以发挥很好的调节作用，我就萌生了建设抽水蓄能电站的想法。”

1988年，为保障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平

稳安全运行，罗绍基开始负责组织建设当时世界上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工作。该电站位于广州从化区，总装机容量240万千瓦，分两期建设，水头（上、下水库的高度差）超过500米。这样高水头、大容量的抽水蓄能电站，当时在我国还是第一个，设计和建设都没有经验。

罗绍基回忆说：“一开始是很困难的，没有准备工程。那么大一个工程要放在现在的话，一般都要平好地、盖好房，工人才进驻。当时我们施工队伍什么都没有就开工了，工人住在山下水库的库盆里边，我也住在里面。”

在电站设计和建设过程中，罗绍基和同事遇到不少技术难题，比如高压岔管的设计，按照当时的规范，需钢板衬砌，而钢板运输、成型、焊接都要在地下隧道进行，施工难度很大。改革开放让他能对标国际进行建设，他创新地引入了钢筋混凝土岔管、斜井混凝土衬砌的施工和电厂自动化控制等先进技术，提前了工期，节约了成本，并提升了国内施工人员在实际水电站建设中的技术和管理水平。1997年，“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实践”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过程中，罗绍基还大胆地进行了三方面改革：一是对建设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打破了过去建管分离的模式，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二是对运行体制进行了改革，引进了外国电力公司运行管理经验，实践出一套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管理模式；三是对经营管理进行了改革，广蓄电站建立了容量租赁和容量使用权出售的经营模式，改变了以电量计价为经营指标的模式。英国媒体当

年曾如此评价广蓄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不仅是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工程，也是国际合作提供最佳设备和施工技术的一个光辉典范。毫无疑问，它将作为未来更多抽水蓄能电站的模式和衡量标准。”事实上，这些成功经验现在已经在全国水电厂管理中得以推广，大幅提高了中国水电厂的管理水平。

“改革和创新是永恒的话题”。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南方电网区域正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着力提高利用效能。罗绍基认为，在新时期电力行业充满机遇与挑战下，唯有迎难而上、保持改革创新才能实现我国水电事业高质量发展。

退休后，他依然持续关注电力行业的改革和创新，关心着南方电网调峰调频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他受聘为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副组长，南方电网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公司广蓄公司顾问。因电力体制改革而成立的专业化公司——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于2006年7月成立，目前总装机容量1073万千瓦，罗绍基院士始终关心着该公司的发展。今年底，该公司建设的规划装机240万千瓦的广东梅州抽水蓄能电站将投产发电，相同容量的阳江抽水蓄能电站将于明年投产。他期盼着新电厂的建成。

回忆起70年前自己的清华岁月，他说，年轻时候的偶像是自己的同乡、爱国工程师詹天佑。他希望年轻人都要保持爱国理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推动水电事业高质量发展。

（转自新华网，2021年7月5日）

# 吴硕贤：理纬文经织锦成

○黄蓉芳 龙 镛 叶作林

18岁以全国高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37岁成为中国建筑界与声学界培养的第一位博士，44岁首度阐明声学虚边界原理，57岁成为中国建筑技术科学领域首位中科院院士……吴硕贤院士的人生轨迹是一部鲜活生动的“学霸养成记”，其学养才情贯通文理，不仅诗书写作皆有造诣，还善于从文学艺术中寻求科研灵感。在他身上，文理交叉编织、相互融会，成就了文理双美的意境。

## 从少年诗人到理科状元

吴硕贤的父亲吴秋山是知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家，母亲是一名语文教师。耳濡目染下，吴硕贤从小展现出古诗词、书法等方面的天赋。他最初的志向便是成为诗人或作家。

“长天如海云为浪，变幻升腾泡沫翻；霞玉纷飞三百丈，顿成大雨落人间……”这些气势豪放的诗词便出自13岁的吴硕贤之手。著名文学家叶圣陶曾写信评价其作品“诸作大体均佳，读之有余味”。

初三时，吴硕贤却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在《爱科学》一诗中阐明了原因：“停设备，撤专家，蜜月期终关系差。始立攀登科技志，徜徉数理咀英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所有科技专家。吴硕贤从小阅读《说岳全传》等古典文学，深深被抗金英雄的气节所打动，内心也希望于国家危难时能挺身而出。

立志攀登科学高峰的吴硕贤不仅看了



吴硕贤学长

诸多数理知识的课外书，也积极参与学校的学科竞赛。“中学时在数学、物理所下的苦功，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吴硕贤表示。

1965年，吴硕贤以福建省理科状元、全国理工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录取。他作为少数几位新生代表受到清华大学时任校长蒋南翔的接见，并鼓起勇气说出“想成为科学家”的志向，校长的鼓励让他更加坚定了理想。

## 矢志不渝追求梦想

1970年，大学毕业的吴硕贤被分配到西安铁路局基建处工作，1974年又调到南昌铁路局第二工程段和福州设计所工作。

铁道工程师的职业与建筑学专业有一定的距离，也让吴硕贤的梦想偏离了轨道。但他挤出时间，系统地自学了包括公共建筑设计、建筑史以及全部的结构课程。

1978年，党中央作出“恢复研究生招考”的决策。吴硕贤选择报考研究生，继续圆“成为科学家”的梦。31岁的吴硕贤最终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技术科

学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数理基础好，吴硕贤在导师的建议下，将研究方向由建筑历史转向建筑声学。之后他又成为建筑学院仅有的三位博士研究生之一。

吴硕贤的博士论文题为《道路交通噪声的预报、计算机模拟及其在城市防噪规划中的应用》。这个课题当时国内无人涉及，但吴硕贤却开拓性地提出了城市交通噪声预报、仿真及防噪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1984年，吴硕贤成为中国建筑界与声学界自己培养的首位博士，前往浙江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化加速，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相比于建筑设计，建筑声学确实略显“边缘”，但吴硕贤选择“甘磨板凳守清贫”，他所提出的“混响场车流噪声简洁公式”“厅堂响度评价新指标和计算公式”等学术成果为建筑与环境声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98年，他调到华南理工大学。此时国内的剧院、音乐厅、会议厅迎来建设热潮，这些建筑对声音品质要求高，建筑声学等来了春天。

吴硕贤团队陆续承担过包括人民大会堂、广州大剧院、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广东粤剧院等近百项工程的声学研究与设计任务，填补建筑声学领域的多个空白。广州大剧院被评为“世界十大歌剧院”之一，是亚洲国家剧院中唯一入选的剧院。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在首届世界建筑节上摘取公共建筑类的最高荣誉，成为我国参评建筑中唯一一个获奖项目。

2005年，吴硕贤当选全国建筑技术科学领域首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心情平静地写下《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感怀》一诗：“半世追求谋致用，平生研究贵坚持。”

## 文理兼修 融会贯通

“理纬文经织锦成”是吴硕贤对自己治学理念的概括，即把治学当作编织锦缎，以理科知识为纬线，以文科修养为经线，理与文交叉编织，相互融汇。

声景、香景和光景便是人居环境的三种重要景观，分别是诉诸听觉、嗅觉和视觉的风景。它们对于美丽中国建设、生态城乡建设及保留乡愁具有重要意义。

吴硕贤曾发表《〈诗经〉中的声景观》一文，发现《诗经》中28%的内容均与声景有关，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习习谷风，维风及雨”等诗句，便反映了自然界中鸟唱虫鸣、风声雨响等自然界的声景观。

他还发现《诗经》中有大量篇幅描述先民对包括日、月、星三光以及对彩虹、庭燎等由光所造成的景象的观赏。受到启发的他首次提出光景的概念，并倡导建立光景学的新学科，在国内外相继引起后续的研究。

文理贯通让吴硕贤沉淀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科研轨迹。在他看来，科技工作者必须具有人文素养。因为科技能造福人类也能危害人类，科研工作者可以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也会陷入急功近利、弄虚造假的迷途。而人文素养能帮助科技工作者选择正确的道路。

吴硕贤的科研事业与他的诗歌一样，充满对自然、生命和友情的热爱，以及对普罗大众的人文关怀。他不遗余力地呼吁社会对人居声环境的关注，推动中国建筑及建成环境的使用后评估。

（转自《广州日报》，2021年9月13日，有删节）

# 潘毅：全球视野与中国情怀

○李 静 张 超

潘毅，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后在计算机系攻读硕士学位，1991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计算机与生物信息领域的交叉研究，已发表SCI期刊论文250余篇。曾任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主任、生物系主任、副院长、终身教授、杰出教授、州校董教授，现任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2021年2月，潘毅因其在生物信息领域的杰出贡献入选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他设计和开发了许多生物信息学算法和工具，有力推动了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的发展。

## 高考恢复：这是一次人生的转折

1977年，高考恢复，潘毅与全国无数的青年学子们一样，心中对未来充满了憧憬。那一年，他走进考场，并以江苏省理科状元的成绩顺利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弹指一挥间，40多年过去了，如今从大洋彼岸重回祖国的他，几多感慨，又几多欣喜。“1977年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因此与清华结缘，走向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潘毅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父亲是当地的税务所所长，母亲是工厂车间主任。“小时候父母对我的学习干预很少，我基本上是按照学校的培养步骤去读书的。”



潘毅校友

尽管母亲文化水平并不十分高，但是却一直很呵护潘毅对科学的好奇心。“母亲的工厂里当时研究一个比较高端的东西——激光定向仪，我常常去那边玩，对仪器很感兴趣，慢慢还学会了自动组装一些东西。母亲很鼓励我去动手、去尝试，在她眼中这就是科学技术，学会了技术将来再差也能在工厂里做个技工，这算是她比较朴素的一个信念。所以很长时间我也一直以为自己的人生将来会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在工厂里做个技工之类的。”

历史波澜壮阔，潘毅那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最先盼来了改变命运的曙光——1977年，一个振奋全国学子的好消息从教育部传来，中断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将要正式恢复了。

“其实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放弃读书，像江苏地区历来重视教育，我所在中学的教师水平就比较高，我的语文老师是姚淦铭，他后来也考上大学成为了教授，最近几年还上了百家讲坛；英语老师是留

学生，当时他已经可以全英文授课。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一直坚持读书，老师也一直鼓励我们‘高考一定会恢复的’。”

由于信息匮乏，高考后填报志愿，各个专业是学什么的、学成后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潘毅一无所知。只因对母亲所从事的工作从小耳濡目染，于是他便在志愿填报中选择了科学技术相关专业的，来到了计算机系。

“幸运的是，来到计算机系后，我非常喜欢这个专业，这也成为了后来我事业上的主耕领域，大概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采访中，潘毅一边回忆，一边饶有趣味地讲诉着那段经历。

### 清华八年：母校帮助我全面发展

初入清华园的潘毅，那一年刚刚18岁。作为南方人来到北方求学，地域饮食带来的差别一开始令他有点不习惯。“南方人一般吃米饭，来到北京饮食上我有点不适应，这算是一个小小的烦恼。”

“当时班里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同学30多岁了，有的同学当过公社书记又参加的高考，我是应届生，年龄应该是最小的，所以老师们和大哥哥大姐姐们都非常照顾我。在温暖的集体里朝夕相处，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所以饮食上的那点小烦恼我很快就抛诸脑后了，慢慢找到了学习和生活的乐趣。”

水木清华，往事依依，岁月留下的痕迹有深有浅，但镌刻在人脑海中的感情却历久弥新。潘毅提到，他对母校三个方面印象深刻：“一是教我育我的恩师；二是计算机系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三是母校不仅注重我们的学习成绩，还注重培养我们全面发展的能力。”

“特别感谢栽培我的恩师们，我认为他们不仅是‘专家’，还是‘教育家’，骨子里有立德树人的精神。我有幸聆听了很多大师级教授们的课程，比如王尔乾老师讲授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课程，黎达老师讲授的‘数字逻辑’课程，等等。他们知识渊博，课堂上旁征博引，不仅为我打开了计算机世界的大门，更让我领略到了科学的严谨和优美，是高山仰止的楷模。还有系主任唐泽圣老师，王鼎兴老师、郑纬民、沈美明等老师，我的班主任汤志忠老师，我的导师金兰老师，等等，都非常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大师的架子。另外，同学们当时的基础不一致，有个插班生，是个工农兵学员，基础薄弱，老师们就一边在生活上关心他，一边为他补习知识。学校和系里也精心安排了教程和师资，解决同学们的学习问题……”

“印象深刻的时当时机器匮乏，我们上课用机房都要排班，每个人只有一个小时的操作实验时间。有一个作业要求我们计7班以硬件为主，用简单集成电路零部件搭配一个计算机，用二进位计算，指令集也非常简单，比如只有加减一，但是各种基本的功能都在。一开始觉得很有难度，但是坚持下来我们真的做出来了。通过这样的训练，我们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都得到了提升，大家明白了计算机最基础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深刻理解了计算机的源头。听说，咱们系里至今仍然保留着让学生们亲自动手做一台计算机的作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值得一直传承下去。”

在清华期间，不仅是学习，潘毅还积极参加文艺、体育、社工等活动，让自己全面成长。“记得我的体育一开始比较



百年校庆时，潘毅（右1）与恩师金兰教授（右2）等在母校合影

弱，因为14秒跑不了100米就无法毕业，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不断去锻炼、去突破。一开始也觉得不公平，感觉太难了，但是真正坚持下来，我发现自己不仅体育成绩有了长足的进步，就连体质也改善了。最重要的是，在突破自我的过程中，我还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缺点，修炼出了平淡的心态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包括现在，我研究生物人脑，理解了不同个体之间基因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有优劣势，研究中常常存在挫折，那怎么办呢？依靠的还是当年在清华练就的良好心态，以及坚持下去的恒心。”

18岁进入清华时，尚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26岁离开清华时，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清华人。“母校的培养让我拥有了一种人生的底气，一种精神上的韧性，令我在任何场合都不卑不亢、从容面对，这让我终身受益。”潘毅说道。

### 海外经历：全球视野与中国情怀

1985年，潘毅在他的导师金兰教授的指导下发表了一篇有关分布式系统的国际论文。“那个年代，国内能够被国际顶尖

会议录取一篇论文是比较难得的，后来金兰教授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我也有机会去加拿大深造。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当时手里拿着30块美金，竟然就有勇气去闯荡世界了。”潘毅笑着回忆道。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学习了一学期后，潘毅转学到美国匹兹堡大学。1991年，他取得了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怀着对科学的向往和热爱，毕业后他一直在高校心无旁骛地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2000年，他加入了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四年后就成为了终身正教授。

2005年，潘毅被任命为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在此之前，该系在美国众多高校中排名平平，甚至还不具备培养博士生的资格。在潘毅的运营和管理下，仅仅过了五年，该系就培养出了50多名博士生，更在生物信息领域一跃跨入美国大学同行排名前列，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潘毅可谓贡献卓著。

多年的从教和担任系主任、副院长的经历，让潘毅积累了很多经验，也让他对“管理者”这个身份有了深刻的思考，总结下来，心得有二：

其一，是全球视野。潘毅认为，作为管理者要拥有全球化的视野，要思考未来会有哪些东西影响世界，从全球视野下去谋划院系、科研的发展，只有把它们放在全球视野中去审视，不局限于一地一时，才能知道未来的方向、位置、高度在哪里。

例如，院系要发展，那么人才是首位的，要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延揽高层次人才。担任系主任期间，潘毅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成功将6位杰青招入麾下。科学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要站在全球视野下去看待，有时候冷门领域不代表做不出成绩

来，关键是要对人类未来有积极的意义，“比如我钻研的是计算机与生物信息领域，我认为这类研究关系着人类未来的健康，我们在此领域长期探索，近年来，团队一起拿了不少奖项，国际排名也日益靠前。”

其二，是中国情怀。身在国外，有不同的肤色，多元文化交织融汇在一起，文化藩篱不可避免，当管理者面对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如何处理呢？

“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情怀，我们讲究友好和谐，讲究互利共赢，讲究和而不同，讲究兼容并包。那作为管理者、领导者，我愿意去包容、去帮助、去平衡不同的人，尽量给予同事们公平、平等，让每个人在他的岗位上发挥不同的力量，大家和谐共处，共同发展。这就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一种友好的态度，这样的理念和情怀包含着我们几千年的智慧，我认为运用在工作中大有裨益。”

### 归国之后：在深圳开启全新征程

人生到了某个阶段，就会特别想要回归自己心中的根。在国外，潘毅事业有成，前途光明，但却时刻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漂泊，找不到心中的根。

2020年底，潘毅放弃了在国外的终身教职，全职回到国内。由于他的突出贡献，乔治亚州立大学在2020年12月授予他州校董荣休教授称号。“回国以后，面对熟悉的文化、亲切的面孔，我的幸福感变得很高，连吃饭每次都能吃得光盘，看来我还是以前的中国胃。”潘毅笑着说。

而之所以把人生的下半场起点定在深圳这个城市，则是因为它的包容性和年轻化。潘毅表示：“祖国拥有强大的磁场，

深圳具有它独特的吸引力。当今科学正处于黄金时代，我希望未来在这里发光发热，多做一点纯粹的研究，为国家引进和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立足深圳，也放眼世界。目前，潘毅已正式担任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中，他结合自身在海外的工作经验，参照国际知名高校的人才遴选制度和培养模式，力求为高科技人才创造理想的研究环境，并培养学生与国际接轨的能力。

他还向清华的师弟师妹们抛来了橄榄枝：“目前我们在全力引进人才，这里三清的还不多，热切期盼你们加入进来，一起贡献清华人的才智和力量。”

2021年2月，潘毅当选为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将计算机与生物技术融合起来”一直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此次荣获院士也是源于他在此领域做出的贡献。

“计算机与生物技术的交叉融合研究前景广阔，会大大提高医学效率，对于未来人类的健康具有积极的研发意义。比如药物设计，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分子有无数个，针对一种疾病，如何快速找到合适的药物分子是个难题，我们的研究就利用计算机来辅助筛选，这样能大大提高效率，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对于特殊患者而言就争取了更多时间。”潘毅解析道。

尽管这个领域目前看来不如大数据、区块链等热门，但是潘毅却对此锲而不舍，充满动力，“科学研究有热门，就有相对应的‘冷板凳’，未来我们将坚持在这个领域深入探索，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地去付诸努力，就有实现它价值的那一天。”

（计算机系分会供稿）

# 坚持成就梦想 细节决定成功

## ——在 2021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夏德明（1998 级电机）



校友代表夏德明发言

夏德明，199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2002年直读本系博士研究生。辽宁省省级优秀专家、国家电网公司优秀专家人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现任国家电网公司东北分部调控分中心主任工程师。曾获英国伦敦国际发明金奖、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等20余项科技奖励，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4项。2020年11月，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202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首先，请允许我向即将毕业的同学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我于199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2002年本科毕业直读博士，师从电气工程学术泰斗——卢强院士。在卢老师的鼓励下，2007年博士毕业后，我没有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是选择回到家乡东北

黑土地生根发芽，入职东北电网公司，从事调度运行工作。一晃已经14年了，但在清华学习生活的经历始终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和不竭的动力源泉，激励我在平凡中坚守初心、砥砺奋进。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成长感悟：

一是坚持梦想，不忘初心。每个人都有梦想，毕业在即，相信大家都是踌躇满志，有梦想、有追求，渴望做出一番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上大学以前，我的理想就是考入清华；来到清华园，经过9年的学习，我从对电力系统一无所知的懵懂少年，成长为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电力博士，也逐渐树立和坚定了成为电力系统生产运行专家的梦想。真正走到职场第一站——电力调度员岗位时，才发现还有很多不懂不清楚的东西，有些看似简单的工作也可能让你无从下手。课本理论与工程实际之间，隔着“师带徒”的传承、经验教训的积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每个初出校门的人所需要补的社会实践课，而清华的经历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气和不服输的精神，让我能够静下心来，从零开始。刚工作那时，我没事就呆在单位里学习，熟悉网情资料、水文参数、调度规程，跟踪国内外发展的新技术、新问题，还积极承担处内各项科研、工程项目。

现在想来，正是有了当初的坚持和后来的点滴积累，才让我逐渐成长为国网优

秀专家、辽宁省“百千万工程”千层次、百层次人才，辽宁省优秀专家、兴辽英才青年拔尖人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获得者，一步步向自己的梦想迈进。

**二是注重细节，精益求精。**从电力调度员、系统稳定专责到副处长、处长、调控分中心主任工程师，我在调控中心一直从事安全生产运行工作。生产无小事、安全重于泰山。为做好生产运行工作，我对计算的每一个控制限额、编制的每一个定值反复校核，对起草的每一份规程、规定字斟句酌。无论作为规程规定、定值方案的编制者、会签者还是审核者，始终树立我就是最后一道防线的责任意识。随时把手机放在身边，保持24小时开机，确保调度台或其他同事在遇到电网运行紧急情况时，能够第一时间接通电话，做好技术支持工作。

十余年来，我始终怀着敬畏之心，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避免出现任何纰漏和差错，将东北电网主要的安全问题、运行规定、控制策略烂熟于心，无论何时调度台来电话，我总能提供准确的信息，给出专业的意见，成为领导、同事信赖的人。

**三是勇挑重担，心怀家国。**近些年，国家电网公司为保障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助力风电、光伏新能源消纳，克服重重困难创新创效，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办法，在大电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我有幸参与其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了一点有利于公司、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事，我感到很自豪，我也由衷地感恩在国家能源转型升级新能源高速发展的时期，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国家战略目标的大舞台上，我可以提升个人能力、发挥个人才学、实现一点个人价值，也因此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9项，获得各类科技奖励20余项。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带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往小了说，不辜负父母、亲人、老师、朋友的期待；大一点，要有一点家国情怀，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让国家、民族、世界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日常工作中，我们不必太计较个人得失，要富有团队协作精神，最重要的是想着干事、成事。有时候，努力了未必马上有回报，但是不努力那就更难有收获。最好的心态是但行耕耘，秉持清华人“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始终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不放弃、不抛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始终坚信，梦想从不抛弃苦心追求、心怀高远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钻一行通一行。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地完成每一项工作，那么小细节也能练就大本领，小事业也能成就大格局，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担当！

学弟学妹们，今天，你们因清华而骄傲；明天，我们也要努力为清华添光彩。路在脚下，梦在前方，唯有脚踏实地，方能行稳致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让我们一起扬帆起航，“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坚守清华人的家国情怀，为我们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 ——在 2021 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 吴蓓丽（2001 级博，生物）



校友代表吴蓓丽发言

吴蓓丽，2001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2007年至2011年，在美国 Scripps 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11年回国，加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现为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组组长。先后荣获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系统杰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上海市“浦江人才”称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等诸多荣誉和奖项。

我是2001级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生物物理专业研究生吴蓓丽，非常感谢母校给我机会作为校友代表在这个庄严的场合发言，这是我莫大的荣幸。很高兴回到阔别15年的清华园，见证母校又一届桃李芬芳，见证学弟学妹们梦想起航！在这里，我要祝贺你们，祝贺你们顺利完成学业，迈入人生的下一个征程！我更要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壮志在胸，理想在怀，以梦

为马，不负韶华！

20年前，我带着憧憬与梦想第一次踏进清华园，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5年。还记得在实验室里捣鼓瓶瓶罐罐、与蛋白和细胞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还记得一到饭点与师兄弟姐妹们一起穿梭在各大食堂搜寻美食、高谈阔论的快乐时光。在那5年里，我聆听了学识渊博的恩师们的教诲，坚定了投身科研的信念；结识了一群具有家国情怀、个性鲜明又低调务实的同学，收获了友情和支持；遇到了志趣相同、情投意合的终身伴侣，获得了温暖和力量。

虽然已离开母校多年，但母校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早已成为我的座右铭。2001年，我进入饶子和院士的研究组学习，开始从事结构生物学方面的研究，通过探究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微观结构，阐释各种生命活动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饶老师把我领进科学的研究的大门，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对结构生物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高尚的人品和对科学执著奉献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让我更加坚定了投身科研的信念。感谢清华，让我遇见了大先生；先生之大，使我看见了大学问；学问之大，使我感知到“小我”之外还有一个广阔无尽的世界。

从清华毕业后不久，我前往美国 Scripps 研究所 Raymond Stevens 教授研究

组开展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开始从事当时世界上结构生物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G蛋白偶联受体三维结构研究。这类受体蛋白是人体内重要的信号转导分子，与各种疾病密切相关，是最大的药物靶标蛋白质家族。但是，其结构研究极为困难，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人体内有800多种G蛋白偶联受体，但直到2007年还没有任何一个结构被解析。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做出自己的成绩！

很快，我开启了艾滋病毒共受体的结构研究项目。为了我心中的梦想，三年间不断调整各种实验条件，“997”的辛苦自不用提，最让人煎熬的是无论如何尝试依然无果。然而，清华5年来对我的悉心培养，饶老师5年来对我的谆谆教诲，不但练就了我娴熟的实验技能，更铸造了我骨子里“永不放弃”的信念。就在很多人认为课题“没有成功迹象”的时候，我尝试了一种在当时被认为不太可能成功的实验条件，终于在一个拥有最美晚霞的傍晚，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最美的风景——蛋白晶体！那一刻，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劳，所有的汗水都值得了。

自从到美国的第一天，我就打定主意，学成后一定要尽早回到祖国，为我国的蛋白质基础研究贡献一份力量。2011年，我回国加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当时，G蛋白偶联受体结构研究在国内基本是空白，我们“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小到枪头试管，大到仪器设备，一点一点积攒。抱着“再难也要往前走”和“缺人手，我一个顶仨”的想法，手把手带学生，分秒必争做实验。经过努力，我们很快建立

了国内首个G蛋白偶联受体结构生物学研究平台，针对多种重大疾病相关的G蛋白偶联受体开展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连续在*Nature*、*Science*和*Cell*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我们还努力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围绕传染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开展药物研发，候选药物进入临床研究。如今，我国的G蛋白偶联受体研究水平已经并跑全球，在某些领域更是处于领跑地位。

再过20多天，我回国就整整10年了，一路走来，感受颇多。“坚定梦想，不忘初心”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有梦想，更有行动，所有的不可能才能一步步变成现实；“甘于寂寞，永不言弃”使我们坚定前进的信念，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潜心研究，稳扎稳打；“严谨认真，追求极致”是我们前进道路上始终的坚持，细节决定成败，做到极致，才能领略别样的精彩。

同学们，作为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或许你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今天走出这个校园后，会像我一样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当然，也会有更多的同学，将耕耘在其他各个领域。但是，请你们相信，无论你们要做什么，母校对你们的培养都将深深影响你们的一生，清华园的精神和清华人的风骨将永远镌刻在你们的心中。

同学们，人生短暂又漫长，短暂得甚至来不及完成一件事，又漫长得似乎可以做好每件事。唯有以梦为马，方可不负韶华！

再一次感谢母校的盛情邀请，真诚地祝愿母校日新月异，桃李芬芳！祝愿各位老师工作顺利、幸福安康！祝愿各位学弟学妹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 壁越厚，越要向星辰大海去破 ——访在甬创业清华校友

○陶天野 张 霞（2019级新闻） 熊星玥（2019级外文）

宁波素有“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美誉，三江潮涌汇英才，清华人的身影亦在其中绽放。据不完全统计，如今清华在甬校友已有400人规模，平均每年新增到甬校友15—20人。他们当中，更有一批创业者，在各自的领域披荆斩棘，深耕不辍，渐成为地方乃至中国经济体中一股活跃的力量。

跳出了舒适区，离开了寻常路，放下了铁饭碗，创业的艰辛往往超出常人所想。如何突破重重障壁而始终自强不息？为此，清华校友总会采访了1982级汽车工程系校友潘道良、2000级工程物理系校友汤凯、2001级工业工程系校友何盛华、2003级软件学院硕士校友郭成四位在甬创业者。或为技术理想，或为家国情怀，或为传递某种先进的理念，或为表达某种人生的态度，四位校友分别以自己的创业故事作出了回答：壁越厚，越要向星辰大海去破。

## 潘道良：扎根技术理想

潘道良已经在稀土磁材领域躬耕了数十年。

对大多数人来说，稀土不是日用词。它似乎常常是国际关系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珍贵资源。但其实，随着现代社会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建立在传感基础上的人与物的关联已

离不开磁性材料的支持，以此为原材料的零部件正不知不觉进入人们的生活，参与到“技术改变世界”的进程中。

1982年，15岁的潘道良考入清华大学汽车系内燃机专业，是系里年纪最轻的。第一次离家向北，他从杭州坐了27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清华，一进南门，看到两排高大的白杨树，沿路走了快两公里才到一号楼。

尽管年纪尚小，本科阶段他的成绩却始终保持在年级前几名，并于1987年被保送研究生。硕士毕业后，潘道良回到宁波，用了五年时间在国企、近十年时间在乡镇企业做工程师，随后自己创业，生产磁性材料及相关机电设备，一晃至今。

从清华走来，潘道良对技术始终怀有某种坚信和热情，这让他在面临人生的关键选择时总是格外果断。

1994年，他离开宁波动力机厂，加入彼时还未上市的韵升集团。在那个当口，从国企跳槽到乡镇企业颇需要些勇气，但韵升集团新配备的最前沿的计算机工作站和CAD资源吸引了他：“配置这样一套系



潘道良校友

统怎么说也得上百万，这让我觉得虽然企业刚刚发展起来，却有长远的潜力。而且在那里，我能学到新的东西，能完全投入地做我的技术研究，这是很难得的。”

1996年，韵升集团开始生产稀土永磁。“稀土永磁听起来很神秘，但说穿了其实也就是磁钢、磁铁，或者更通俗地称为‘吸铁石’。”潘道良解释。从那时起，他担任集团的磁性材料研究所所长，重点从事稀土领域的研究和技术开发。作为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总经理”相比，潘道良更喜欢“工程师”这个头衔。

但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此，而是由技术出发，探索更多可能。于是，2004年，当他负责的钐钴项目即将由于市场原因被中止，他索性带着一支七八个人的团队离开了韵升集团，自行创业。“那时有人对我说，你的身份就是搞技术的，开工厂的话会成功吗？当时我就不服气，憋着这么一股气，我想，那行，我就试试看。”讲到这个大胆的决定，潘道良颇有些热血和英雄气概。

2002年他在宁波买了套房，到2004年房价翻了一番，他却为了创立宁波科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把房卖了出去。在那个没有“天使投资人”等融资渠道的年代，这就是他破釜沉舟的启动资金。从筹备到投产，半年时间建起一个工厂，潘道良需要处理各种技术之外的事务。其中，最要紧的是市场。

当时的市场几乎全部在海外，他便搜寻网络信息，发邮件联系欧美企业。尽管已经十多年没有用过英文，但他庆幸地发现，“在清华上了那么多年，底子还在，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

语言并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放大了他的优势：“一来，我本身懂技术，可以直接跟国外的工程师交流；二来，我作为创业者，销售价格上自己就可以拍板，不需要层层汇报，也不需要经过翻译或中介的传达。”懂技术、能做主、会英文，这让宁波科星在竞争激烈的磁材行业中很快立住脚跟。

然而，创业并非一劳永逸之事，危机感时刻存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关系都因此受到了影响，潘道良意识到，“一条腿走路不行”。考虑到国内的磁材需求量日益增长，他将原先100%外销的产品部分发展为内销。2011年，稀土永磁原材料的价格大幅上涨，譬如镝，仅半年时间，就从60万/吨涨到了1600万/吨。资金紧缺，潘道良遂决定与更有资本实力的大型企业展开合作，并适时调整业务及股权结构。

经过调整，公司化“危”为“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场。今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载人飞船中的电机使用的钐钴磁钢便是宁波科星生产的产品。“我们现在也是国家少数定点为军方提供磁钢的单位，虽然在航天领域的供应指标并不大，但足够我吹牛了，”潘道良笑起来，“比如火星探测器，它要行动，自然是需要电机带动，而电机的主要零部件就是磁钢。”

在民用方面，目前稀土永磁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领域。譬如档位传感器，不管是P档还是D档，抑或是ABS和安全气囊，都需要用到它。“智能的前提是判断，所以感知端就用到我们的一个产品；

信号传输到执行端后需要电机去驱动，这时便会用到我们的另一个产品。”潘道良解释。

15岁进入清华学习汽车工程，毕业，跳槽，创业，一晃40年过去了，潘道良仍在和汽车行业打交道。他觉得很神奇，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引导他走回了这条路上。

他总是满怀热情地提到清华，读研时实验室的师傅和老师们说要去宁波看他，他爽朗一笑：“没问题，都来！”他也如数家珍地说起行业里的同门和故事，言语中难掩骄傲：“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大佬们是谁？很多都是我们汽车系的师兄弟啊。”工作中，清华的前辈和同行们也总是愿意给他多一些机会，这让他十分感激。

脚踏实地是清华人的传统，潘道良也抱着“宁可不赚钱，东西也要做好”的态度一步步向前走，在行业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他们说，潘道良这个人做事情实在，不会骗人。这其实就是我们清华人的价值所在。”

从清华走出30年，潘道良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他铭记“行胜于言”的教诲，以技术为根又不囿于其界限，在磁材行业里开垦出自己的应许之地。

### 汤凯：预见智能未来

“我研究的，就是人因安全技术。”汤凯坚定地说道。

人因安全从人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减少人因失误造成的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针对人因安全管理，汤凯有着一套独特的创新型理念：“我把安全管理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个体

时代、协同时代和共生时代。”

所谓个体时代，简单来说，就是谁出错，谁负责。但由于人类个体犯错不可

避免，这样的管理方式只会让工人想方设法逃避责任，无法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随着知识积累，认知进步，一些欧美企业已经脱离个体时代，进入了协同时代，允许个人在一定范畴内犯错，将个人的错误在组织层面上进行反思和改进，从而避免再次发生。在智能共生时代，“我们可以利用AI技术，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对每位员工知识赋能，弥补人类生理进化的不足”。这正是汤凯的创业方向。借着国内工业大数据的优势和技术革命的浪潮，汤凯希望引领中国企业完成从个体时代到共生时代的飞跃。

汤凯的安全理念植根于多年经验观察的沉淀。“我本科和硕士在清华学的都是核工程专业，”汤凯回忆道，“从2004年毕业到2017年，我一直在核电行业工作。”14年的工作经历，不仅让汤凯成为行业内的核电安全专家，还让他看清了行业的痛点与市场未来趋势。

最初，汤凯在中核集团三门核电负责反应堆运行安全，相当于核电站非日常期间的最高资源调集者。他踏实负责的态度和突出优异的表现，让领导十分器重他。2015年，汤凯到美国乔治亚州的南方核电旗下Vogtle核电厂访学。Vogtle电厂运行部经理约翰·博斯（John Bowls）展示了该



汤凯校友

厂的先进管理理念：他们将日常操作经验整理成规程，由全体员工严格遵守；而规程的每一次更新，都是组织知识的积累。如此日积月累，随着规程的更新，整个企业的集体智慧也不断壮大。

回到国内，汤凯形容自己“就像唐三藏取经一样”，把所学所得反哺给了自己归属的团队，他也有了一“汤三藏”的称号。2016年5月22日19时22分，全球首台AP1000主泵在三门核电启动，主控室内所有操纵人员都举起一只手，等待重要信息通报。为什么大家要同时举手？汤凯解释道，举手示意是此时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在这个仪式中，所有操作人员都知道彼此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谁将负责任，从而实现了集体行为的知识化。与Vogtle电厂的文件知识化类似，“举手”的仪式将行为本身当作一种知识，帮助仪式参与者进行协同。“现在回头看，三门核电的安全运行业绩在世界同类核电机组中遥遥领先，在全球所有核电站的建设与运行安全业绩上名列前茅。”在汤凯和同事们的辛勤耕耘下，先进的安全生产理念在三门核电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与此同时，四顾其他行业，汤凯却痛心地发现，市场上的传统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相较自己从业的核电行业相差甚远，无论是认知水平，还是技术应用，都不在同一层次。他想到，若是把自己在核电实践中学到的安全理念，结合AI技术应用到传统行业当中，就可以帮助更多企业减少生产事故。本着“减少一起事故，挽救一个家庭”的情怀，汤凯离开核电站，创立了欧依安盾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了他的“第二人生”。

在清华读书时，汤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他常常自习到深夜才回寝室，宿舍大门锁了，就从楼侧面的消防梯爬上去；元旦当晚，别人在通宵狂欢，他则在五教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这样充沛的精力和坚韧的意志，让他先后在同学和同事中脱颖而出。

然而，当他一个人创业时，才慢慢悟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努力也要找准方向。

“以前我总是想把好几件事同时做好，”汤凯说，“后来我发现，创业者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怎么让手下的团队专注一个方向、打磨好一件事，才更重要。”创业三年，汤凯一直在和当初那个“工作狂”的自我作斗争，不断“做减法”，从事无巨细必躬亲，逐渐转变为提纲挈领的管理者思维。

除此之外，此前人生几乎一帆风顺的他，在创业路上也试了不少错，吃了不少亏。他记得几次把方案完完整整地交给洽谈企业，而对方拿到方案、项目通过审批后却最终选择了另一家国企。“这种情况，我也无能为力，”汤凯说，“只能等待市场优化了。”

有些时候，汤凯还会遇到无法理解新兴概念的客户。“我们的智能平台和智能系统，是为每一个基层员工设计的，因为他们最清楚哪里有安全隐患。”汤凯解释道，“但有些管理者，他们希望拥有上帝视角，所以还是会选择面向高层领导的传统安全管理系统。”汤凯认为，一开始走向员工赋能和数据共享是最高效的，不过大多数领导还想不到这一步，慢慢他们才会明白，只依靠领导和专业人士管安全是不够的。事实上，人人都应管安全，都

应是安全这张大网上的“节点”。

面对种种质疑和挑战，汤凯仍充满信心：“相比竞争对手，我们着眼于更长远的发展。我相信很多企业后续会需要我们的服务，以进一步升级改造。”以人为本，矢志为安，汤凯的先进理念与切身实践，揭示着时代更替的趋势，在安全领域预见着智能未来。

### 何盛华：通工业之变

何盛华是工业工程系的模范学生，通过实施数字化工程促进“中国制造”升级换代，这是他一直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2005年，从清华毕业之际，在许多同学改行转型、投向热门高薪领域的情况下，何盛华坚持立足所学专业，先后进入上海两家德资企业从事生产计划、工艺管理、产线规划等工作。如今，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并于2020年回到清华，一边创业一边攻读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学位。

“工业工程”的概念可追溯至泰勒于1911年发表的《科学管理原理》，它面向制造和物流，考虑效率和成本，讲究优化、改变、创新——“就很折腾，”何盛华试着用平实的话描述专业内容，“恰好我本身也比较擅长折腾。”

2009年是他工作的第四年，金融危机后市场需求暴增，他所在的UAES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亟需扩大产能。当时公司里大部分人倾向花2000万向德国购买两条和原来一样的进口生产线，但何盛华觉得不需要：“我可以只花500万做一条8秒线，而不用花大价钱买两条16秒线。因为我们工业工程讲‘节拍’。”于是，何盛华委托国产供应商定制设备，并前后用了十个月时间重新设计了七个工作站，将产

品制造的“节拍”从16秒变为8秒。如今他可以轻松且骄傲地讲起当时领导和同事的反对，以及一番技术改造最终落地的效能与意义——工业工程的理念撞进经验性的现实，火花迸溅。

但折腾意味着风险。于是五年后，他离开了重视稳定的外企，回到家乡宁波，跳槽到如今的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爱柯迪集团任副总经理，负责整个生产运营与信息系统实施。在这家本地民企，他有了相对多一些的自主发挥空间，用了四年时间将2300台生产与测量设备工业物联网全联，并实现生产、质量、物流全数字化管理，成为国内汽车行业设备联网最多、管理融合最深的数字化工厂。5000万元整的数字化投入，在落地第一年就收到了成本下降4500万元的回馈。

2020年8月，他拿到几千万的投资，成立了宁波数益工联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来自清华的师弟宿文是公司联合创始人。

“因为在一家企业里面做数字化，你做得再好也只是一家。但如果我们可以自己成立公司，以后就可以做100家、1000家甚至更多的数字化工厂，可以把这套东西复制、普及到整个制造行业里去，它所能产生的价值要远大于我个人在制造领域里的一家上市公司里做副总。”

何盛华认为，作为全国顶尖学府的学生，每个清华人都应当思考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些什么？



何盛华校友

2005年，他刚进入德国企业工作，家乡宁波的小作坊与外企使用的SAP系统相比，约莫有三五十年的差距；而今，他为了创业项目走访国内各大制造企业，清晰地看到中国整个第二产业巨大的前进速度和“弯道超车”的可能，尤其在新的领域，如光伏、新能源汽车，以及他心心念念的数字化工厂。“等这一波全部起来，未来的五到十年内，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制造是全球第一。”

然而，业界与学界尚未对齐，目前，工业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所使用的教材基本仍是很多年前的，是从整个20世纪欧美传统制造业的长期实践总结出的管理理论。但随着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国外的学界已逐渐进入纯理论研究，对于最新的数字化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国外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缺少实际的大规模的使用场景。而中国的优势正在于大有可为的实践环境。按照他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师弟的说法：“在工业工程方面，从实践中总结理论，我们能为教材增加新的内容。”

何盛华对阅读抱有巨大的热忱，学生时代便常泡在清华图书馆。“那时候一年能看100本书，即便现在我也还坚持每年看30到50本书。”其中，硬着头皮钻研经营生产管理相关的专业书有之，历史考古、科普科幻等“闲书”亦有之。专业前沿的理论学习让实践更具针对性和创新性，实践反过来又不断验证着书本所学，经验与理念相辅相成建构出富含“中国制造”精神的闭环；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则打开了他的格局，历史的底蕴增加了他对人性和复杂局面的理解。他说：“读《资治通鉴》最好的体验就是那种时间的流淌感，一年又一年，一个事件接一个事

件，漫漫千年，就在指尖流过。夜深人静，斜倚床头，看历史中的悲欢离合，而我们自身就是在这些故事中萌发、发展、传承。”

作为精益生产的实践者和工业互联网的探索者，何盛华已逐渐在历史的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航向。他以实践经验为桨，朝技术理想的彼岸驶去。

### 郭成：寻价值之路

“或许是  
因为，还有很  
多有价值的事  
情可以做”，  
郭成在谈到当  
年从央行辞职  
而投身区块链  
金融领域时，  
未显一丝后  
悔，态度仍旧坚定。



郭成校友

2006年，从清华大学软件学院毕业后，郭成顺利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成为世人眼里的人中龙凤。这个机会，若是给了大多数人，之后的人生便是踏实工作、万事俱备、只待升迁。然而，郭成却不愿做“成功的大多数”。

“在人民银行体系里，到后来已经没有什么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了。”他笑着说。他所负责的全国性业务运营已经游刃有余，做好移动金融支付标准的产业推广更是不在话下。入行几年后，郭成就凭借自己扎实的IT基础，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工作中的一个个难题。这种如鱼得水的状态，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一种成就，对郭成而言，却更多的是迷茫。

多年的机关生活没能磨平棱角，平静的湖面之下仍旧藏着波涛。2012年，郭成

去香港金融管理局交流了一年，这颗石子来得恰是时机，让他平静似湖的生活重泛阵阵涟漪。香港金融管理局多采用项目经理负责制，与人民银行层层汇报的体系完全不同。“我突然发现，我之前在机关里觉得一切都唾手可得的这种状态，其实就像‘井底之蛙’。”郭成坦言。这次经历让郭成跳脱出原来的安逸状态，产生从另一视角看世界的想法。香港、深圳、广州……郭成深入一个个现代都市，了解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深入沟通，去探索更大的空间。

终于，在那个区块链行业正值寒冬的2015年，郭成创立了图灵奇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那个曾经称自己是“井底之蛙”的年轻人，在人民银行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毅然放弃了这个铁饭碗。他潇洒转身，奔赴金融创业的这片蓝海。

将区块链技术作为基础，利用“智能账本”优化大中型企业供应链的财务付款流程，又为交易所自主搭建一套证券化资产管理系统，多年的用心孵化让图灵奇点结出硕然的成果。郭成和他的团队致力于用实际行动去解决产业链中的资金痛点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减少金融的不良影响。这支90%以上都是清华理工男的队伍，对于改善社会有着别样的“浪漫”。

图灵奇点使用的区块链技术，其背后有着一套属于计算机领域的科学理论，“其实就是可计算性和密码学这两个理论，也就是说它能够用技术性的方法去验证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作假，这是核心点。”“我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帮助企业去构建可信的资产，帮助金融机构能够更有效地把资金投放到各个地方，所以我

的服务其实是面向两端的……”提起自己一头扎入又深耕多年的领域，郭成侃侃而谈，像是打开了理工男的话匣子，当年决心创业的热血依稀可见。

回首创业历程，走下来的每一步却并非轻松。谈到第一次与客户谈判的经历，郭成至今记忆犹新：财务系统的对接、合作细节的谈判、双方相互的熟悉，种种琐碎的细节，耗费了他和团队13个月的时间，成为他至今难忘的“一场十分漫长的拉锯战”。从“0”到“1”的那一步，看似简单，实则最为艰难。然而就是这关键的一步，让郭成的团队逐渐形成高效的沟通模式，使此后的业务推进更游刃有余。

创业艰难之处，往事历历在目，那时候公司的收支极度不平衡，账面现金流接近零，郭成却没想过放弃。他坦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强化了他自身的性格，在创业历程中，或许这种精神的别名就叫“坚持”——不一味地担忧未来，而是坚持做好现在。“有好几次，转机的发生最终都不是因为我这一周或者是在这一个月里有什么事情做对了，而仅仅是因为我坚持了下去，那么在下一周，与前面我所做的事情完全不相关的事会给我开一扇门，我又活过来了。”谈及险境的应对，犹如过往云烟，郭成自信而坦然。

如今，“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这条赛道上不断涌现新的玩家，竞争日益激烈，郭成却并未担忧，也从不畏惧：“整个创业过程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不断挑战和不断成长。”抱着“用区块链技术做一些有价值的事”的信念，郭成寻价值而力行，不问前路几何。

## “我在大学拍《大学》” ——访电影《大学》导演

○张 敏 董鲁皖龙

7月9日，纪录电影《大学》在全国院线上映，影片诉说了四个清华人一生的理想，以及在他们身后属于这所大学的永恒青春。《大学》三位导演孙虹、王静、柯永权分别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级、2011级、2009级校友。“水木清华众秀钟，赫赫吾校名无穷。没人能永远留住大学时光，但我们胸中依然有星辰大海”，这是他们写给学弟学妹的一封信。

### 真人，真事，真大学

如何选择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这是困扰三位导演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探索的问题。以清华大学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电影《大学》，就以四个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清华人的故事，展现了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生走向，不同的人生意义。

“求学、毕业、从教、退休……每当我们迈进新的人生阶段，都需要抉择和适应的勇气，这背后会透露出个体的价值观和大学对个体的影响。”导演孙虹说。

在清华大学荣休院士、86岁的老教授钱易身上，有着教书育人理想的代代传承，一门六院士，半门皆教师。荣休后的她最眷恋的依然是三尺讲台，正如影片的结尾钱易对身边的学生的一句叮嘱：“不要叫我钱老，叫我钱老师。”

在留美回国、入职清华的年轻教师蔡峥身上，有着对理想的执着与坚持，为祖国“做点事儿”的急迫和热诚，让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归国的单程票”。

在面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宋云天身上，我们看到，为了“造福一方百姓”的朴素理想，他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18岁考上清华大学的新生产严韫洲身上，有着年轻人的纯粹，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努力学习，“解出一道难题就可以快乐很久”。

“当我有机会反思当下生活的时候，都会深刻体会到，毕业后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都有着来自大学时期的烙印。大学究竟如何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年轻人？”2018年，孙虹带着这个疑问回到母校，希望从普通师生的生活中找到答案。

而在王静看来，每所大学的个性都是不同的，就像大家会把大学称为母校，将它视为一个具有个性和气质的人来对待。

“我们除了想描绘片子里的人物以外，也想把母校当作一个人物来刻画，展现它的个性与品格。”王静说。

### 以影像温暖世界

三年，36个月，1095个日日夜夜，对孙虹、王静、柯永权三位导演来说，只

做了这样一件事——在清华园、在上海的中学、在河南的小村庄、在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山天文观测台……跟拍四位主角。

“整个创作的过程是非常快乐的，尽管也有一些磕磕碰碰。”王静回忆，在跟拍严韫洲雨夜20公里军训拉练时，她的电动车没电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孙虹及整个拍摄团队跟着队伍行进，自己推着车往回走。在跟拍蔡峥在夏威夷莫纳克亚山天文台观测时，因为海拔较高，拍摄团队需要一边扛着设备一边吸氧，还要在非常寒冷的露天环境下拍摄星空延时。

“做点儿事情，真的很不容易……但还是要坚持做下去。”孙虹说。

毕业以后，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孙虹曾经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可工作后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出发。”回忆在清华园里做纪录片时，孙虹总有机会去接触新鲜人、新鲜事物、新鲜领域，让自己时刻都感到充实，而且也固执地认为自己做的片子至少能被一些人看到，能对一些人产生影响，这种理想和信念，是其它工作无法替代的。

在清华园的这几年，在“清影工作室”的培育下，“以影像温暖世界”的理念不仅扎根在孙虹、王静、柯永权心中，也驱使他们去观察、记录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纪录片就是生活，是值得分享的那部分生活，是直达人心的、温暖的影像记忆。



孙虹  
校友

2006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在曼彻斯特大学访学，他当时的合作导师是保罗·亨利，一位在人类学电影界很资深的元老级人物。渐渐地，雷建军开始把“影视人类学”的跨学科影响运用在了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并成立了“清影工作室”，将“以影像温暖世界”作为工作室理念。

“真正开始深耕纪录片方向，还是受到了雷建军老师的影响，那时候他坚持做‘清影放映’，让国内优秀的独立纪录片能有一个机会和更多的纪录片爱好者见面，我也借机观看了很多纪录片，领略了纪实影像的魅力。可能是从那时候起，觉得做纪实影像是有意义的，它有机会带给人们更深层次的触动，让人们得以借由他人的影像反思自己的生活。”孙虹说。

对于王静来说，初涉纪录片也是选修了雷建军老师的暑期清影工作坊。这是她第一次和另两个同学一组拍摄了一个口述史纪录短片，以女性视角关注“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本科毕业后，有段时间因为挥霍了自己的热爱而暂别，后来由于内心犹有对于影像表达的渴望而回归，在硕士阶段坚定了自己要从事纪录片工作的想法。”王静说。

王静坚信从事纪录电影行业“这件事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去做的”。也许就在那个时刻，她理解了《大学》镜头中的宋云天，他们都选择了一条自己认为有价值的路。



王静  
校友

值、少有人走的路。虽然很困难，但还是想要努力去完成，哪怕付出一生的时间。有可能得到的正反馈只

是观众的几句肯定，或者百姓的几句感谢，但依然要去做。

柯永权在刚进入清华大学时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他在大二的时候也选修了雷建军老师的纪录片课，“从此入坑”。随后转系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在中俄边境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纪录片。

拍摄电影《大学》之前，柯永权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学校。离校这么多年之后，再回归母校，感慨挺多。有天晚上下雪，他一个人扛着设备在学校里走了好久，疲惫但受益匪浅。独处的时候，他跟学校里面很多的建筑、雕像之间产生了一种交流，他这才后知后觉，其实自己的成长与学校的熏陶密不可分。“《大学》的英文翻译写成了The Great Learning，而不是The University，这个翻译源自四书中的《大学》。我们借用它的英文翻译，也想表达我们在探讨的教育。”柯永权说。

在执着于快节奏的时代里放慢脚步，三位导演坚持着做自己喜爱的工作，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对文化的敬畏。他们用镜头记录着生活，用热忱谱写着他们和纪录片的故事。

### 勇敢追光 理想当“燃”

在《大学》首映礼现场，清华大学副



柯永权校友

校长杨斌宣布，清华大学正式启动“追光行动”：从7月9日电影上映起，“追光行动”将优先面向县域中学、中西部地区中学、基层工作校友所在地中学、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所在地中学送电影《大学》上门，积极鼓励当地青少年勇敢“追光”、理想当“燃”！这部名为《大学》的电影，让很多中学生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大学精神。

“身在井隅，心向星光。”一名观看影片的中学生说出了这样八个字。对他来说，大学生活还在远方，求学之路还很漫长。但他已经对“大学”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们的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也不只是为了将来或许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等等。我们应该用所学去成就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像影片中的四位主人公一样。”

点亮更多少年心中的理想之光，在清华大学启动实施“自强计划”十周年之际，为了使大学之道在全社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共鸣和传播，清华大学发起了这项行动，邀请清华师生校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加入，组织中学生免费观影《大学》。

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也许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对电影里的几位主人公产生强烈的共鸣，但是鲁迅先生也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些离观众或远或近的人物和故事，涵盖了我们在成年后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人生节点，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电影中看到自己此刻所处的阶段和处境。这部电影与此刻的我们有关，与我们此刻的时代也有关。”导演柯永权说。

（转自《中国教育报》，2021年8月6日）



# 我为父亲抄书稿

## ——钱穆先生《读史随劄》的写作与出版

○钱 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钱穆先生

本文为钱穆先生次子钱行先生，因编辑出版母亲的《张一贯致钱穆家书》，而回忆自己参与《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出版的一段往事。并由这段往事而引出另一段更为久远的往事——钱穆先生写作《读史随劄》的故事。

这事开始在几十年前。1941年，我们弟兄三个，还都在上小学，两个妹妹，都还没有到上学年龄。我们随祖母、母亲住苏州。父亲在四川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

那年寒假，过年，祖母大人于年初五那天，病逝于苏州耦园家中。小时候的事，只记得爸爸是没有回苏，丧事等等都是母亲请亲戚帮忙办的。直到几十年以后，才知道当时父亲因为祖母去世，未能在家也未能回来，哀恸之余，把原用的

“未学斋”斋名改为“思亲强学室”，还写了一篇《思亲强学室读书记序言》发在杂志上。

说到“未学斋”这个斋名，本来源自《论语》里“贤贤易色”这一章，说一个人能孝父母，能忠于事业，对朋友言而有信，这样的话，他虽然说未学，我也要说他是已学的了。因为自感“自惭未能事父，而事母亦未能尽力”，所以署了一个“未学斋”名号用以自勉；现在母亲也不在了，想要用孝父母来补足未学的缺陷也不可能了。只有“勉力强于学，虽不足以报深恩于万一，亦姑以寄孤儿荼蓼之心”，从今以后，就把“未学斋”改为“思亲强学之室”。（《责善半月刊》民国三十年四月）这是一篇序言，一本书的序言，而书内容，则有待日后读书有得，一篇篇写出来积起来了。

从这个1941年三或四月以后，父亲是思亲强学，写过不少文章，出了好多书，可是《思亲强学室读书记》这本书，始终没有完成，没有出版，只有《思亲强学室读书记序言》因已在刊物发表，一直存在图书馆里和人们的记忆里。后来父亲和继母在台北素书楼，也谈起过这书，说还是要编好出版的，而且改了书名，定为《读史随劄》，还拟定了部分目录，可是以后又写了不少文章，出过好几部书，这本书还是没有完成。

## □ 名家轶事

三十年前，1990年，父亲在台北杭州南路家中安详地逝去，享年96岁。1992年1月，继母和几位素书楼弟子护送父亲灵骨，归葬大陆太湖西山岛。继母对我说，台北许多人正忙着整理编辑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你正好从学校退休了，也来参加这事吧。我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为父亲抄书稿，就是这个书名定为《读史随劄》原名为《思亲强学室读书记》的书稿，都是父亲1941年起那几年陆续读书、陆续写下的文字。这些文稿不是写在人们习见的方格稿纸上，而是写在一张张大小不一、纸质不同、一面已经写过字的纸的背面的，且即使是在同一纸上同一篇文字，也会有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几段或是几次修改的痕迹。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些纸上的文章，过录到常用的方格稿纸上，然后加上标点符号，有史书上的引文，则还需一一查对原书原文，以防错漏。那些写在字纸背面的文稿，按页数计算，大概有一百张左右，每张纸上字数有多有少，最后抄下来有几十篇文章吧。

这《读史随劄》，当然都是关于历史的事，而我原来在中学是教数学的，再者几十年来读的写的都是简体字，现在要看、要抄录的都是正体字（繁体字），所以说，虽然就是抄写，其中困难也是不少不小的。总算完成，交稿，后续工作就都到台北，那边的教授先生们（多是素书楼父亲的弟子和他们的学生）接手最后成书。在全集中，《读史随劄》和《中国史学发微》二书合成一册，编为《全集》的第三十二册。《读史随劄》连同出版说明和目录，全部共181页。这181页文字，除了我从底稿抄下的以外，还包括以前已在刊物上发表过的和编书时写的“出版说

明”在内。这在出版说明中也都讲了。序言是当年写了发表的，以后就在这刊物上（《责善半月刊》）发表过好几篇文末注明《思亲强学室读书记》的文章，还有几篇是同时期写的发在其他报刊上的同类文章。除序言外，全书共收三十五篇文章。那么，经过我手抄的文字，只是这其中一部分而已，但是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写到：“本书各篇，多就原稿整理，其有限发表于杂志期刊者，皆注明于各篇篇后，整理工作虽力求慎重，然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本书由钱行先生负责整理。”这最后一句，我知道，其实我真正负责的只是抄写、标点和部分引文的查对而已，其他许多进一步寻找佚文、整理编辑成书的工作，都是在台北的诸位老师做的了。例如我从底稿抄的一篇《王通》，约有七页篇幅，后来在台湾，即发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中《读王通中论》一篇开头的部分就是这七页文字，然后下面又续写许多成文，于是这七页“王通”就不再收入这《随劄》了。

后来，在整个全集之中，我还“负责整理”了《理学六家诗钞》。这部书稿有以前出版过的成书，不需我抄写，我只做了加上书名号、私名号和部分查对原诗的事，其他许多工作也是在台北完成，包括写“出版说明”在内，也写成我负责整理的了。“出版说明”说了，错误疏漏难免，现在我翻检这《随劄》，还发现一处疏漏。书中“东汉人之养生率性论”和“蜀中道教先声”二则，其实当年是同在民国三十年十一月《责善半月刊》发表的，现在书中在这两篇的文末，都注明了初刊时间，但是一处写《责善半月刊》二



钱穆、钱行父子一九八〇年在香港

卷十六期，另一处写《责善半月刊》二卷六期，后者错了。同期共刊三则，现在都在书中，可考。

二十多年前，我抄写父亲的这些遗稿，后来收入联经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与此同时，当时我们兄妹四人发现，其实也不是我们自己发现，而是继母大人告知的，这部书稿写在写过字的纸背面，这些纸的另一面，即原来的正面，是谁写的什么内容呢？——竟然是当年妈妈从苏州写给爸爸的家书！还有少量的是我们三兄弟和妹妹写给父亲的信，还有那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姨妈写的信等等。那时我抄爸爸的文稿，我妹就去复印妈妈的信；我抄下来就是一篇篇文章，只有极少数是未完稿。而妹妹她复印所得，总共有分属九十多通书信的内容，有完整的信，有只存一半的，还有去头无尾的等等，她的整理工作比我费事多了。我妹是1940年10月出生的，90年代是五十多岁，没想到的是，她竟发现两通小姨和妈妈写的报告她出生情形和小时候事情的信。小姨那信是出生喜报，在医院写的，说母女平安，小小妹健康，七磅多一点。妈妈则是出院

回家过几天后写的，她写的女儿出生重量则是五磅，怀胎八月早产。二信有异！五十多年后分析，小姨写的喜报有水分，是怕姐夫担心，想让姐夫高兴一点吧。不知当年爸爸有没有发现她这好心！这些零信断简，经妹妹她整理按年排序后，又复印多份并另外录成文本，兄弟姐妹几家分别珍藏于家。原件书稿书信，仍都送回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收藏。

1941年那次父亲从苏州辞别家人回四川的情形，几十年后，他写的《八十忆双亲》中有记载，说祖母带着我们兄弟几个送他到大门口，“余见先母步履颜色、意气谈吐，不虑有他”。却不知翌年新年初五，先祖母就辞世了，终年76岁。“自先母之卒至今又逾三十三年以上……八十年来非先母之精神护持，又何得有今日。”父亲说八十年来受祖母精神护持，其后面三十三年祖母已经不在，这精神护持，自然主要是靠父亲自己的思亲强学了。直到前几年，2013年继母大人辞世归葬大陆时，台北亲友携来送回子女孙辈的素书楼家庭遗物中，意外地见有镶在镜框中的祖母大人遗像一幅，据称是从素书楼搬到杭州南路家中，父亲逝世后仍旧挂在家里的。现在杭州南路房子也卖了，这遗容又回到了苏州。推想当年1940年父亲离开苏州时，带在身边的应是一张小照片，后来不知在何时何地制成这幅遗容，一直跟着他，一直精神护持着他。祖母大人对父辈的精神护持，还将在我门兄妹身上继续，并且将凭借父亲的回忆文字《思亲强学读书记序》以及这本《张一贯致钱穆家书》等等，而延及钱家以及几代的晚辈！

（转自《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11日）

# 黄钰生：教泽遗爱永留西南边疆

○刘六生 宋文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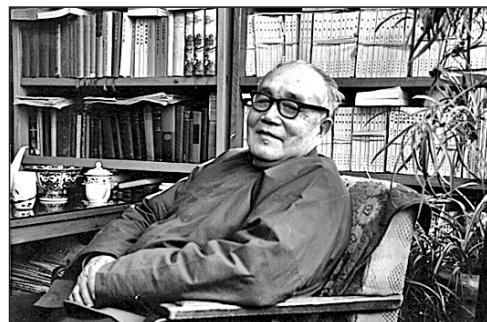
黄钰生（1898年4月15日—1990年4月11日），字子坚，著名教育家、图书馆学家。

1915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1919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硕士学位。1925年受聘于南开大学，历任哲学系教授、文科主任、学校秘书长，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任天津教育局局长。解放后任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天津图书馆馆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曾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天津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天津市副主委。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届天津市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八届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曾经在西南联大工作过、学习过的人，无一不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黄钰生在其《回忆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校》中如是写道。

黄钰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先后担任建设长、师范学院院长、校务管理委员等要职。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复员北归，而黄钰生领衔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联大师院）却留在云南落地生根，后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改名为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



黄钰生教授

南师范大学，成为了西南联大驻留在祖国西南边疆的永恒纪念碑、红土高原上师范人才的孵化基地。

## 学生眼中的“严师”

“春风熙熙时雨滋兮，桃李向荣实累累兮。”这是黄钰生对于联大师院学生的殷切勉励，以期他们能够像春风春雨一般辛勤育人，桃李满天下。为此，他认为，师范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必须在“作教、作师、作学、作人”四个方面做出表率和榜样。

在生活方面，他要求除了家住昆明的学生外，其他学生一律在校住宿，未经允许不得外宿；男女生的交往见面限制在主楼接待室；学生必须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早上六点半举行升旗仪式和朝会；学生的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仪态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

在学业学习方面，《国立西南联合大



1947年清华大学校庆，四位领导聚首，左起：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张祖道摄）

学师范学院学生毕业标准及考试办法》中规定，师范生在校肄业五年内必须修毕170学分，本系主要科目必须平均在70分以上，工具科须经本院甄别试验及格，教具配置及使用的技能也须达到标准，学生必须在知识、思想、态度、理念、人格五个方面“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否则就不得毕业。而当时有一个学生考试四门功课不及格，曾几次面求黄钰生“高抬贵手”，但是黄钰生不允。这名学生恼羞成怒，于夜间趁黄钰生从联大师院返家途中，用木棒将他击伤，黄钰生头上缝了七针。虽然经历这次波折，黄钰生仍然坚持严格要求学生学习，其严师形象可见一斑。

黄钰生的严师形象同样树立在联大附设学校的办学过程中。联大附属学校的考试种类有笔试、口试、课堂考、月考、季考、学期考、学年考，无论哪种考试，一律严格执行西南联大的规定。不合格者不得补考，只能重修。如果一学年中有两主科即语文、数学、外语不及格，或者一主科两副科即理化、生物、史地不及格者必

须留级，超出留级标准者劝令退学。也正是因为黄钰生的严格要求，附中一举成为云南中等学校的典范。

### “润身”与“淑世”

黄钰生认为，大学的意义在于“润身”与“淑世”，前者是为个人，“为学问而学问”；后者是为了改良社会，学以致用。在联大师院的八年期间，黄钰生抱着“润身”与“淑世”的学人情怀举办了多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师资培训活动，针对中小学教材、教法和新教育途径展开了研究，并且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对云南的文化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1939年开始，在黄钰生的积极筹备下，联大师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作，先后举办了“中等学校在职教员进修班”“中学理化实验讲习班”“中等学校各科在职教员讲习讨论会”等在职师资培训班。这一系列的师资培训活动为云南培养合格的中等学校师资和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9年7月，联大师院备函与昆明市政府联系，开展普教工作，经昆明县教育局指定，在洪庙乡麻园村和李家维等地的乡村小学开办社教实验班，轮流指派学生去上课，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并进行扫盲活动。他们还在市区翠湖小学和文林小学内开办民众夜校，招收贫困失学青少年，类似的活动扩展到了路南圭山少数民族地区。

在黄钰生的倡导下，联大师院的学术研究呈现以中学教学为重点的特点。1940年初，当时国内仅有的指导国文教学和研究的定期刊物——《国文月刊》，以作为“促进国文教学及其补充青年学生自修

国文的材料”为宗旨，经联大校务会议议决，由师范学院筹编。该刊成为交流国文教学经验的园地，对推动国文教学的改进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其他各个系也对中学各科教材教法开展了调查与研究。

联大师院于附设学校设立“实验部”，根据当时国内外流行的若干现代教育原理，在教学过程、课程、教材、教法、功课时间安排以及训育方面做了相关试验。1941年12月，联大师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升学及职业指导测验室”，用来实施各项普通心理测验，以利中小学升学及职业指导和社会职业介绍的进行。

### “总喜欢摸摸他们的头”

“我爱青少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见到他们，我总喜欢摸摸他们的头，感到这是一种乐趣，我称之为‘摸头之乐’。”正是在这种对孩子们的真挚爱意的影响下，1940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小学成立。黄钰生回忆



湘黔滇旅行团教师辅导团全体成员合影。左起：李嘉言、毛应斗、李继侗、许维遹、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吴征镒、郭海峰

道：“这是平生最满意的一件事，是我的得意之作。”

1941年，附中迎来了第一个校庆日。在校庆纪念日上，黄钰生讲了附中成立一年以来的情况，讲到中国在孩子周岁时有抓周的习俗，在附中“周岁”之际，他也如同父亲一样要为附中“抓周”。他拿了一架天平放在桌上，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灯泡和一根绳子，告诉学生们“要像天平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遇事要公平”。他拿起灯泡说：“希望你们像灯泡一样，到任何地方都能发光，热情地对待你们的事业。”接着他又拿起绳子说，“要像绳子那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团结才有力量。”

对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黄钰生也给予特别的重视。在身体方面，除了通常体育卫生的功课外，还与家庭通力合作，使孩子们不染上寄生虫病、皮肤病等传染病。他聘请专业训练的职员负责孩子们的饮食和全校卫生，每半年接受校医检查一次，低年级每两月测试体格一回，以观察

其发展。在心理方面，他认为，卑之无甚高论，只求学生有“出息”——能做的自己做，能受的自己受，当能负责自己负责，可尝试的鼓励他尝试，遇到困难去设法克服，就是有出息。

对于每个儿童的兴趣、胆量、气质他都加以爱护，注意保持孩子们对事物的新鲜感。在黄钰生如同慈父般的关怀看护下，附设学校的孩子们可以称得上是“少年初长成，自在恰如风”。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1年8月3日，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 吴仲华任职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拾遗

○顾金亮



青年时代的吴仲华（右）、李敏华夫妇

1950年，吴仲华（1940届机械）、李敏华（1940届航空）夫妇在美国航空咨询委员会（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简称NACA，为美国宇航局NASA前身）的研究工作渐入佳境。这一年冬天，在美国工程师学会的讲台上，吴仲华宣读了他的著名论文《轴流、径流和混流式亚声速与超声速叶轮机械中三元流动的通用理论》，这一划时代的工作开创了在三维空间精确分析燃气轮机中气体流动规律的新纪元。

由于工作卓有成效，吴仲华夫妇的中国人身份受到了美国有关方面的注意。“他们要我们加入美国籍”，1988年吴仲华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告诉杜开昔（Kathy Dugan，美国在华访问学者）的。这不仅因为吴仲华的成就，也与李敏华的工作有关。吴仲华接着说：“当时李敏华任职于Material and Structure Division（材料与结构部），开始搞原子能了，国籍要求就更高了。”

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和杰出的研究成

就，以及NACA在美国联邦政府中的特殊地位，美国移民局先后三次给他们送来入籍申请表，美国航空咨询委员会研究部门的主管也询问吴仲华是否入籍，吴仲华和李敏华推托说还没有长期留美工作的打算。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学成一定要回到祖国，这是他们1943年到美国负笈求学的初衷。正当他们整束行装着手回国的时候，国际形势突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此后不断有中国留学生在归国途中被扣留的消息传来，麦卡锡主义也日益甚嚣尘上，他们不敢直接去移民局办理回国手续，他们的回国计划因此受阻。但如何回国作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直在他们的心头萦绕。

1950年11月27日，吴仲华夫妇专程驱车前往位于成功湖畔的联合国大厦，旁听了中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发言。当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在就中国政府控诉美国侵略朝鲜和侵占中国台湾议案展开大会辩论，伍修权的演讲“晃动了广大的自由世界”。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听到新中国代表的声音，吴仲华夫妇十分兴奋，他们报效祖国的决心更加坚定，随即着手实施回国的计划。

1951年9月5日，吴仲华夫妇主动辞去NACA的工作，转而去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The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Brooklyn，PIB）任教——这样安排是因为吴仲华夫妇考虑到PIB不是一流名校，

任职于此便于隐蔽身份，有利于回国计划的实施。对于PIB来说，吴仲华的加盟不啻于放了一颗卫星。该校1951年10月24日出版的*Polytechnic Reporter*在头版头条以较大篇幅推出了这条新闻，着重强调了吴仲华在业界的声誉和地位：

喷气机专家吴仲华博士任热工组主任

吴仲华博士，一位杰出的喷气发动机研究专家，本学期入职PIB机械工程系，他将担任喷气发动机涡轮机械方面一个新 的研究计划的主任。

除了致力于这个有趣的项目，吴博士还负责热力学部门。他将努力改进和扩充课程，介绍最近几年来提出的最新概念。



## 媒体关于吴仲华入职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的报道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内  
的吴仲华塑像

他希望用新的设备扩大ME实验室，以便更紧密地将课堂教学与实验结合起来，并促进论文工作。

吴博士的大部分经验是在克利夫兰的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刘易斯飞行推进实验室压缩机和涡轮部做喷气发动机研究时获得的。在此期间，他写了9篇关于喷气发动机基本理论的论文。

吴仲华任职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显然也是重要的行业动态。美国工程师和设计师行业的专业杂志*Machine Design*于1952年1月如此报道：

吴仲华博士被任命为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的全职教授。自1947年以来，他一直与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刘易斯飞行推进实验室合作，对喷气发动机进行基础研究。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吴博士将指导机械工程系开展第一个涡轮机械和喷气发动机方面的研究项目。

吴仲华任职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时的工资是月薪1000美元，在当时是相当优厚的。1954年8月1日，吴仲华一家四口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启了他们夫妇精心设计的归国之旅，也就此结束了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的工作。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1年1月7日)

# 彭珮云的清华园岁月

○钱 江

解放战争时期，彭珮云曾任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南系”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3月，不到20岁的彭珮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

## 学运中入党

1945年8月，15岁的彭珮云考入当时校址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丰富的校园生活使得性格活泼的彭珮云更加活跃，不久就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

参加“民青”不久，高年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汉斌前来联系彭珮云。王汉斌是缅甸华侨的孩子，中学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支部书记。他于1942年回国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就读，是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

此时的西南联大，中共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十分活跃，接近1945年岁末，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王汉斌和

彭珮云都是“一二·一”运动的亲身参加者。1946年5月，王汉斌介绍彭珮云加入中共地下党。同时，确立了恋爱关系。

## 清华园复学

1946年暑期，彭珮云来到父亲彭湖工作的地方——南京。父亲担心女儿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有危险，要她留在自己身边上大学。经过党组织同意，彭珮云考入金陵大学外语系。此时王汉斌已从西南联大毕业，受命前往北平工作。

彭珮云就读金陵大学期间，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爆发了进步学生大游行，引发了内战期间国统区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彭珮云在学生示威游行中表现突出，受到了国民党当局注意，传闻她已上了“黑名单”。彭湖只得同意女儿北上到清华大学复学。1947年夏天，彭珮云来到北平清华大学，继续在社会学系学习，接转了组织关系。

1947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分局。根据地下党组织“平行存在、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关系”的原则，从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各大学党员由中共南京局（后由上海分局）领导，当时习惯称为“南系”。王汉斌是“南系”北平学委委员，清华大学地下党“南系”由他领导。每星期他至少来清华大学一次，彭珮云则有时进城找他。

清华园内中共秘密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是“南系”在西南联大建立、到清华后继续发展的“民青”。1948年春，南



2000年3月，西南联大女同学合影。左3傅冬菊、左5彭珮云、右4许铮、右3马黎勤

系又建立新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联”），由彭珮云领导。

当年，清华电机系学生朱鎔基表现进步，加入了彭珮云领导下的“新联”，并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入党。“文革”后朱鎔基担任了领导职务，直至国务院总理。有时他见到彭珮云，笑着打招呼：“老领导、老领导。”

### 紧急疏散进步学生

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军的战略大决战即将开始，国民党当局谋划对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清华地下党在党内反复进行敌情观念和革命气节教育，同时把一些在第一线太“红”的党员、盟员撤到解放区。

1948年8月19日、20日，北平各报公布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将拘提、传讯的463名学生名单，其罪名是“共匪嫌疑分子”“危害国家”，其中有清华学生56名。8月初，清华地下党组织已经把一些已暴露的党员、盟员或进步学生送到解放区，或选派到南方开展地下工作，因此在各报名单上的清华校内学生还有15名，其中有清华学生自治会副主席、社会学系学



1947年，彭珮云（左1）在北平清华大学与同学潘梁（右2）、孙蔼芬（左2）、程法毅（右1）合影

生裴毓荪。

得到地下党紧急通知后，裴毓荪自行进入教授住宅区，先后在费孝通、冯友兰、吴泽霖三位教授家中藏身。

彭珮云负责联系裴毓荪，她把裴毓荪送到任教于清华小学、家也住清华园中的地下党员王松声家里，拿出为裴毓荪准备好的改名换姓的身份证，帮助其化装，并帮助其与“新联”盟员张永刚翻墙跳出清华园，乘夜色穿越青纱帐进入北平城，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去了解放区。

国民党军警包围清华园三天。待到“黑名单”上的师生撤离之后，经学生自治会与校方磋商，让军警“查点”了一遍，毫无所获地撤走了。

### 年轻的党总支书记

1948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师生员工迎接解放军进校。彭珮云清楚地记得，12月18日，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在学校门口贴上了保护清华大学的布告。进步学生欢呼雀跃，彭珮云的心情无比兴奋，不断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1949年3月，清华大学党总支改组，不到20岁的彭珮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3月25日，彭珮云作为清华大学代表，到西苑机场迎接从西柏坡来到北平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党中央领导人，兴奋不已。

这年5月，彭珮云和王汉斌，还与他们的朋友潘梁和孙蔼芬一起举行了婚礼。

6月下旬，北平各高等学校地下党组织向社会公开，清华大学张榜贴出了全校187名党员名单。宣布彭珮云任党总支书

记，青年教师何东昌为副书记。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看到党员名单感到惊讶说：“怎么总支书记是一个小辫子！”后来彭珮云听说吴晗教授这句话，补充了一句：“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梳辫子，留的是短发。”

北平解放后，解放军南下气势如虹，急需干部，清华大学的党员干部有些参加了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有些调到新的岗位上，彭珮云留在了清华。

1949年10月9日，清华大学党总支首次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总支委员会，彭珮云以全票当选为总支书记。

1950年3月，彭珮云调离清华大学，到北



彭珮云、王汉斌结婚照

京市委组织部的学校支部工作科工作。

对清华园中岁月，彭珮云充满怀念，也抱有一份遗憾，她离开清华的时候还差半年完成本科学业。

（转自《百年潮》，2021年第5期）

## 原子弹爆炸前的“三人签字”

○黄萌

2014年七八月间，父亲黄祖洽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一天，原二机部老部长刘杰的秘书李鹰翔来到病房代表刘杰看望重病的父亲。他带来一大束鲜花向父亲问好，可惜的是父亲正在昏睡，在片刻的睁眼时还是伸出手来与李鹰翔握手。李鹰

翔向父亲介绍说，现在正忙着准备纪念原子弹爆炸50周年的工作，说着从兜里掏出几页纸，是李鹰翔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中华民族石破天惊的一天》，文章记述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前后后。李鹰翔翻开第三页，有一段用红色铅笔标出的内容是关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能否成功、有多大把握。我把这段念给父亲听：

核试验是一种大型科学实验，既然是科学实验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不成功。1964年10月12日晚，在实验委员会常委会上，就研究到这次实验万一不成功怎么办的问题，科技专家们认为，不成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发出起爆指令以后，由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自燃”走火的提早核爆炸，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种是只发生



二〇一三年十月，黄萌与父亲黄祖洽在公园散步

## □ 名家轶事

化学炸药爆炸，没有发生核爆炸。

14日晚，总理问刘杰：“前面13日发来的电报看过了吗？”刘杰答：“看过了。是今早上班看到的。”刘杰认为，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的聚合爆轰实验没出过问题，说明我们对聚焦技术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而引起提早核爆炸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几率，需要请专家再研究一下。

15日早晨一上班，刘杰就来到九院设在北京的理论部。找到理论部第一副主任、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要他对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提早引起核爆炸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

周光召考虑任务紧急，提出可否请长于中子理论的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来完成。刘杰表示同意。当天傍晚，周光召兴冲冲来到刘杰办公室，汇报了他们三人研究估算的结果，并郑重地递交了一份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刘杰当晚亲自把周光召等三人的报告送给总理，总理看后又向刘杰了解一下实验现场各项准备的进展情况，最后问刘杰：“你现在考虑我们的这次核试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杰回：“总理，我的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周总理满意地点点头，但仍叮嘱刘杰：“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父亲听完后，点了点头，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同意”。这使我也回忆起2012年4月的一天，父亲对我和刘寄星谈起的有

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临爆时提出来的问题那段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理论部主任邓稼先他们到试验场去，他们担心会不会有过早点火（即临界程度还不高的情况下就点火，爆炸的威力就会大大减小），而放一个‘臭弹’，有些拿不准。就打电话回北京，当时在北京的理论部副主任有周光召、秦元勋和我。周光召作为第一副主任也帮助邓稼先主任统管全局，与朱光亚、邓稼先两人一起，上行下达。周光召就来找我和秦元勋问这个事。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只要找出中子过早发出来的概率是多少就可以。这里关键的数据，一个是中子早发概率，一个是压缩到超临界以后的时间有多少。刚好算这个中心中子源被压缩的是我带着储连元他们一起做的，所以我对此比较清楚。另外在这段时间内怎么会有过早点火呢？就是因为铀的有些同位素会自发裂变，有自发裂变的概率，把这个自发裂变的概率找出来（这些都可以从文献上找到），知道了概率，又知道超临界的时间有多长，就可算出这个过早点火的概率。所以周光召找到我和秦元勋，秦元勋是管数学和机器的，本来周光召还想让秦元勋再去算一算，但根据我的考虑，就比较快地得出结果。后来公开文献发表，说周光召找些人计算了一天，其实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周光召把问题提出来以后，我很快就把答案给出来了，概率别人找不着，因为他们没有搞中子的工作，我有很多参考书，一查自发裂变的概率，和那个时间一乘就得出来了。”

以上就是父亲口述提到过的原子弹爆炸前“三人签字”的往事。



## 清华大学第二十三次校友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2021年9月11日，清华大学第23次校友工作会议在辽宁沈阳召开。200余位来自全球各地的校友代表通过线上线下参会方式齐聚一堂，共商校友工作发展。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韩景阳、袁驷、王岩，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及学校相关部处负责人出席。韩景阳、王岩分别主持上下午的会议。沈阳校友会联席会长于宝海致欢迎辞。

陈旭首先向各位校友长期以来对校友工作的付出与贡献和对学校发展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并向各位校友汇报了110周年校庆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的情况，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介绍了学校发展取得的成绩、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陈旭强调，优秀的校友成就优秀的母校，广大校友为国家的发展建设作出贡献，为清华增添了声誉，母校为大家感到骄傲和自豪。陈旭还介绍了学校校友工作的近况，并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学校“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推动学校校友工作再上一个台阶。希望广大校友继续支持校友工作和学校发展建设，凝心聚力，共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清华应有的贡献。

史宗恺在发言中说，清华的校友工作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蕴含着清华特征的校友理念和文化传统，校友工作既是清华教育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对清华精神文化

的传承、实践和展示。史宗恺表示，每年召开的校友工作会议是总结交流经验的重要平台，希望大家彼此多分享校友工作的经验和故事，从而更好地改进工作，更好地凝聚广大校友的力量，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乃至为人类的发展作贡献。

唐杰汇报了110周年校庆的校友工作，介绍了过去一年在校友联络工作和校友服务体系中取得的进展成绩，结合上级部门政策文件和学校相关要求，对加强校友组织规范建设提供指导，并结合“十四五”规划制定，对校友办、校友总会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会议表决通过了增选许志翰、熊卓、汪玉、陈启鑫、袁浩歌五位校友为校友总会理事，束为、李超两位校友辞任理事职务，束为同时辞任常务理事职务。会上，袁驷向沈阳校友会颁发了承办纪念牌。

在王岩的主持下，温哥华校友会会长何维国、湖南校友会（筹）秘书长陈峤、清华校友总会建筑学院分会秘书长张弘、清华校友总会先进制造专委会秘书长马明星分别围绕海外校友会在当地的活动开展、校地合作、助力乡村振兴、发挥产业资源、集聚优势助力人才培养等话题进行了工作分享。在史宗恺的主持下，围绕“无体育，不清华”，李洪斌、俞富裕、张婷、李柄洲、尹西明等校友进行了第一场主题对话；在唐杰的主持下，围绕“有校友，更清华”，王燕、周枫、白本锋、张虎、郑厚哲等校友进行了第二场主题对话。

## □ 校友联络

会议期间，“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捐赠精品展”及“辽沈清华校友风华录”同期举行，沈阳校友艺术团在中场环节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出。10日晚，召开了东北地区校友座谈会，陈旭、袁驷、韩景阳等出席，唐杰主持会议，30余位在东北三省工作的校友代表分享了在东北工作的经历和感受，并围绕东北振兴、回乡创业、

人才引进等提出了恳切建议。11日清晨，近百位校友齐聚沈阳莫子山公园，开展了“校友同跑接力，赓续百十年华章”活动。

12日上午，清华校友助力沈阳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第三届清华校友创新论坛在沈阳举行，来自产学研各领域人才围绕校地合作、科技和产业前沿、职业发展等主题展开了学习交流。  
（关 悅）

## 第四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在线举行

北美东部时间9月18—19日，第四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在线举行，来自北美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千余校友在线参会。清华大学校长、校友总会会长邱勇发表了视频致辞。

邱勇首先代表学校向第四届北美校友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回顾了110周年校庆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并发表重要讲话，学校利用校庆机会总结了清华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问题。他指出，在学校110年建设发展的各方面事业中，广大校友积极参与，贡献力量。特别是在疫情“大考”面前，全球清华人携手迎接挑战，战胜困难，取得了新的飞跃。邱勇表示，中国当前面临重大机遇期，清华依然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学校正在制定若干中长期规划，将持续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期待校友们在各自领域取得新的成绩，继续关心支持母校发展。

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在致辞中表示，此次大会的召开，将进一步推进北美各地校友会的工作，也将促使校友们在当地社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校友总会

秘书长唐杰期待能够早日跨越疫情的阻隔，与校友们再次面对面相聚。

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理事长何宇滔、会长仰文奎，波士顿校友会会长曹杨晓璐、温哥华校友会会长何维国先后致欢迎辞。美国黑石集团共同创始人、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创始理事苏世民，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经管学院校友潘庆中，哈佛大学生物统计学教授、应用数学系校友林希虹先后作主题演讲。19日，“个人职业发展及下一代成长教育”和“清华人的情怀——社会责任”两个分论坛先后举行，多位北美校友及子女进行了分享与讨论。

大会前，参加第四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创业大赛的54个项目进行了路演并决赛，最后决出了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2名，入围奖2名。大赛评委由多家专业投资机构合伙人组成，致力于为北美清华校友创业者提供创投合作及交流机会。

本届大会由清华校友总会和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主办，美国波士顿清华校友会和加拿大温哥华清华校友会联合承办。

（校友总会）

## 陈旭出席 2021 年清华大学广西选调生座谈会

8月24日上午，校党委书记陈旭、党委副书记过勇一行出席2021年清华大学广西选调生座谈会，看望在桂清华选调生代表并座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韦家宾，广西校友会副会长钟毅及校友近50人参会。

会上，2021届选调生及往届毕业生代表表达了要扎根广西、建设广西的愿望和决心。钟毅介绍了广西校友的总体情况，鼓励新校友要把成长之歌谱写在广西发展的大地上。校友会为9位新校友颁发了“励业金”，并对汪用志等14名获得2020年度广西清华校友“启航奖”的年轻校友进行了表彰。陈旭向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周异决、黄一碧、杨洋校友表示祝贺并送上祝福。优秀校友马天宝分享了6年来的工作心得体会。杨洋勉励年

轻校友，到基层工作，要沉下身子，时刻保持谦虚、勤勉的工作态度，多向身边的群众和基层的干部请教，掌握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往届选调生代表牙柳丁、蒋光昱、冯仕恒等先后发言，分享了自己扎根基层、为广西和国家的发展奉献青春的故事。

会上，韦家宾介绍了广西选调生工作。陈旭感谢自治区对学校各项事业的支持和对毕业生的关心培养，她回顾了区校合作和定向选调生输送情况，并表示学校将进一步深化与广西在战略决策咨询、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输送等方面的合作，引导学生选择广西、扎根广西，为广西发展建设贡献清华力量。清华大学两办主任丛振涛，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张超，广西校友会秘书长黄永宁等参加座谈会。

（广西校友会）

## 过勇赴贵州访问并看望慰问校友

7月16—17日，党委副书记过勇带队赴贵州看望慰问基层校友，并对当地部分产业进行考察调研。17日上午，过勇一行赴贵安新区湖潮乡考察基层社区治理情况，并看望慰问湖潮乡干部、协和医学部硕士校友滕永康，高峰镇干部、车辆学院校友康凯等6名基层青年校友并进行座谈。校友们分享了各自的工作生活情况和成长锻炼心得，纷纷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西部基层，努力为贵安新区发展建设作出贡献。过勇肯定了校友们的工作表现，并勉励大家发扬“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让青春之花绽放在黔贵大地上。下午，过勇一行赴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等地考察调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贵州大数据发展历程及工业互联网、AI人工智能、区块链、5G发展等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并介绍了清华校友在相关领域的工作发展情况。

在黔期间，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副市长蔡朝林等分别会见过勇一行，双方就人才输送、技术支持、校地合作等展开了深入交流。

（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 “清华校友君子文化传承发展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8月26日下午，由校友罗茁、邵志强、李次会、赵宣、张帆、童之磊以及北京大圣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绪等共同捐赠发起的“清华校友君子文化传承发展项目”签约仪式暨项目共建座谈会，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举办。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校诗词工作委员会主任王玉明，著名学者、中国书法家协会原驻会副主席张飙，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原董事长罗建北，河北研究院院长张华堂，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赵劲松，以及张武忠校友、张帆校友夫人刘静、杨丽英等二十多位项目发起人和志愿者代表出席，活动由项目组总干事徐林旗主持。

本次捐赠项目由项目组倡议、邵志强校友首捐，于2019年12月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旨在“促进清华人文精神传播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定向支持“清华校友名人故里行《家国君子》主题文化寻根活动”暨专题短视频创作等清华园里读经典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一年多来，《家国君子》专题短视频已完成二十多集的创作拍摄，今年5月20日起，以每周一集的频率通过清华新闻网、B站、学习强国、微博视频号等平台陆续发布，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本次罗茁等学长的共同签约捐赠，将有力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

签约仪式之前，唐杰首先介绍了本次项目的缘起与活动开展情况，并对校友们长期以来对母校文化建设的支持表示感谢。随后，唐杰、赵劲松代表校友总会和

教育基金会，与各位捐赠人分别签署了三方捐赠协议。签约仪式之后，史宗恺为王玉明、张飙、罗建北颁发了项目顾问纪念牌；张华堂、唐杰、赵劲松向罗茁等颁发捐赠纪念牌，并赠送了“以身许国图”君子珍藏版纪念品；罗建北、邵志强为活动志愿者代表杨丽英颁发了纪念牌，并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文化坚守和无私奉献。

在随后举行的项目共建座谈会上，各位嘉宾顾问纷纷发言，畅谈清华人文精神和历史传承，在对项目前期工作充分肯定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罗茁、童之磊希望进一步加大对新时代清华故事的挖掘；李次会呼吁让更多的校友共同参与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刘静表达了对项目的支持和肯定；李文绪表达了对清华人文历史的敬仰；王玉明院士希望能感召更多的力量一起参与到清华的文化建设中来；张飙认为君子文化是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格化体现，值得大力提倡和弘扬；罗建北希望项目能为学校当下的教书育人做出更大贡献；张华堂希望项目的实施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清华文化和清华人；赵劲松代表教育基金会感谢捐赠人的支持，并承诺基金会一定会做好桥梁和监督的工作。

史宗恺在总结讲话中回忆了过去二十年来校友们组织的一些公益文化项目，感谢大家对母校文化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他希望项目创作团队广泛倾听各界意见和建议，创新活动形式，助力更美好的清华文化建设。  
（君子文化项目组）

## 量子科学挑战认知 技术应用改变生活 ——校友学习日第 27 讲开讲

8月28日下午，校友学习日第27讲以“线上+线下”方式开讲，物理系主任王亚愚教授为校友们带来“量子科学与技术”的主题报告。海内外300余名校友参与与学习。本次活动由继教学院合作办黄蕾主持，学院在线办全程进行直播保障。

王亚愚从量子的起源讲起，详细介绍量子力学发展的历程、神奇的量子物理效应、量子力学在技术上的应用以及量子科学与技术的前沿进展。他指出，量子物理的技术应用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让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及，而且将对信息安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军事目标探测等方面产生重大影

响。王教授还介绍了物理系团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研究历程，并就校友提问进行一一解答。讲座结束后，校友总会副秘书长杨柳向王亚愚颁发纪念牌。

“清华校友学习日”系列活动由清华校友总会、教育基金会、继续教育学院、校长办公室、终身教育处共同组织并协作实施，2018年11月25日开启首次讲座。2020年初，校友学习日登上“雨课堂”直播平台；2021年，学习日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上+线下”灵活切换的方式继续开展。截至目前，学习日活动已举办35场，共有1.2万余人次校友重回清华课堂。

（继教学院）

## 多地区校友会组织《大学》观影活动

6月23日—7月25日，河南、甘肃、上海等多个地区校友会组织了《大学》的观影活动。在河南郑州超前点映的影片，让校友们深切感受到了选择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在甘肃，校友们纷纷回忆起在母校的生活学习，表示愿意扎根大西北，为母校增光添彩。上海的校友们认为这部关于理想的电影告诉了人们，要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幸福。海南的观影活动让校友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清华精神，大家表示要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贡献清华人的力量。在云南，校友们纷纷表示，要把大学精神与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和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结合起来，作为自己人生的准则。在石家庄，校

友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会继续坚守初心，用一生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深圳和山东，影片让众多清华校友一起重返母校、重拾理想、重启征程。广州、东莞和福建、江西的校友们在观影后纷纷感谢曾经在清华园里培育的团结互助、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

《大学》是一部由校友孙虹、王静、柯永权执导，孙虹担任编剧的电影。影片以清华大学为拍摄对象，采用纪实的手法呈现了四个人物在2018至2020年间所经历的重要人生转折，传递了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是一部致敬理想的电影。特别是影片时长设定为110分钟，是一封献礼母校110周年校庆的特殊家书。      （宗慧）

## 各地校友会简讯

### 海南校友会举办欢送新生活动

7月27日，海南校友会欢送新生座谈会在海口举行，新生及家长代表，海南招生组、海南部分中学代表，海南校友会会长吴坤平、常务副会长王右军以及校友代表共计100余人参会。座谈会由海南校友会秘书长叶瑷玲主持。吴坤平在致辞中向新生表示祝贺，并勉励大家脚踏实地，实学实干，为祖国强盛、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招生组组长许斌、海南部分中学代表王宏和王嫣雪等先后发言，鼓励新生学好本领，报效祖国。校友代表唐磊、新生代表姚正宇、家长代表张继友，海南籍清华学生李瑶婷、林灏等也在会上发言，与会新生一一上台做自我介绍。许斌为新生颁发了录取通知书，吴坤平为大家颁发了清华110周年校庆纪念礼物和校徽。会议期间，在海南实践的清华女足队员也前来参会，并鼓励新生加强身体锻炼，践行“无体育，不清华”的精神。（海南校友会）

### 瑞士校友会举办夏季徒步活动

7月31日，在瑞士校友会的组织下，受疫情影响推迟一年多的瑞士校友会徒步活动在卢塞恩湖畔举行，近三十位校友及家属积极参与。从瑞士各地赶来的校友在指定地点集合，大家依次做了自我介绍。校友中既有年届花甲的学长，也有刚到瑞士读书的学弟学妹。徒步中，大家一边欣赏卢塞恩湖的美景和沿途富有特色的瑞士农场和小镇，一边热情地探讨着当下的疫情和趋势，分享着各自的兴趣爱好、专业

方向、工作经验和未来愿景。二十多公里的山径，伴随着周围秀丽的湖光山色、悠闲吃草的奶牛和雅致的民居屋舍，大家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走到终点卢塞恩市区，路远的校友依依不舍地告别，其他校友在美酒加美食的晚餐中继续谈天说地，意犹未尽。

（瑞士校友会）

### 大纽约地区校友会 2021线上迎新会圆满举行

8月7日晚，大纽约地区校友会为即将赴美留学的新生举行了线上迎新会，邀请几位校友嘉宾和律师为新生们讲解校友会活动、留学和工作签证、纽约生活和求职的内容。在校友会联席会长郑辰的主持下，联席会长马婧介绍了大纽约地区校友会的近况。随后，曾晖律师为新生详细地讲解了从F1学生签证、OPT/CPT到H1B工作签证和绿卡申请的过程，以及亲属类签证的发放情况。校友嘉宾张昊和李昊就自身所处的科技和金融行业进行了介绍，并对面试的流程和前期准备作了经验分享和指导。吴瑶和陈芳琳就新生重点关注的疫情、生活、安全等问题作了讲解和信息分享。

（大纽约地区校友会）

### 赣州地区校友召开送新会

8月29日，赣州地区校友2021年送新大会在启迪科技城赣州清华校友活动中心召开。校友代表与8名考入清华的新生及部分中学教师、家长代表欢聚一堂。校友活动负责人韩高峰首先转达了老校友许忠华副市长对本次活动的祝福，并勉励新生积极进取，在清华取得优异的成绩。舒庆校友嘱托清华学子们要秉承校训，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量。江西招生组钟北京教授在线上对新生进行了勉励。校友代表张冠忠、江赐等先后分享了在清华大学学习生活的感悟，并对新生们提出了殷切希望。新生代表何文靖、李声强等和老师、家长代表也分享了此次参会感想及对未来的期望。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公益助学计划“清华大讲堂”启动仪式，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邹世成宣布计划正式启动。

（干 舟）

## 2021 级天津新生座谈会举行

8月29日，2021级天津新生座谈会在瑞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举行。40名新生代表、天津校友会名誉会长梁肃及天津招生组负责人范宝龙、天津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参会。校友会青年分部主任刘晓亮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辞。瑞友教育总经理张瑞明校友祝贺同学们考入清华，并从就业和创新方面分享了经验和心得。范宝龙介绍了今年招生的总体情况，并欢迎各位学子的到来。中学教师代表于鸿鹏、冯哲等寄语新生要树立远大理想，担负起时代责任。新生代表卢若凡等表达了对中学母校的感激之情和对清华校园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庄宇、副会长张翼等依次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并鼓励新生们踏实学习，报效祖国。梁肃和校友会秘书长郝玉林在总结发言中对新生们表达了深切的嘱托和殷切的期望，并希望大家毕业后回到天津建设家乡。

（天津校友会）

## “石家庄清华校友之家”揭牌仪式举行

8月31日，“石家庄清华校友之家”在石家庄市中土国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石家庄校友会会长董青、中土集

团董事长齐建伟等十余位校友嘉宾参加揭牌仪式。仪式由校友会秘书长闫孟波主持。校友会执行会长曲俊义在仪式上讲话并感谢中土集团对石家庄校友会工作的支持，他回顾了校友会同中土集团的历史渊源和深厚友谊，希望借助“校友之家”加强校友与母校、校友及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齐建伟表示“校友之家”落地中土集团备感荣幸，公司将全力支持“校友之家”的各项工作。参加活动的校友还进行了座谈交流，对“校友之家”未来发展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石家庄校友会）

## 贵州校友会看望驻村校友

9月11日，在贵州校友会副会长鲁斌、陈淑兵等的组织带领下，贵州校友会30余位校友看望了王庄乡小坡村的王和瑞与流长苗族乡凹河村的李海平两位驻村校友，并进行了座谈交流。两位驻村校友分别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鲁斌对凹河村把精神文明建设、民族文化培育作为乡村振兴切入点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曾在脱贫攻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校友余宗洋和张勇结合自身经验给予了年轻校友针对性的指导建议。校友会还为凹河村小学捐赠了学习和体育用品，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强健身体。孩子们也把亲手制作的中秋花灯送给关心他们的校友会叔叔阿姨们。陈淑兵表示，校友会将帮助驻村校友的帮扶村部分学生争取更多参加公益教育活动的机会，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座谈会上，校友们还就乡村特色产业、人居环境建设、本土文化传承等进行了讨论。

（贵州校友会）



## 回忆录

# 我的自述

○钱端升（1919）

钱端升（1900.2.25—1990.1.21），字寿朋，生于上海，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他17岁考入清华学校，19岁被选送美国留学，24岁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并出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他是我国政治学、法学这两门学科的奠基人。北京出版集团近期出版了钱端升著《政治的学问》一书，本刊选取了其中钱端升先生写于1987年的自述一文，以使今人了解和走进他的学术生涯。

我1900年出生于当时江苏省属松江府，今属上海市上海县的钱家塘（1992年，上海县与老闵行区合并，成立新的闵行区）。家中世代以行医为生，但母亲和祖母们除家务外也操耕织。1905年，是旧中国科举制废除和新学兴起的一年。是年父亲和伯父们开始教我读书识字，接着就在家乡读私塾，直到1910年夏。1908年，即我8岁前，只勉强能背诵《四书》《史鉴节要》《诗经》《左传》《唐诗三百首》部分篇章，由于同族各家延聘了一位圣约翰毕业的先生当塾师，兼授国文、数学、英文、史地等科目，使我耳目一新，进步颇大。1910年下半年我随堂兄到上海城内



钱端升先生

就读于敬业学堂，一年后又转入养正学堂，至1912年冬小学毕业。

1913年春，我考入松江（江苏）省立三中，四年后毕业。为了投考名声颇著的清华学校，1916年我转入师资深厚的上海私立南洋中学，插入五年级。次年夏毕业，报考清华，即被录取。二年清华时光转瞬即逝，1919年获官费赴美留学，第一年我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读政治学，翌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旋去哈佛大学，所学各课属历史、政治和经济三系合成科目，偶尔也旁听哈佛法学院的一些科目。1922年1月我完成硕士学业，同年6月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1923年11月，我完成哲学博士所需课业并通过了各种考试，并于1924年夏获哲学博士学位。自1920年9月初进哈佛到1923年12月初离去，在哈佛共三年两个月。其间，除暑假在佛蒙特州立大学学习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外，1922年春又赴华盛顿数周在国会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向参众



在美留学时的钱端升

两院的书记长和若干委员会的主席请教国会委员会的权力与进行工作的具体情况，以便较好地完成《议会委员会——比较政府研究》这一博士论文。这三年又两个月确是我一生学习较顺利、较有成就的一段时期。结束哈佛的学业后，藉校长罗威尔先生的介绍函柬，我漫游欧洲各国半载有余，就教于英、法、德、奥某些宪法或政治学教授、学者，访问了各国议会议员和工作人员，同时熟悉了某些大图书馆的情况。1924年5月，结束了近五年的游学生涯，东返祖国，元月初抵达上海。

1924年秋，我开始任教于清华，并在此后的28年中，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一度还脱产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也曾在国民政府大学院任职，此外，也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

1924年我来到清华，先是担任教员。1925年秋，清华首次招收本科，自后逐步成为一所完全的大学，我也随之而成为教授。1927年春季，我开始在北京大学兼任教授，教政治和法律两系的宪法课。

1927年春夏，奉系军阀入关，对教育界、报界人士极为横暴，我

于是南走沪宁，秋季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为政治系副教授。“副教授”为该校是年教师最高职称，因有人认为只有像巴黎、里昂等大学的教授才配称“教授”。于是，凡受该校聘者，不问男女老少，也不论文、法、理、工、农、医，一律贬称“副教授”，受之者颇觉可笑，幸而我并无愠色。1929年秋，由于中央大学国民党派系之争和学生罢课，我被迫辞职。失了教书之业，我只好另谋出路，乃于1929年10月至1930年夏翻译了屈勒味林的《英国史》。

1930年秋，我再度回到清华教书，同时在北大兼课，直到1934年初离北平去天津《益世报》为止。这期间，除教书备课之余，我还撰著了《德国的政府》一书，此书原为译述1919年魏玛宪法下德国政制和政治生活而作，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基础较厚，在我所著浅薄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

我到《益世报》本为宣传抗日，因撰写社论笔锋触及对日妥协派，不得不于1934年9月被迫离去。后乃远适南京，再度就聘于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法学院教师



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代精英。左起：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1931年摄于清华大学北院

## □ 回忆录

中，不少曾是我早年的学生，因此，校长罗家伦希望我去法学院有助于加强学术空气。谁知中央大学仍然派系林立，到了1936—1937那一年，我除偶尔不得不代理法学院院长职务外，只能倾全力于政治系附设的行政研究室工作，并组织该室同仁在一年内完成了两卷本《民国政制史》。

1937年夏，我返北大，刚到北平一周，“卢沟桥事变”突发，8月13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战争，于是南京政府特促胡适、张忠绂和我等北大三教授赴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的援助。及至1938年返国时，北大已与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先在长沙，继在云南蒙自，最后落脚于昆明。自此以后到抗战胜利结束第二年返回北平，我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抗战期间，我除努力教书、宣传抗战、抨击弊政外，曾于1943年撰著了《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在1946年5月正式宣布解散。我于同年秋回到北平，仍在北大执教。1947年10月底我应邀赴美，在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约一年。在此期



1937年9月，胡适（中）、钱端升（右）、  
张忠绂三教授赴美宣传抗日



钱端升（左2）参加国际学术活动

间，我以讲课的内容编著了《中国的政府与政治》（英文本）一书，主要是评述辛亥革命以来的南京政府，由于资料所限，我当时无法将解放区的政府与政治写入书中，每念及此，总以为憾。该书195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

在1924—1949年的25年中，我写过不少文章，有学术性的，有介绍情况的，也有评论国内外时事乃至谴责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文章。最早多在《晨报》副刊上写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其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过一些论文和书评，后来也为《东方杂志》写过一些长篇文章。30年代，我曾几度参加太平洋学会会议，于是也在美国政治学会的《政治学评论》、外交学会的《外交季刊》和《太平洋季刊》诸刊物上写过一些文章（英文）。

就所写文章而言，较富有政治性的，自然要首推我所主持或负责编辑过的那些日报和期刊。这有1927年4月至10月中在北京、上海出版的《现代评论》和1939年至1941年在昆明出版的《今日评论》。我还曾一度任天津《益世报》主笔，专写社论，不编新闻。《益世报》当时是北方

两大报之一，罗隆基曾为主笔，由于批评蒋介石而被驱走。后该报聘我就任“主笔”，并希望我稍变罗隆基的文调，以求“保全”日报。不料后来蒋介石终因我的一篇社论《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大为恼火，并立即勒令邮局对《益世报》停邮，使我在该报待八个月写了170篇社论后被迫离去。此外，我在解放前的两三年内还为《观察》杂志写过多篇政论文章，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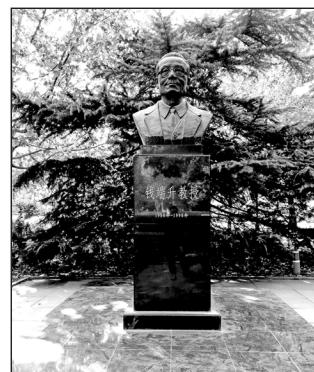
新中国诞生前夕，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1948年秋，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当时，虽有美国友人劝我暂时留美教书，但我已经看见新中国的曙光，决心回国，经多方设法，在旧金山觅得船只启程。1948年11月终于回到北平。不久我被推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此时，北平即将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并配合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学做好了一切护校准备。1949年1月，终于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解放不久，我就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由中国共产党召集的，有各民主党派、团体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大家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见《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被抽调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可惜的是，院系调整后，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却被取消了，

我的研究工作也只得就此中断了。直到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政治学才重新回到了大学讲堂和研究所。此时，我已属耄耋之年，虽又受聘于北大、外交学院、南开大学，但终因体衰多病，力不从心，许多研究计划自难实现，每念及此，总有不胜惋惜之感。但聊以藉慰的是中国新一代的政治学家正在成长，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政治制度服务的政治学，必将再现异彩。

由于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中断，在1952年以后，我的主要精力转向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活动，此类活动往往占去了我大半时间。1954年我被邀请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先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对外友协副会长，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积极推进新中国与各国非政府间的外交活动。1955年1月，我率团参加印度第四十二届科学大会，在新德里就中国的新宪法作了主题报告，并拜会尼赫鲁总理，之后，又到巴基斯坦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会议。同年6月，我又前往赫尔辛



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的  
钱端升铜像

## □ 回忆录

基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为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使者的交流尽力。1956年春天，我和刘宁一、程潜、傅作义等人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特别会议。1957年我又对锡兰进行了访问。

作为对外友协成员，我曾多次接待来访的外国客人，较重要的一次是1955年11月，为争取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接待前首相片山哲率领的全日本保护宪法联盟代表团。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出席了我主持的宴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参加了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仪式。1956年，我又奉命接待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来访，为增进中英双方的互相了解和发展关系尽心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始终积极关心国内政治生活，并热心参与各项社会活动。1949年8月我出席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作为一名政法教育工作者，我参加了政务院的文教委员会和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为我国政法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我曾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第一届政协代表，第二届政协常委，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委，第六届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遭受了磨难。但是，1960年春节和1973年周恩来总理两次给予我亲切的关怀和坦诚的鼓励，却使我永志难忘。可以说，在那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

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够饥即食、病即医，坚定地生存下去，是与周恩来总理的开导分不开的。也正是由于他的厚爱，我方能在动乱尚未结束时的1974年就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在垂暮之年，我幸能为我国外交政策的研讨和尔后1982年宪法的制定挥洒余热，这算是可以告慰于关心我的人们的两件事了。

值得一提却又令人深感痛惜的是，1962年我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部高等教育部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其时，按原计划我从五六十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择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译成中文约150万字，译后由我最后校阅，并对原著者写简短的介绍。全书成七八篇，二三十章，每章每篇也由我作篇章介绍，最后加以编者的长序。此项工程颇大，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120万言，其中约十分之六七已经过我最后校阅；我还部分写出作者个人介绍。可叹“文革”伊始，这一小小事业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



钱端升全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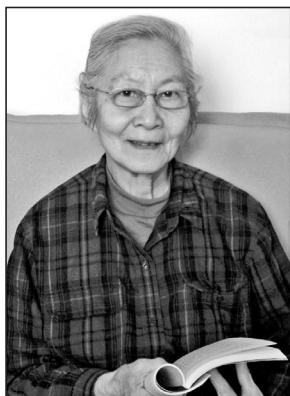
总而言之，我自1917年涉足政治学专业至今已有70年矣。我一向认为，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1949年以前，基于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和制度昌明的理想，我不但著译了几部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论述中国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制度的书籍，而且也写过大量抨击时政、评述时势、论证国际关系对策以及政治学书评等类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尔后我身受逆境的折磨，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我国被迫中断将近30载。1978年以

来，政治学在中国又重新恢复应有的地位和声誉，越来越多的学生、学者和政府的文职人员都逐渐认识到学习政治学和研究政治学的重要性。我以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政治学也要注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分析方法，为解决人类社会政治活动和组织制度的新问题服务。在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尤其要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服务，此乃政治学具有不朽生命力之所在。

至于我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 难忘清华

○薛传钊（1950—1952 经济）



薛传钊  
学长近照

我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父亲的失业和工作的频繁变动，从小跟着父母逃难，从湖北、广西、江西、福建、广东、贵州，到四川，流离颠沛，辗转数年。小学和初中是在停停打打、时断时续中度过的，一共读了不到三年。抗战胜利后，我才到广州

培道女中念完高中。当时正值全国解放，1949年夏我从香港飘海北上，考入燕京大学社会系，1950年转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52年院系调整至中央财经学院工业企业管理系，1953年夏毕业。

虽然在清华只读过短暂的两年，但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 转学去清华

在燕京大学的第二学期结束了。一年里关心我的同学们一直从经济上支持着我，维持着我的温饱，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但我总觉得如果能得到学校的助学金，会觉得更自在一些。正当学期结束，暑期又是大学招生的季节，我想到何不到国立学校去上学呢？那里是有助学金的。基于这一点我打算转学了。

当时也碰到一个难题：转学考二年级

## □ 回忆录

经济系的插班生比较合理，但据说录取的机会比较小；如果去考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的机会会多一些，但要多读一年。左思右想，最后考虑到自己家境并不好，还有等待上学的弟弟，应该尽可能早点毕业、早点工作。于是，整个暑期我一心一意地为转学考试复习功课，报考目标就是清华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总算考试通过，如愿转学。离校时，我没多说一声再见，默默地离开了难忘的未名湖。

### 初到清华

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因而对清华园多了一份痴迷和敬仰。

清华经济系在清华虽不像工学院的电机系、航空系，或理学院的物理系那么响亮，但也是清华法学院的名牌系，有不少知名教授，特别是陈岱孙教授在经济学界负有盛名，著名的《资本论》中文译者王亚南教授，在解放后也在清华经济系任过教。

当我得知被清华录取后，很快就从燕京校园搬到了清华园的静斋。静斋是当时的女生宿舍楼，新生绝大部分都住在一层，老同学住在二、三楼。我住的那间房里，大部分是一年级的新生，只有李生荫、金方西和我是二年级的转学生。房间不大，却放着四张双层铁床，住八个同学。中间靠窗处放着几张小桌子，平均到每人不能占用一张桌子和凳子。但同学们都很谦让，多主动要求睡上铺。房间虽然挤了些，但行李都能放得下，各人的枕边、床脚都不会闲着。因房小人多，一般都要到图书馆和教室去做作业、看书，直



薛传钊  
学长在清华  
学生  
证上的照片

到晚上才回宿舍。图书馆人满为患，早已不敷使用。为了借参考书或阅读，同学们往往在晚饭前就把书包预先放在图书馆的桌面或座位上，去占一席之地。否则只好到教室里借着发黄的灯光阅读，而且借参考资料也不方便。不过，大家都能理解这是发展中的困难，没有什么怨言。

清华的同学生活大都比较朴素，穿着并不讲究。冬天还能看到穿着很旧的深色布衫罩着长棉袍（当时称为“大褂”）的男同学；也有一些穿不上袜子，拖着一双又旧又破的球鞋过冬的同学。打着补丁的衣服更是随处可见。伙食水平也不算很高，一桌八人，四碗菜。先到的同学，把四碗菜分成八份，一般以青菜为主。主食是高粱米，也有窝头，发糕很稀缺，但主食不限量。大家站着，围着桌子用餐，记得一个月的伙食费约6到7元。一些班干部常常端着饭碗，边吃边到周围饭桌聊天，谈国家大事或班里的工作；有的到饭厅外的壁报栏（过去称“民主墙”）看“新闻”。每天用餐时间是十分热闹的，中午食堂里总会响起广播，传递着校内的各种信息，或是国家大事，有时还播放一些歌曲，成为当年的饭厅一景。

## 清华的学风

清华的学习风气真可谓不同一般。在校园里总能看到那些夹着书本和计算尺的同学匆匆上图书馆，那准是工学院的学生；在校园的树林深处总能听到文学院的学生在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外语。绝少有人在校园里聊天或闲逛。相反，你总会听到这个系、那个班的那些成绩惊人、出类拔萃的同学们的传奇性故事。你如果去参加一些讨论会或座谈会，也会经常听到一套又一套滔滔不绝、不同凡响、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可谓高手林立，人才辈出，不少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勤奋、自觉是必然的，像我这样根基较差、效率较低的同学，总免不了产生几分自卑。当时的考试、考核非常严格，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就被开除，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就要留级（只许留级一次）。对我来说，当时不求高分，但求通过。

经济系二年级专业课程的比重已经比较多，如统计学、会计学、货币与银行等课程的课时占了较多的份量；基础课还保留了政治经济学、俄语和体育。整个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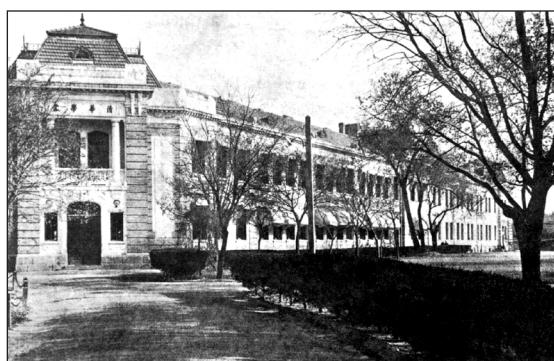
年级的课程排得比较满，还有许多讨论辅导课，课外的专业报告也接连不断。在清华和燕京上课是有些区别的。主要是清华的学生人数多，不能在听课和学习过程中随时提出问题讨论，师生之间的交流和融洽程度，不像燕京那样紧密。在清华的学习中主要靠自己去钻研，自己来解决。

## 大学应有大师

我进清华的时候，无论是理、工、文、法、农学院，都是大师云集，举国闻名者何止数十上百人。我们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老师是我国经济学泰斗，经济系的主要课程“财政学”就是由他来讲授。这门课本是为三年级同学开设，我们这些刚转学到清华的，也总惦着去旁听他的课，尽早体会他讲课的风采和魅力。当时，我们都认为“财政学”是一门非常深奥、难懂的课程。到校不久，我们终于踏进了陈先生的课堂，全神贯注地先听为快，并努力记好笔记。陈老师讲课十分严肃，他有理有据，侃侃道来，既旁征博引，又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内容精炼而丰富，逻辑性强，很有理论深度。可惜我当时的经济学水平还缺乏根基，有些道理在课堂上一时消化不了。下课后，我再次细读所记的笔记，这才发现陈先生所讲的都是一篇篇没有任何多余词句、内容精彩、富有条理的文章。如果用心去理解和运用，对经济学是可以较快地登堂入室。

说起陈岱孙先生，这里还有两件事我必须提一下。

第一件事，陈老师不但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关心弱小、仗义执言的长者。记得1980年清



清华学堂旧影

## □ 回忆录

华校庆时，经济系的校友们在清华园聚会，陈老师也去了。当他问起我现在的工作岗位时，我如实汇报，我说从干校回京后，已不在冶金部机关工作，而分配到一个有几十名家属的“五七工厂”去了。陈老师一听就直言不讳地说：“冶金部还没有完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怎么把清华培养的人才送到一个家属工厂去了？”后来这个话传给了冶金部唐部长。唐部长很重视陈老师的意见，立即批示人事司、办公厅，把我从家属工厂调到了冶金经济研究所。

第二件事，陈老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为国操劳，体现出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在他晚年时，党和国家提出了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老师为此奔走呼号。他曾亲自主编了《中国经济百科全书》《市场经济百科全书》。这时他已年近九十，他说，我是第一批到国外学市场经济的，现在祖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编好这部《市场经济百科全书》是义不容辞的。他的话语感动了全体编撰人员。他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亲自筹备编写和出版工作。在他的鼓舞下，我们研究所和我本人也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为这本书写了关于“工业”“生产率”等方面的几十个条目。陈先生对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多次批阅原稿，提出修改意见，极为认真。只可惜陈老师没有来得及看到这本书正式出版就与世长辞了。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年给我们上“统计学”的是戴世光教授。上课的第一天，他就给我们留下清晰的印象。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重点突出，逻辑严谨，课程总是安排得有条不紊。他从最基本的统计表如何划，一直到

各种不同统计对象的统计原理、分析方法，如何从繁杂的现象中去芜存精、表述清楚，都讲解得入木三分。这一年的统计学学习是我一辈子都受用无穷的。

我是到清华后才开始学俄文的。对于我们文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学俄文似乎是形势的需要，而不是学习的需要，因为我们的课本包括参考书都没有俄文本。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学俄文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课时很少，老师也少，但是学生很多，一般在大教室，甚至在大礼堂里上课。我记得光是俄文字母就学了很长时间，一年下来，收获有限，同学们似乎是在“随大流”。后来我在工作中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俄语，时至今日，连俄文的字母也记不全了。

### 马约翰教授的体育课

在清华给我留下记忆的另一门课程，居然是体育课，这可能因为我属于擅长形象思维的那一类型的学生吧。我在体育方面没有什么专长，运动时甚至是笨手笨脚。体育课当时是作为一门不可缺席、不可不及格的课程，因此学校对体育设施、师资都是相当重视的。我的体育老师是全国颇有名望的马约翰教授，上课他只讲英文，因为他的中国话是福建方言，我们听不懂。他上课时有一位助教，为大家作翻译，并做一些示范动作，或帮助同学掌握各项运动的要领。马约翰老师那时快70岁了，但体格健壮，冬天还穿着白短裤、白衬衫在户外活动，还经常打网球。他告诉我们，因为他经常运动，所以身体好。他每周给我们女生班上两节课，每天还要指导和督促我们进行“劳卫制”达标锻炼，工作非常认真、热情。

我们体育课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又独特的。每节课的内容是马老师自己编排，他自编自教，每节课的内容几乎都不相同。例如：为了锻炼反应能力，他事先在墙上画了许多白色的圆圈，直径不到半米，每个圈内写着不同数字，而且不按顺序排列着。上课时，让你站在离圈若干米的地方，持着一个篮球，快速顺时针自转。待你转得头昏眼花时，他发出命令，叫你把球投向几号圈。这样连续做10次，记录你投中次数，加以计分。一直练到你“及格”再让你去打篮球。

同样，在打排球之前要先练发球。在对方排球场地上划了许多方格，每格都写了号码，然后，他发令要求发一个高飘球，或刹球，或低球，等等。要求你发到几号方块内，并一边做记录，直到大家都基本合格，才让大家练排球。总之，各式各样的球类、田径类的运动，都先要有一段基本技巧的训练，并在讲解各种规则之后再进行活动。

再如游泳项目，因为清华当时只有一个很小的室内游泳池，很难满足教学需要。老师就想出一个办法，在岸上用“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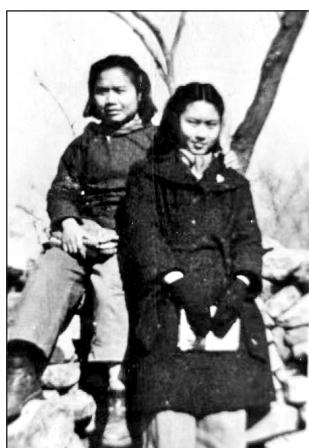
游”的方法，训练“自由式”“蛙式”的姿势，并强调了姿势不准确的危害。练到姿势准确以后，才让你下池。

清华“劳卫制”达标项目的练习抓得很紧，要求全校同学人人达标。这样每天下午下课后，操场上、体育馆里，甚至空地上都挤满了人，分头在锻炼，一般每天要坚持30~40分钟。“劳卫制”的标准分为两档：及格和优秀，一般优秀的成绩要高于及格20%左右。例如跳高，女子要达到0.9米为及格，1.1米为优秀。如果有的项目达不到及格，但另一些项目达到优秀，则可以抵补。这些标准对我这个广东女孩来讲是难不倒的，我基本能达到优秀和及格，唯有一项万米长跑没有通过。那次测验是我第一次跑万米，跑到终点时，差一点就达标，但人已倒下。马老师把我测试各项的结果算了一下，认为我总体已经达标，因为可以用其他一些优秀项目来弥补。这时，他嘱咐我不要轻易跑一万米，因为我当时身体太弱、太瘦。老师还叫我每天坚持吃8颗花生米，要挑又大又胖的吃。我还去练过射箭，以增加肺活量，增强胸肌。马老师亲自教我持箭、拉弓、瞄准，以及如何配合呼吸等。他大声对我说：“记住！8颗！”70年过去了，他的声音仍言犹在耳。

## 课外生活

在清华学习期间，学校强调对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改造，经常会邀请当时的社会名流、国家领导人来作形势报告。一些文艺演出也是围绕着阶级教育展开的，如歌剧《白毛女》《刘胡兰》、话剧《龙须沟》等。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校掀起了参军



（右）一九五〇年，薛传钊学长与陈兆庄同学合影

## □ 回忆录

参干高潮，体现出改造思想运动的成效。经过各种思想教育，我熟悉的同学大都自愿报了名，只有个别人没有报名，大家都认为为祖国献身是光荣的。因为名额有限，在全校两千多报名者中只批准了50位同学，我们班三十多位同学只批准了两人，但这个活动对所有同学都是一次深切的爱国主义教育。

1951年1月初，在大礼堂举行了为50位参军参干同学的欢送大会。校团委书记林寿屏和学生会主席凌瑞骥肩扛着光荣榜上第一、第二名同学和数十位战士列队走进大礼堂，全校师生沸腾了，这一活动也达到了最高潮。在等待批准期间，同学们都想为朝鲜战场的战士们作点贡献。许多同学写了慰问信，一些女同学为前线战士做棉手套。尽管大家都不善于缝纫，但这些手套都是经过各班同学的精心设计和缝制的。有的班做了能伸出食指扣扳机的样式，有的做了能活动手指的样式，有的在手套里放上一封热情的慰问信。记得我当时在学生会文娱部工作，为了介绍这些活动，还与学生会学艺部的钱宁同学合作，在校刊《人民清华》上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战士掌心暖，同学手中线》。

周末，我一般不会进城购物，也不会去远处游览，因为我享受的是特级助学金，除了交付伙食费，所余有限，能买一包花生米或一两粒水果糖就算是很好的享受了。班上细心、热情的王淑华同学发现我连洗脸盆也没有，就悄悄地送我一只大脸盆和一些生活用品；黄钦若还给我拿来一件厚厚的蓝布大衣，让我暖和和地过冬。

### 被推举到学生会工作

我转学清华不久，在没有思想准备的

情况下，被同学们推举到清华学生会担任了文娱部副部长。这项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但容不得推辞，班上的同学一致表示会全力支持我。

学校里的文娱工作内容实在太多了。每周要为同学放映一次电影，要组织各个社团开展活动，节假日前要组织推动的文娱活动就更多了。当时文娱部的头儿是周森，我负责的是社团工作，包括舞蹈组、腰鼓队、歌咏队、话剧组等。除了定期组织活动外，每逢节日就更忙了。既要演出，还要推广、示范。例如国庆节前或五一节前，为了做好游行及天安门前的联欢活动，舞蹈组的成员除了要准备好几场表演的节目外，还要负责教会全校各系各班文娱干事跳若干个新舞。文娱干事学会之后，他们再回到各自的系里、班里，教会全体同学。有困难的还可以请舞蹈组的成员去辅导。其他的社团则各自组织排练新节目。节目的来源是请校外专业或业余单位来辅导，更多的是自编、自导、自演。到演出时一般都能拿出新的、结合形势的好几个节目。从这些工作和各社团的演出水平中，可以看出清华确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大家不但功课好，而且很多同学是多才多艺的。各种人才汇集到了清华，只要领导提出要求，学生会稍加组织推动，很快就可以拿出一台五彩缤纷、令人耳目一新的节目。

1950年11月的一天，上午最后一节课快要下课了，广播通知所有同学到大操场集合。学生会主席凌瑞骥同学站在大操场高高的主席台麦克风前，慷慨激昂地传达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定。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所有学生会的委员们立刻集中开会，为的是布置一台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

演出，这场演出只有2—3天的准备时间。随后文娱部立刻组织各路能人研究策划。主席集中意见，安排了两个小时左右的晚会演出的大致内容。当即明确分工，并分头行动起来。话剧组负责新编一出活报剧，指定专人通宵写出剧本，并分头安排演员，配合演出的乐队，灯光、布景、服装、道具等一整套人员，都要在第二天下课后集中，听剧本要求，分头准备排练。排练时间十分短促，还配了不少提台词的人员。其他社团也各自领了任务，一边编，一边练，在排练中随排随改。到了周末，大礼堂里一台两个多小时的文娱演出就有声有色地上演了。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教育和锻炼。我当时的角色是前台负责人，其实当时我并不清楚具体该如何组织，是高年级的能人在旁不断提示、指导下，协调前、后台的节奏，以及上下节目间的衔接，真是紧张得很。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文娱不仅要抓现实的活动，还要抓长远的活动，做到各个社团都有储备。在



1950—1951年间，薛传钊（前排左2）与学生会文娱部等同学的合影

舞蹈组的同学中，我们请那些功底好、学得快、善于教舞的同学在周末或课余，到一些专业学校或文娱单位，去学一些新的表演舞和集体舞，学会之后再回来教大家。同时也找机会邀请一些舞蹈专家来校讲授。我们曾邀请过中国舞协的孙晓邨星期日来校讲课，整整一个上午，他在草坪上边讲授边示范，热心地介绍了我国各主要少数民族舞的特征、文化背景、发展渊源等。

在清华园里还经常有机会欣赏一些国内外著名团体和个人的演出，有时也有一些交流。有一次京剧名家张君秋来校演出。我们对京剧的化妆十分好奇，特别是男扮女装。于是，我们提出要求，想参观他的化妆全过程，没想到他欣然答应。他一边化妆，一边给我们讲解，从京剧的脸部扮相到包头，到如何把大脸盘变成秀气的闺秀，如何戴头饰、甩水袖、走云步，做了耐心细致的讲解。还有一次是苏联的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来中国演出，那天，她来清华参观，应大家的要求跳了一小段。最后，她邀请了几位同学，作为她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制作纪录片的观众。我有幸被邀，看到了她的精彩表演，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到怀仁堂。

在节假日或周末的晚上，除电影演出外，我们还组织各种娱乐晚会。我们常常在三院教室举行棋类、猜谜语活动，举办古典音乐欣赏，开辟游戏室，教交谊舞等。各活动室都挤得不行，十分热闹。

每逢国庆节、五一节要做的事就更多了。全校师生为了参加游行，或是到天安门前联欢，都要学会一些新的集体舞，还要学唱一些

## □ 回忆录

新的歌曲。这些教歌、教舞的任务，都是在节日前十天左右开始安排和练习。

为完成以上任务的一些后勤工作也是十分艰巨的。有一次排演一个新疆舞和一个西藏舞，一切都准备就绪，就差服装。我和熟悉北京城的马德容同学一起进了城，先找了几个专业团体，多次碰壁还是借不来。我俩绞尽了脑汁，想起到民委试试看。这次出乎意料地顺利，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问清来意，经过请示后，带我们参观了礼品陈列室，我们看到了藏服、新疆帽，但没有新疆女服，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地区送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礼物。我们告诉他回去确定演出时间后再来，并再三致谢。

可是新疆维吾尔族的服装却还没有解决，而已到黄昏时刻。想来想去，不知怎么灵机一动，就想到印度大使馆借两套白色长裙，不是很像维吾尔人穿的裙子吗？于是，两个人风风火火地直奔东交民巷。这次也很顺利，一下子就有人把我们引到大使馆内的办公大厅。一位工作人员客气地问了我们来意，高兴地说：“好，我夫人的就可以借给你们用，只是今天拿不来，等你们什么时候用，就可以来拿。不过有一个请求，希望去学校观看你们的演出。”我们没表态，只说来取衣服时再告诉演出的时间。表示感谢后，我们就赶快回学校了。

第二天，大家正为解决了服装难题而高兴时，学生会主席把我们找去了。他笑咪咪地说：“你们好大的胆子呀！连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也敢借，还跑到外国大使馆去借衣服！你们真行呀！但我告诉你们不能借！”他讲了一大堆理由，最后他说：没关系，是我事先没交代好。你们赶

快进城告诉他们不演了，服装也不借了，不就行了吗！我们听了之后，半懂不懂地照办了。最后，还是大家拆被单改装了几套服装，问题才得到解决。

在清华经济系二年级的一年里，过得热烈、繁忙。业务学习上固然有不少的收效，同时在思想和工作方面的锻炼和收获更是前所未有的。

## 离开清华

1951年的暑假，我们正在北京城里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实习。原计划实习两个月，大概一个半月左右时，学校通知我们立即返校。原来国家决定，让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的法学院全体师生到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一年。这是一次完全脱离专业学习，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的锤炼。同我们一块参加土改工作的还有全国政协的部分委员，以及财经、政法、文教、卫生等系统中的一批知名人士。由于广西当时土匪猖獗，因此还有一批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干部和战士配合，是一支浩浩荡荡很壮观的队伍。

我们先在北京集中学习，四校同学集中住在北京大学的红楼，学形势，学政策，学工作方法，了解当地情况。1951年8月下旬，大家高高兴兴地扛着行李，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前门火车站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令人意外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同志亲临火车站，他老人家充满着热切的期盼，向每一节车厢的同志们挥手送别。

我们在广西参加了一整年的土改工作，回到北京后又经历了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我最后一年的大学学习是在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完成的。



## 清华校友的凝聚力

○金富军

在国内的大学中，清华大学校友的凝聚力强是大家普遍公认的，这是清华大学自我意识较强的外在体现，也是清华校友对“清华人”自我认同的体现。其形成源于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

这种凝聚力，首先来自学校尤其是早期周诒春校长的大力提倡。

1914年，周诒春发表演讲，呼吁“清华学生当群策群力同气同声，以达救国之目的”，他说：“事之成败得失在群与散及合与离。清华同学均爱国男儿，以救国为前提，则欲达此目的也，在团体力之凝结而已。苟能一心一意，不折不挠，不顾艰难困苦，互相提携，一直做去，将来各以其所学为社会用，为国家用，数十年之后，内乱自消，外患自灭，中华民国四字灿烂炫耀于光天化日之下矣。”

周诒春特别强调实干，他指出“今日中国所急需者，非高谈阔论之理想家，乃身体力行之实验家也”。学生要在各种团



唱歌团，内有黄自、陈植、方重、梁思成、应尚能等

体中着眼于大体，不谋小团体利益。通过联络、团结，胜不骄、败不馁，才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显然，周诒春的立足点还在于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在残酷的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

周诒春长校期间，共有基督教青年会、唱歌团、孔教会、达德励志学会、清华学会、清华科学社、国情考察会、法文学会、文学会、铜乐队等20多个专门性团体陆续成立。出版物方面，除了全校性的《清华周刊》《清华学报》《清华年报》等外，各级还有自己各种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华园里丰富的工作、学习生活。学生通过主办、参与各种活动，培养了良好的集体意识与合作精神。

1923年毕业生张忠绂指出：“西方学校提倡运动的真正价值原在训练学生严格遵守规则，在两方面同意的规则下，作公平竞争。本团的团员必须有和衷共济的



闻一多、杨廷宝发起“美术社”，有冀朝鼎、高士其、梁思成、沈宗濂、唐亮等

## □ 史料一页

精神（team work），不能因个人想出风头，而影响全体的得失。”清华学生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清华学生善于自觉，富于同情的观感，具有牺牲的志愿，常时得着作事的乐趣，尤肯顾全团体名誉”。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来自清华学校同学共同数年的学习与生活。

清华学校招收中等科学生年龄在12至15岁之间，年纪幼小，根性未定，清华订立了许多关于教务、总务、斋务、游学、考试、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的规定。1919年《清华一览》所载各项规则多达90个，乃至于洗澡、写信、花钱等学校都有规定。经过几年严格管理下的熏陶，清华学生在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养成了相似习惯甚至模式。加之五四运动以前，学校禁止学生“与闻政治”，全校没有自治会、学生会等全校性学生团体，只有每级级会以及一些学生自由组织的社团。学生日常活动，主要在本级同学之间展开。在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中，建立起非常深厚的感情。

在数年深厚的感情、相似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及工作态度等因素作用下，逐渐催生了清华师生、校友中的强大凝聚力。“清华人”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份情感。著名哲学家张起钧在比较清华北大不同时指出：“清华的学生入学校，那是人生的开始，同学们既是玩伴又是将来的战友。”可谓一语中的。1922年，著名学者罗隆基评论：“清华学生之团结，乃为八九年同学感情上自然之结合，其趋势必成为中国留学生中极坚固之团体，或且成为中国青年中极坚固之团

体，或且成为将来中国社会里极有力量之团体。此种团体，将来之极止如何，此际无人能预断，惟此种团结，在人情上实为自然之结合，在事理上实为应有之结合。凡为清华份子，应忠诚勤恳以观其成；而非清华份子，实亦无容其嫉妒也。”“清华团体实已由幼稚时期，而进至发育时期，留美清华生之各地支会先后崛起，确系清华团体发育之兆征。”

1918年初，周诒春离开清华。五四运动后，由于校内外形势变化，清华的严格管理有所变化。但此前周诒春的大力提倡和学校独特的管理催生的团结的基因已经形成并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清华文化中有特色的、清华广大校友引以为豪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清华同学会成为学校和校友的联系纽带。

1913年，清华同学会在母校成立，1914年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同学会”。1915年在美国成立总会执行部，1933年移至国内，更名为“清华同学会总会”。清华同学会成为校友联系学校、相互联络感情的平台。同学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校友联系起来，不但将在校的情义延续到走出学校以后的生活、工作等多个方



达德学会合影，二排右4为校长周诒春，右1为副校长赵国材

面，也在无形中加强了“清华人”的身份认同。

清华文化中的团结、凝聚力强，对学校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留美同学通过自己对清华以及美国就读学校比较，经常就清华校务提出建议和意见。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清华校友在改组董事会等方面对母校校务更为关心，通过各种渠道对清华校务产生积极影响。清华同学会定期编印同学录，还购置同学会会所，在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互通信息、相互扶持。

应该看到，这种团结如果过度，不加以引导和克制的话，难免产生不良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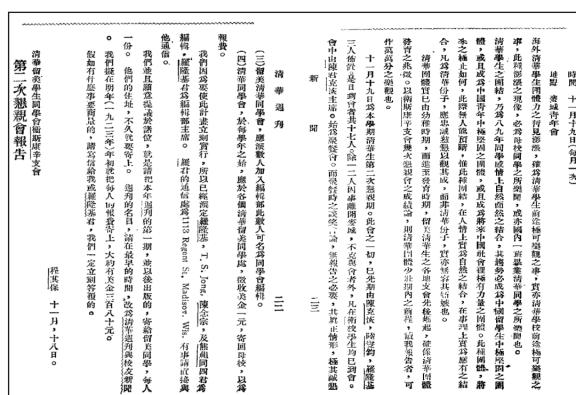
例如，在1920年代，教师聘任倾向于本校出身的人，1927年在职的67位教师中，清华出身、非清华出身、外籍教师分别为34人（51%）、26人（39%）、7人（10%），当时社会上存在对清华小团体主义的批评。罗家伦、梅贻琦等校长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他们改造下，清华教师中清华出身与非清华出身教师比例接近，分别占49%和45%，趋于平衡。而正是这样

的教师队伍，造就了1930年代前期清华的快速发展。

就学术发展而言，教师来源的多元化更有利于高水平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出身北大、长期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曾称赞清华的民主气氛：“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组织，似乎还只是极少数。在这极少数当中，清华大约可以算得上一个。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不易得的。”“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和清华关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爱护清华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难得的是他知道怎样爱护清华；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这个民主的机构，由大家的力量建成，还得大家同心协力来支持；梅先生和校务会议诸先生虽然领导

有方，但单靠校长和少数人还是不成——只要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样爱护清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一切顺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长，清华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的。”

的确，教师能感受到自由气氛，并自觉是学校的一分子，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学校，清华焉有办不好的道理？反过来说，当年梅贻琦校长的领导，升华成一种更高境界的团结，那就是“爱护清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一切顺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长”。



罗隆基：《清华留美同学会卫斯康辛支会第二次慰亲会报告》（《清华周刊》，第265期，1922年12月30日，第23页）

## 庚款负笈 自强追梦 ——由一张留美清华同学老照片说起

○袁 帆（1975级建工）

最近我在上海图书馆的收藏系统中发现了一本《清华同学会中文期年刊》，这是由留美清华同学会于1917年在美国编辑印刷的珍贵史料。书中有一张合影照片十分引人注目，其英文注解为“Tsing Hua Reunion at Andover Summer Conference 1916”（1916年安多佛夏令会的清华团聚）。从这张拍摄于一个世纪前的老照片上可以辨认出共有80人（女士20人，男士60人），另有一名幼儿。照片中似有7名外籍人士（女4人，男3人）。

在《年刊》的“同学会新闻”中有一则“恳亲大会”的报道，可以视作是这张合影的背景说明。报道全文如下：

本会去夏在美国麻省安独佛，于中国学生夏令会时（八月下旬），集与会诸会友，开恳亲大会，并聚餐于安独佛高等学堂之膳厅，到会者约八十余人。除清华旧学生外，来宾甚多。此外留美监督黄佐庭先生，及前清华教员卞格题二女士，史丽女士，沙伯女士，胡乐德博士，华而富博士等，济济一堂，颇极他乡遇故知之趣。

由杨君永清主席，黄监督，胡博士，余君日宣，桂君质庭，陈君立庭相继演说，妙语生春，合座欢然。继复唱母校校歌，及各种欢呼。殿以史丽女士之《空城计》。“此曲只应中国有，异乡哪得几回闻”，出之史女士口中，尤觉高山流水，



留美清华同学聚会合影（1916.8 美国）

有绕梁不绝之妙，众大乐之。男女诸同学，因且歌且笑，且笑且餐。及散，已夕阳在山矣。旧雨联欢，离愁消歇，更不知在他邦作寓公也。

## 一、老照片的拍摄背景和重要历史人物

细读这则报道后，关于这张老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大致情况已经比较清楚。原来这是1916年8月下旬，“留美中国学生总会”在美国麻省 Andover（安多佛，旧译：安独佛）举行夏令会（Summer Conference）期间，“留美清华同学会”专门召集参会的清华同学举行“恳亲会”时拍摄。拍摄地点是在安多佛中学（Phillips Academy Andover）。这是一所创办于1778年的著名美国私立高中。

自1909年清政府派出首批庚款留美生之后，至1915年共有377人享用庚款赴美留学，这些人在历史上都被算作是清华同学。据《年刊》披露，1916年8月在美国各学校留学的各级清华同学还有190人。也就是说，约有70人出席了这次聚会。综合能够找到的各种资料，可以大致梳理出报道中有名有姓的几位清华留美生的简要情况。

担任集会召集人（主席）的杨永清（1891—1956），浙江人，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法律、政治，获得硕士学位。他回国后于1927年起担任东吴大学的首位华人校长，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如今的苏州大学在校内为他竖立一尊铜像以示永久纪念。余日宣（1890—1958），湖北人，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政治及教育，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



杨永清先生

教育事业，曾担任清华大学首任政治系主任，后在上海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在《清华大学志》中被列入清华大学“人物”榜中。桂质庭（1895—1961），湖北人，在美学习物理学长达8年，1917年在耶鲁取得学士学位，1920年在康奈尔取得硕士，1925年在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回国后一直在湖北武汉的华中大学中担任物理教授。他热心社会工作，曾是清华同学会刊物编辑部的英文编辑。陈立庭，山东人（1892？—1947），1917年在耶鲁获得文学士学位，后还在麻省理工学习，回国后曾在上海金城银行供职，担任过甘肃财政厅厅长。

非常巧合的是，这四人都是清华学校高等科1913级同学，毕业后于1914年赴美留学。由此我联想到，清华留美同学会正是1913年6月29日在清华园成立的，这一天也成为今天清华校友总会的成立日，而首任会长正是杨永清。根据清华校史记载，在1914年8月赴美途中，同学们和护送他们的校长周诒春（1883—1958）一起，于“中国”号邮轮上重新修订了《清华同学会章程》。所以说，照片上的同学都是清华同学会“鼻祖”级会员，他们参与并见证了清华校友总会历史的肇始，杨永清的名字也被列入清华大学“知名校友名录”中。

此外，在出席聚会的女士中，极有可能包括1914年6月考取的第一批10位清华专科女生，她们是：汤霭林、王瑞娴、周淑安、张瑞珍、陈衡哲、唐玉瑞、杨毓英、韩美英、薛林荀、李凤麟。她们和后来考取的6批专科女生一起，成为“庚款留美女生”群体（共53人）。虽然她们都是并未在清华园中学习过的“清华同学”，但她们是民国早年女青年中的佼佼者，回国后也大都成为我国中高层次女知识分子中的先驱人物，这一点已被记载于清华的历史中。

根据清华校史记载，早期的清华学堂（校）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十分重视英语及有关西方人文和现代学科教育，专门从美国聘请一批具有一定教学资质的教师前来任教。1911年2月，就有16名美籍教师到校执教，他们也是清华的第一批外籍教师。他们传授包括英、法、德、罗马、拉丁等外语，物理、化学、数学、科学、生物、经济、历史、地理、演说学、音乐、绘画、手工、体育等多门课程，另外还兼任校医等职务。从授课及兼任的工作不难看出，当时这些外籍教师在清华教学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

这次 Andover 聚会的另外一个亮点，

是有多位曾经在早期清华任教的外籍教员出席，包括“卞格题二女士，史丽女士，沙伯女士，胡乐德博士，华而富博士等”。这些外籍教师的英文名字以及他们在清华教授课业的具体情况虽然需要进一步考证，但他们在清华的经历则是确定无疑的。从清华园分别几年后，昔日的中外师生在美国相聚，久别重逢的场面与气氛想必十分感人。特别有趣的是，其中的一位外籍教师“史丽女士”在聚会的最后，竟然还以一曲《空城计》“压轴”，引起“众大乐之”。由此猜想，这位女教师应该表演的是京剧清唱，以她在清华的短暂停时间里竟能学会中国的“国粹”，并能在回国后仍能熟记于心，她对中国文化的迷恋程度可见一斑。难怪与会清华同学不免心生“此曲只应中国有，异乡哪得几回闻”“尤觉高山流水，有绕梁不绝之妙”的由衷感慨。这或许也可以说明，外籍教师在清华园传授知识和西方价值观的同时，也必然感受到东方文明不同寻常的魅力。

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



第二任驻美留学监督黄鼎

## 二、关于黄佐庭学监的逸事

随着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到达美国，清华历史上就出现了名为“留（游）美学生监督处”的机构以及“驻美学生监督”这样一个特殊职务。到1933年清华最终裁撤“留美学生监督处”，24年间先后担任或代理过“留学监督”的有容揆（1861—1943）、黄鼎（1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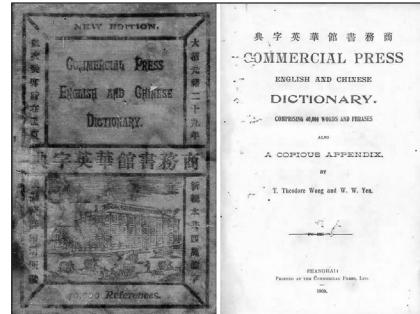
1919)、施贊元(1888—?)、赵国材(1879—?)、梅贻琦(1889—1962)、于煌吉(1899—1968)、赵元任(1892—1982)等7人。这其中有一人任职时间最长，担任监督近8年，他就是黄鼎。

黄鼎是谁？这是所有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人都要提出的问题。虽然时过境迁，关注他的人寥寥无几，但他绝对是近代中国教育史、文学史、清华史都不应该忘记的人物。在清华学校1917年出版的《游美同学录》上，我找到了有关黄鼎的记载：“黄鼎，字佐廷。1874年生于上海。189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自费留学美国。1896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1897年回国后任教于圣约翰大学及某校；1901年任山西大学堂翻译；1904年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兼任沪宁铁路总翻译及秘书；1911年起，任驻美国游学监督。曾为学生报编辑，译有《迈尔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雷森氏化学》(Remsen's Chemistry)及《克洛特氏进化论》(Edward Cloud's Evolution)。”

由此可知，照片中的“黄佐庭”与黄鼎(黄佐廷)就是同一个人，他的英文名为Theodore Ting Wong (T. T. Wong)。从他的履历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在19世纪



1917年清华学校编《游美同学录》中有黄鼎的简历



1905年黄鼎校订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

下半叶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大潮流中走在前列的社会精英人士。更多的研究表明，黄鼎是弗吉尼亚大学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他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使得他在回国后就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迅速发挥作用。

从1901年任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翻译开始，他参与的多部译作都产生重要影响，而该机构正是由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在上海设立的。在这期间，黄鼎和南洋公学出身的张在新合译了6篇福尔摩斯小说，Holmes的名字经由他们被首次译作“福而摩司”，进而转化为“福尔摩斯”这个流传至今的约定俗成的译法。此外，黄鼎还参与翻译和出版了有关高等、中等以及师范学堂的教学用书和外国名著共23种，包括《克洛特天演学》

《最新天文图志》《最新地文图志》《世界名人传略》等。而由他主导翻译的美国人迈尔(P. V. N. Myers)所著的《迈尔通史》，在清末民初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西洋”史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重要地位。甚至于在商务印书馆1905年出版的《华英字典》，这本中国近代由华人编纂的著名双语词典，校订者也是黄鼎和



黄鼎在聚会合影中处于中心位置

曾经兼任清华学堂总办的颜惠庆（1877—1950），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的中西学识与翻译造诣达到相当高水平。

黄鼎的学历和学术影响势必会引起社会各界关注，1911年9月16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游美学务处向清政府外务部申请由黄鼎出任留美学生监督，呈文中写道：“查有美国大学毕业生黄鼎，福建人，年三十八岁，回国十有四年，历充山西大学堂、上海梅溪书院及沪宁铁路等差，教育素有经验，办事亦甚勤敏，以之派充驻美留学监督，洵堪胜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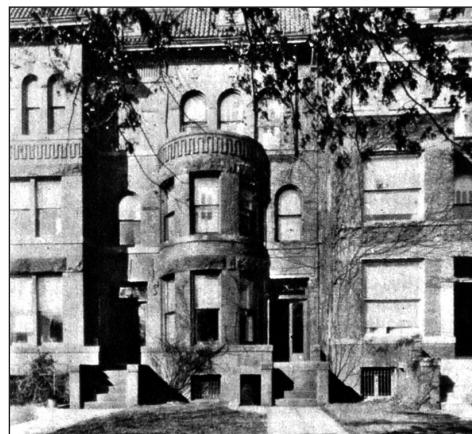
也就是这样，黄鼎开始了近8年之久的驻美学监的职业生涯，从而与留美清华同学产生了历史交集。虽然有关黄鼎担任驻美学监情况的一手史料还有待挖掘，但可以想象的是，他任职的那些年，正是清华派遣庚款留美学生的高峰期，帮助几百名留学生“安置学校、照料起居、稽查功课、收支学费”的日常管理工作自是十分繁忙，加之学监并非正式外交官，社会地位有限，在异国他乡处理纷繁事物，没有敬业精神和办事能力显然无法胜任。

从《年刊》中得知，在1916年8月的清华留美同学聚会上，黄佐庭（黄鼎）监

督发表了演说，在合影的老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黄监督”是坐在第二排15人的C位，这也表明了他在留美同学心中的地位以及融洽关系。类似的清华同学聚会一定还会有不少，黄监督肯定也将此当作联系留学生的机会，列为他的日常工作而时常奔赴美国各地。

然而恐怕谁都不曾料想，在两年后的1919年1月29日晚，黄鼎竟然在位于华盛顿卡罗拉马路2023号（2023 Kalorama Road, Washington）的驻美学生监督处内惨遭枪杀身亡，同时遇难的还有监督处的雇员谢昌熙。这件曾轰动一时的命案当时在清华留美同学中引起的震惊可想而知。美国警方虽然努力破案，但最后却因种种原因而将案件办成了一桩历史“悬案”，真凶至今也没有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不过综合各种迹象，表明这起命案与觊觎驻美学生监督处掌管的大额款项存在直接关系，个别留学生的品德恶劣，渐起歹念，谋财害命是大概率事件。

然而，这起案件复杂的侦办过程却意外地促进了美国司法制度的改革，确立了



驻美学生监督处位于华盛顿卡罗拉马路 2023 号内

“供词自愿”这一原则，直至影响到47年后发生的“米兰达”（Ernesto Miranda）一案。1966年，美国联邦法院就是利用“黄鼎遇害”的侦办案例，确立了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最终促成了“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的诞生，亦即如今耳熟能详的名句：“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一切都会成为呈堂证供……”（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refuse to answer questions.）黄鼎在人类促进社会进步的历程中最后一次“被留名”，代价却是宝贵的生命，这既令人感到意味十分苦涩，却也显示出血色的价值。

### 三、历史的沉思与启迪

在对老照片中的人和事进行梳理之后，我被其中包含的信息量所撼动。尤其是通过黄监督的个人经历以及他的悲剧，让我对早期留学生学习之路的崎岖坎坷有了进一步了解。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再来细细端详这张老照片，我不由地陷入沉思……

老照片上人们，无论长幼、男女、中外，共同排列在写有“清华”二字的旗帜之后，表明他们都是“庚款留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直接关系人，并且十分看重与清华的关系。事实上，早期的清华学子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对享受“赔款”留学包含的民族耻辱是有概念的，对肩负向西方文明“取经”的使命也有一定认识，因此大都能秉持“修身养性，严于律己”的信条，在刻苦学习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保持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在他们中鲜见以不正当理由滞留者，毕业生都能在学成之后，毅然返回祖国效力。正是这样，

才使得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教育事业的启蒙者和推动者。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清末民初兴起的出国留学运动有着非凡的意义。在当年的“留学潮”中，依照不同的留学国别、不同的留学生籍贯、不同的留学性质形成的社团不在少数，“庚款留美生”团体只是其中之一，且不是最早出现，然而却是为数很少的有着明确的使命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又有系统组织（留美学生监督处、清华留美同学会）的群体。这样鲜明的特质，决定了清华庚款留美生的整体表现、以及后来发挥的历史作用“独树一帜”，在中国教育（留学）史上留下可圈可点的一页。

透过一张老照片，无意间触及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清华留学史逸闻。当我再次凝视老照片上一张张意气风发的年轻面孔时，让我对清华庚款留美生这个优秀群体有了更多一层的认识。尽管现在无法确切知道照片上的学子具体都是谁，但并不妨碍后人对他们保持一份应有的敬意。“庚款留美生”在清华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榜样效应，留美同学会的建立为清华校友工作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着今天，乃至未来清华的持续发展。这无疑可以视作是这个特殊群体为清华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值得一代代清华人永远从中汲取营养，领受启迪。这正是：

中华振兴路艰难，取经渡洋不畏远；  
庚款负笈责任重，自强追梦信念坚。  
风云际会过百年，报国宏愿终未变；  
前贤启迪后辈志，清华抖擞再发展！

2021年1月30日 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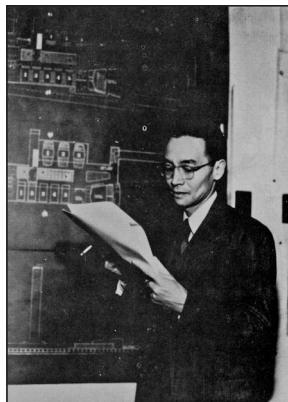
2021年2月22日 五稿修订



# 雨露滋润 铭记师恩

## ——纪念先师梁思成先生诞辰 120 周年

○ 奚树祥（1958 届建筑）



一九四七年，  
在纽约国际建协介绍联合国大  
厦设计方案  
梁思成先生

我1952年入学清华，是院系调整后建筑系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中学时大家都怀着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所以大多数同学都报考理工科。学生们当时已熟知梁思成先生大名，慕名报考清华建筑系的同学不少，仅我所在的杭州高级中学，这一届就有四名考取。

进了清华后却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位名满全国的教授，他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有关他的种种传闻却影响了我们整整六年。当时“中国建筑史”的授课老师是莫宗江教授，辅导老师是黄报青、李承祚。

梁先生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但他确实像神一样立在学生们的心中：任公长子、梁林佳话、营造学社、保护古都、清华创系、古建研究、李庄生活、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这些都打动着我们年轻人的心，对他十分崇敬。

系里偶尔有活动，我们才有机会见到这位身着中山装、手执拐杖、腰背微驼、笑容可掬的长者。有一年埃及建筑师代表团访华，团长被请到清华来演讲，起初汪坦老师任口译，过程中，梁先生可能感到汪老师的翻译忠实有余而生动不足，于是主动要求代劳。他语言幽默诙谐，成语信手拈来，令所有在场的师生都深为折服，不断爆发出笑声、掌声。埃及教授也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这是我在清华求学六年，唯一一次领略他的风采。

梁先生对年轻人爱护有加。1958年北京设电视台，次年要召开第一届全运会，系里许多青年教师缠着梁先生，要他送一台黑白电视给系里。这在当时属于高档消费品，对梁先生这样的一级教授，也属价格不菲，但他竟也慨然应允。

从清华园到东华门路途遥远，当时要乘学校烧木炭作动力的班车，周末进城很不方便。梁先生回国时带回一辆被学生称作“小臭虫”的Chrysler轿车，开始自己开，后来送给清华，进城由学校派司机接送。青年教师经常“揩油”，搭他的便车。梁先生好说话，来者不拒，所以每次进城，小车都超载，挤满了年轻人。梁先生后来提起此事时笑着对我说：“开始我的小臭虫夹带‘小黄鱼’，后来大家都变成了沙丁鱼。”梁先生说话向来幽默风趣。

无疑，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大师，但

他更是一位有人情味、通人性的普通人。因为他的谦和，总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所以特别能团结人，上至领导下到售票员、小商贩，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1959年，我回母校建筑历史教研室进修，有幸随侍他将近两年，从没有听他说过任何人的不是。他爱才如命，惜才如宝。高庄教授性格孤傲，在系里有些落寞，梁先生有一次在教师会上说：“高庄教授有学问，从我起，大家让他三分。”这种气度和胸怀，使他团结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使清华建筑系人才荟萃，如吴冠中、关广志、刘致平、莫宗江、吴良镛、汪坦……抗战时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约而同地先后都投奔了梁先生，成为初创清华的教学骨干。

我在母校进修期间的指导教授是赵正之先生（名法参，字以行），但同时受学校安排，担任梁先生的助理，因此也有幸忝为他的学生。赵先生对元大都深有研究，但身体欠佳，所以我和梁先生的接触反而较多，除了进修外，还从系里代他收取工资和信件，基本上两三天就要去12公



建筑历史教研组开会。右起：奚树祥、莫宗江、吴光祖、赵正之、吴煥加

寓他府上一次。那时林徽因先生已谢世四年，梁先生还没有续弦，子女都不在身边，困难时期朋友们很少走动，学生们忙于功课，所以这段时间他非常寂寞。我就成了与他接触比较多的少数人之一，也因此有幸更多地受教于他。

## 艺术大师

梁师是一位建筑大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绘画、雕塑、戏曲、舞蹈、音乐的艺术大师。我看他1940年代画的建筑画，用笔流畅，挥洒自如。谈起古典音乐和音乐家，他都能如数家珍。

他常说：“不崇尚美、不追求美的建筑师不可能创造出美的建筑。”他认为美渗透在生活各个方面，他虽不像朱光潜、蔡仪等美学家那样擅长理论，但他的生活美学感悟很深。和梁先生相处使我逐渐懂得了生活美学，知道了“处处留心皆学问”的道理，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和领悟。

梁先生精通传统的金石书画，有一次他拿出一件汉代明器和一张唐代陶俑图片要我分析。他给我上课时，常拿出汉阙、石刻、经幢、碑亭、石桥、华表、牌楼等图片，分析它们的造型和纹样，告诉我它们的年代特征。梁先生上课妙趣横生，喜欢引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的诗词来解说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他的教化使我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和书本里没有的知识。

人大、政协常有庆祝或招待活动，每次送两张券，梁先生当时是单身，所以有时会带我参加。我曾见到周培源、张奚若、华罗庚等许多名人，他们误以为我是梁先生哲嗣从诚，有一次民盟“七君子”

## □ 怀念师友

之一的史良先生又一次追问，引得他哈哈大笑，回答说：“他不是小犬从诚，是我的小助教。”

梁先生有一个评论的习惯，每次利用演出中场休息时，会在节目单上写下他的评论，他对音乐、表演，甚至演员的服饰、颜色搭配和舞台美术都有许多自己的看法。

有一次他带我去民族文化宫看芭蕾舞剧《鱼美人》，中场休息时，对我小声

“吐槽”说：“张肖虎写的舞曲缺乏‘知鱼之乐’。”观演过程中，他特地把自己的小望远镜递给我，要我观察舞台上的演员，“你看她们的脖杆儿很美。脖杆儿对人体的比例很重要，太短太长都不行”。梁先生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美的精鉴，在审美问题上敢于直抒己见，由此可见一斑。但正是这些追求和他率真的性格，日后给他的命运带来了灾难。

梁先生博学多闻、兴趣广泛，听他谈天说地是一种享受。他谈学术能举重若轻，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趣味化，令听者难忘。例如他发现我常搞错清朝的年号，便教我口诀“努尔哈赤皇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朗朗上口容易记住。

梁先生对北京城和故宫布局极为熟悉，形容故宫是中国的一座“高级监狱”，说有文字记载可查，每年修缮都要失踪几名工匠——他们是被宫女们私“藏”，最后又遭灭迹。他告诉我在北京一定要去逛大栅栏，体会那里的市井文化；去颐和园时应注意后山、后湖，说这一带的布局非常精彩。

有一回讨论藏式建筑，梁先生特

意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例如当年文成公主是怎么进藏的，她对西藏文化的贡献。他要我去承德参观外八庙，于是我去了承德五天，回来后要我谈见闻和参观心得。我记得还有一次他谈到中国历史上拓跋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他在分析故宫布局时，要我从满清的礼仪制度、家庭结构和宗教信仰等几方面入手。后来我在波士顿大学接受“再教育”，写论文时就用了梁先生的这一套方法。

1960年夏天，在建研院召开有关中国建筑史稿讨论会，学校派我和吴光祖参加，我们在会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引起争论。回到学校梁先生听我说了情况之后表示，他们为出版这本书已经讨论了好几稿，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年轻人参加这种学术会议应该多听、多看、多学习，学术上要尊重刘敦桢先生的意见，把我批评了一顿。

他指导我的重点在于研究方法和工具书的利用。他要我多读《资治通鉴》，研究中国建筑必须静下心来读史料，说拾别



清华进修结束时，同寝室欢送奚树祥（中）

人牙慧成不了“大家”。他发现我的古汉语基础不够扎实，读典籍有一定困难，于是指示我补课，要我“十年磨一剑”，说这是“打基础的活儿”。这对我后来研究《中国旅邸考》帮助极大。在他身边的两年是我在建筑史领域最长知识的两年。

### 仁者爱人

梁先生对规划教研组程应铨老师一直非常欣赏。他从美国回来后对都市规划有了新的认识，对程老师的工作更加重视。程老师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是吴良镛先生的同班同学，他才气横溢，英、俄文都很好，1956年跟梁先生一起访问波兰，考察战后波兰的城市建设，回来后又开始自学波兰文。当时国内的城市规划大学教材就是他编写的。十分不幸，程老师因为支持“梁陈方案”以及为陈占祥、华揽洪被批判鸣不平，1957年被打成“右派”。梁先生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程当时和我同住一个公寓同一层楼，他孤身一人住一间，很少与人往来，所以梁先生有时会向我了解程老师的近况。我曾受梁先生嘱托，特地上门看望程老师两次。知道程喜欢集邮，梁先生细心地让我将他搜集到的外国邮票带去给他。梁先生的关心和惠赠令困境中的程老师深受感动，一再嘱我回谢梁公。

梁先生对清华在“反右”运动中落难的教授们也很同情。钱伟长1950年代初曾在苏联《星火》杂志上发表过有关中国建筑的科普文章，当时系里有人讽刺钱为“万能博士”，对他“跨界”有非议。我和梁先生谈起此事，他反问：“大家都来关心中国建筑是值得高兴的，钱先生跨界有什么不好？”当我告诉他前几天看到钱

伟长在教工食堂帮厨卖啤酒，以及听到在“除四害”运动中右派孟昭英教授上树打麻雀时，他沉默了很久。

梁先生对当时南京工学院的童寯、刘敦桢、杨廷宝三位同辈大家怀有极高的敬意。我从他那里也听到一些有关往事。

在东北大学办建筑系时，梁先生曾与童寯先生默契合作，自己离开沈阳任职营造学社后，曾请童先生代理系务。日本侵占东北后，童先生带学生入关去上海完成学业，梁先生也曾给予支持。解放军刚进清华园，北平尚未解放时，梁先生就函邀童先生赴京共事，一起建设新北京。

杨廷宝先生和梁先生在美国宾大就读时就是同门师兄弟，梁先生说杨当时是“内韧外秀”的模范生，是他钦佩的学长。梁先生回国时，杨先生推荐他任东北大学建筑系首任主任。

刘敦桢先生和梁先生是营造学社文献部和法式部的两员主帅，关系融洽。抗战后期，刘老离开李庄去重庆任职，分手前两人促膝谈到深夜，临别时两人抱头痛哭，依依不舍，梁先生后来每次去重庆“化缘”筹钱，都会去看望甚至住在刘家。清华学生因此也都尊称刘敦桢先生为“大刘公”。

### 伉俪情深

梁先生也深爱着林徽因先生。有一天晚上我去12公寓，他正低头在抄写林先生的诗作。我开玩笑说：“梁先生想林先生了？”他说：“是啊，如果她听医生的话还可以多活几年。”他说林先生是性情中人，重病在身本该卧床休息，但她固执，一旦有了灵感和创作冲动，不管多晚都会披衣而起秉灯疾书，一口气写完，甚至通

## □ 怀念师友



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林徽因摄于清华园

宵达旦。梁先生说林先生写诗不完全为了发表，而是一种情感宣泄。

那天他从《诗经》谈到古诗和新诗的异同，举“椽桷之端，悉垂铃佩”，动情地背诵林老师生前的诗作《宝塔风铃》。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诗情画意尽在朗朗声中，他还说储藏室里还堆着许多林先生的手稿，自己没有精力，也没有人帮忙整理。

当时我很想自告奋勇帮梁先生，只是进修任务太重，实在没有时间，现在想来真是遗憾，其实整理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那天他还讲了很多林先生的趣事，说她在朋友中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使她赢得了众多朋友的喜爱。他说：“你别看我话多，在林先生面前我没有说话的机会，她反应之快让人无法插嘴。”他还夸林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静如淑女，动若狡兔”。当年野外调查时，男生不敢爬的梁架她都敢爬，“穿着旗袍就上去了”，任何有助于考证建筑物历史的线索遗迹，她都不会放过，再累、再险，她

都不怕。1950年代初，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她会顶撞领导、舌战群儒。梁先生不无余悸地说：“如果林先生活到‘整风反右’，不知道能否扛得过去？”

梁师受批判时，林先生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久卧在床，但她还一直关心、同情并支持梁先生，使他能够感受到来自家人的温暖。令梁先生难以释怀的是，林先生临终的前夜，曾要护士请梁先生到她病房，她有话说，护士因为怕影响梁先生休息，建议次日安排，不幸的是次日凌晨林先生就溘然长逝。梁先生不知林先生最后还有何牵挂或嘱咐，为此自责不已。

### 拉拉“警报”

1959年梁先生入了党。有一段时间我注意到他心事重重，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突然接到系里通知，要我和吴光祖参加一个少数人参加的生活会，听梁先生检讨和大家“帮助”他提高认识，最后校党委副书记胡健总结。我因不了解情况，没吱声。结束后我不放心，陪他走回家，一路上心情沉重，不知该说什么。

过了两天我去他家，他的情绪平定下来，谈起那天的会，我说，“挖根源”时有没有必要把家庭根源讲得这么细？梁先生说，他的检查是认真的，“挖根源”就必然要涉及大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会涉及一些事。为了安慰他，我告诉他，我也犯过错误，“鸣放反右”时因为右倾，也被处分过，撤去我团支部书记的职务。谈到“鸣放反右”，他很快接过话题谈到1957年他也差一点“卷进去”，是市委领导及时警告了他，知道即将“反右”，所以在“鸣放”时就非常谨慎。

回忆当时，每天晚饭后，明斋东入口

设有鸣放论坛，许多教授和学生都参加，人很多，距离我住的新斋很近。一天晚上跑过去看，梁先生正在台上发言，我就挤进去听，只听到他讲自己拥护党的领导，

“我就是但丁派，我就是歌德派。”所以我趁机问他，当年怎么想到要去参加这个鸣放论坛？为什么自称是但丁、歌德？他说，自从得到预警后，他开始替那些年轻人担心，于是决心去论坛拉拉“警报”。

以前我和梁师很少谈政治，这次坦率交流，使我们师生感情更加密切。有一次他感慨地跟我说：“人这一生不可能都顺，总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人要遭过罪才懂得珍惜，倒下去也就完了。”他又说：“人有两只耳朵和两只眼睛，但只有一张嘴，意味着做人要多看、多听、多想、少讲。”这大概是他要与我分享的一生的感悟和教训吧。梁先生这些话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党和政府对梁先生一直是非常关心和保护的，他自己也知道，也非常感恩。无论那次批判，他都会认真检讨自己，尽管有时会“过头”，但基本上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他始终是这个态度。细想起来，当年我自己受批判时，心态也一样，狠批自己以求过关。

## 永别

清华进修即将结束，系里曾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留在清华。开始我犹豫，因为进修的目的是为了回去开课，留下有点说不过去，况且新学校才有发展的机会。当我把这些考虑告诉梁先生时，他表示支持我回到内蒙古，说：“呼和浩特离北京不远，有机会去看你。”梁先生在我临走之前向我交代了一个课题，说呼和浩特

和北京之间有个山西大同，一度是北魏首都，要我安排时间去云岗石窟研究一下希腊、印度、波斯等外来文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影响。

“文革”前期，我一直关注梁先生的情况，得知他被批斗甚至戴高帽、游街……想到他那瘦小的身躯，身上的铁马甲，怎能经得起这种折磨？我心中十分焦虑和不安，后来知道他遭难的时候，多亏林洙老师一旁照顾，为此我对林洙老师是充满感激的。

1972年1月9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知道恩师谢世已是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悲痛难忍，写下了以下小诗以兹纪念：

鸿著传万代，泪血诉千声。  
引我青春路，今日恸恩师。

## 七绝·怀念虹进同学

○柏占山（1972级建工）

数载冰天又饮风，  
只为京藏两相通。  
而今雪域驰专列，  
微笑留存遗照中。

许虹进，1952年4月出生，建工系房2班学生，1975年12月毕业后自愿参加青藏线建设，1979年回京在铁道部工作，1983年至1986年赴日本进修，1993年至1998年在外企工作。之后创立欧风博雅工作室从事设计工作。2019年4月7日因病去世。

# 怀念可尊敬的老领导刘达同志

○王凤生（1964届水利）

今天，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100岁生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庆典。我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写一点文字，纪念它的光荣的一员，曾经的我的可尊敬的老领导刘达同志。

我和刘达同志的接触并不多，他一生对于国家、人民所作的诸多贡献，许多都不是我曾经与他共同经历的，甚至是我所不了解的。我与他的接触，已是在他近70高龄以后了，但即使在他有限的接触中，就已经使我感受到了他的坦荡的心胸，实事求是的品格和朴实无华、永远居于群众之中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形象。陈云同志“书赠”他鲁迅的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既是

很高的也是恰如其分的对于他的评价。

刘达同志是1977年4月底来清华的，那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清华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是“重灾区”。他是受党中央之命来接管这个满目疮痍的乱摊子的。可以想见他当时面临的困难之大。

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路线盛行的当时，他要“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造成的，甚至包括涉及“文革”前清华的许多冤假错案，有的还是毛主席过问过的，谈何容易！

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一伙在清华策划了“反右倾复辟回潮”运动，把何东昌、艾知生等同志打成在教育界搞右倾复辟回潮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后来被称为“三个月运动”。刘达同志1977年4月29日进校次日，即找何东昌同志谈话，此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于5月12日，在主楼前广场召开的全校大会上，他宣布，1973年“四人帮”撤销何东昌同志的党委副书记职务“是不合法的”，即日恢复工作，从而为何东昌同志平了反。接着，又于1978年11月，为刘冰同志平反。“文革”后期，刘冰同志同



1984年2月，学校党委常委欢送林克同志去复旦大学任职。左起，第一排：韩凯、张光斗、何东昌、刘达、林克、艾知生、汪家镠，第二排：解沛基、何介人、张维、高景德、张绪潭、滕藤、李传信，第三排：饶慰慈、黄圣伦、吕森、张思敬、张慕萍、方惠坚、王凤生

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上书毛主席，状告迟群、谢静宜，反映他们的问题，后被毛主席批示为“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刘冰等同志因此受到批斗，“被专了政”。在那个年代，按照“两个凡是”的逻辑，对于毛主席批示了的事情，只能“坚决拥护”和努力“遵循”。但刘达同志本着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主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求得支持，最终将这个大的错案给翻了过来。1978年11月下旬，清华党委在大礼堂为刘冰同志召开平反大会。刘达同志宣读平反决定并讲话说：“刘冰等同志写信告迟群、谢静宜，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揭发的问题完全属实。说他们是诬告，不能成立，应予否定。强加给刘冰等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撤销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职务应予恢复。”此外，他还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要求依法惩处聂元梓、蒯大富等那些“四人帮”的小头目，使他们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刘达同志，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得失，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伟大品格。

1991年4月，为庆祝清华建校80周年，刘达同志以“清华大学名誉校长”的身份，著文《我与清华》，登载在《清华校友通讯》复23期上。文中写道：“由于‘文革’期间违背教育规律办学，清华的规模、布局及学科设置不尽合理，影响了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1978年我向邓小平同志做工作汇报时就反映了这些问题，并提出要从清华实际出发，对各方面进行调整。小平同志听后着重指出：‘办学要按

学校工作规律办事’。为此，在校党委领导下，学校开始了各方面的整顿工作。首先是调整学校的规模和布局，先后将绵阳分校、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团河农场、西山林场撤销，部分人员撤回本部。”

何东昌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情时写道：“刘达同志察觉这个问题以后，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并当即根据小平同志关于‘办学校要按教育规律办事’的精神，撤销了三门峡这个办学点，使分散的水利系能够集中起来，恢复元气，并根据钱宁教授的愿望，学校首先支持了泥沙实验室的建设。”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来谈谈撤销“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前前后后的若干具体情况，以及一些我所了解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刘达同志“拨乱反正”的决心和他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

1968年7月27日，工农宣队进驻清华后，搞开门办学。水利系结合专业，于1969年夏秋季开始，在河南三门峡建立办学基地，开门办学和参与治理黄河。至1969年8月16日，基地已有100多位教职工，除了水利系人员外，其中还有少量基础课教师。

197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长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将清华的经验概括为：“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

我于1972年10月由校务组回到水利系，根据系里安排，我于次年3月27日便去了三门峡基地。我在基地先后5年，前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参与《葛洲坝水

## □ 怀念师友

利枢纽迴水变动区模型试验》的科研课题项目，担任“河工模型实验班”的教学任务和班主任工作。1977年至1978年，作为“基地”负责人，与全体师生员工一起，完成了“基地”撤回北京的任务，1978年7月，回到北京。“水利系三门峡基地”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中国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三门峡基地”同全国一样，开始了新的篇章。刘达同志1977年4月29日进校，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开始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审查迟群、谢静宜贯彻“四人帮”错误路线在清华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并逐一平反。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为了深入揭批“四人帮”，三门峡基地于1977年6月中旬，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组长：艾知生，副组长：王福义（工宣队员）、王凤生。艾知生同志在1973年的所谓“三个月运动”中，同何东昌同志一起受到批判，被“贬”到水利系教务科工作，1975年8月4日由水利系派到三门峡基地，当一名普通教师，教数学课，同其他教工一起住在一间大教室改成的集体宿舍内。

在刘达同志进清华仅两个月后的1977年6月27日，根据学校的安排，我和谢万波（北京旧市委派来的联络员）二人去北京向学校党委汇报三门峡基地的工作。7月4日上午，工字厅后厅的会议室里，坐了满满的一屋子人，只是听说这里边有校领导刘达、黄光、林克、田夫、来汉宣等同志，他们来听我们的汇报。除了水利系列席会议的几位是我熟悉的以外，其余全都是生面孔，不清楚谁是谁，刘达同志也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由我作汇报，汇报

中，有一位老同志常常插话，问问题，我想这位一定是刘达同志吧，其实不是，后来才知道那是田夫。那一次汇报会，刘达同志没有坐在一把手该坐的中间的位置，而是坐在北边靠西北角的一个位子上，自始至终很少提出问题要我回答，只是在那里认真地作记录。这就是我第一次同刘达同志面对面接触的情况。

1977年下半年和1978年，我们“领导小组”的主要精力便放在了落实校党委关于基地撤回北京这件事情上。关于三门峡基地的去留问题，我是赞成撤回北京的，在1977年3月我就向当时的系领导表达了我的意见。

1977年9月27日至10月20日，艾知生回北京总校。在北京期间他先后给我写了三封信，都谈到了基地去留的问题，这些信我至今都还保留着。在10月3日的信中，他写道：“关于基地问题我已找过何东昌，他说在刘达同志主持、老谢（万波）也在座的会议上，方针已经确定了。关于实行的步骤我已对他面谈，他也同意了（就是我多次对你讲的）。他要我们尽快写报告。我打算一见到老谢就商议，在京或回到基地写报告。知生 10.3”“今晚我又去找了何东昌同志，把你的信给他看了。知生又及 10.3晚”

10月9日信：“基地去向，听老谢讲，在刘达同志，还有田夫、何东昌参加的小会上，老谢汇报，决定了撤的方针。我找何东昌谈了几次，谈了我关于三步走，以及人员安排问题的原则意见，他都同意，要我们快写报告，老谢意见回到基地后，了解一些情况就写报告。”

根据学校党委的意见，艾知生同志从北京回到基地，我们就着手起草关于基地

撤回北京的报告。由我主笔，最终写成了《关于结束三门峡基地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

根据党委的要求，艾知生同志11月12日再次去北京总校，直到12月17日回到基地。

在他12月8日给我的信中说：“关于结束基地问题，上次张健同志（校党委领导成员，分管水利系）主持和系领导共同研究一次后，确定要给北京市委和河南省委写报告，要我代党委起草，本周我已将给北京市委的报告（讨论稿）并附件《申请迁京教职工及家属登记表》（21户，61人）交张健同志。目前正在党委领导同志中传阅，市人代会刚结束，刘达、老何刚回来，修改上报还要有一个过程。在此同时，学校正在准备房屋调整，我们已将房屋需要（家属及来京工作单身教工、学员）报校、系（看来户口问题可能会拖一个时期，也有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教工先来京工作，同时解决户口问题，三门峡部分人留守）。”信中还谈了关于下一步基地领导班子的有关问题。

关于撤基地还有一段重要的信息转录如下。在由我负责代系党委起草1978年1月25日写给《清华大学党委并请转报水电

部党组》的报告中写道：“校党委曾于11月29日报送教育部党组，并报邓副主席、方毅同志，在《关于清华大学今明两年招生的报告》（编号【77】清字第214号）中提出逐步撤回三门峡办学点的意见，已经华主席和几位副主席圈阅同意。”（文件批号“中办秘书处3129号，邓处993号，叶处3605号，教育部批示122号”）这说明撤基地这件事已经校党委上报至党中央，并得到最高领导的支持。

艾知生同志在1977年12月17日回到基地时，带回了学校党委的决定：

#### 编号 【77】清发第26号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决定）  
水利系党的领导小组、水利系三门峡基地运动领导小组：

经党委讨论决定：

1. 三门峡基地运动和各项工作由水利系党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2. 由基地运动领导小组代行原基地党总支职权；
3. 艾知生同志调回学校由王凤生同志任基地运动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

1977年12月28日下午4点，我和谢万波去三门峡火车站送艾知生同志，他回清华校本部，去受任新职，任清华“试化厂”（即200号，后来的核能所）党委书记。从此结束了他三门峡基地的工作。他为三门峡基地撤回北京作出了重要贡献。谢万波联络员于1978年1月20日返回北京，结束了他作为联络员在基地的工作。

自那以后，我和基地领导小组的同志



1988年5月，刘达同志（左）与王凤生谈话

## □ 怀念师友

便担负起了落实校党委关于撤回三门峡基地决定的组织实施工作。直到1978年7月3日，全部完成撤离基地的任务，我离峡返京，结束了我的200余天的三门峡基地

“末代皇帝”的生涯，三门峡基地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撤销“基地”是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涉及人财物方方面面，涉及和清华校本部以及与三门峡地方上的关系，涉及与北京市、河南省的关系等。从1969年建立到1978年撤回，基地远离总校，独立运行了十年。基地使用的校舍是水电部11工程局（三门峡工程局）技校的校舍。由于教学、科研以及师生员工生活的需要，十年间又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建筑面积4531平方米（包括自建农场的建筑），还有从总校运来和在当地购置的许多器材、设备等资产。人员往来频繁，除了由北京总校去的教职工外，一些原两地分居的家属也调进了基地，还从当地招收了一批后勤人员。到撤离基地时，基地尚有教职工90人。

这其中物资问题的解决相对简单，校舍移交给三门峡工程局，一批物资适合作价移交给基地所处的原单位技校。自建农场移交给三门峡市，由市委农办、农业局接管。在全基地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从4月3日至7月1日，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将八个车皮的物资运回北京总校。

人员的安置是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基地有三个年级的共157名学生，需依据不同的教学进展情况做出不同的安排，有的回总校，有的不回北京，就地毕业。有的学生对于不让进京有意见，有的教工还表示支持，对此需要做教师学生的思想工作。

教工的情况更为复杂，90名教职工分

四种情况：1.家在北京，本人户口在京；2.家在三门峡市或附近地区；3.本人户口在京，家在外地，长期两地分居；4.一方户口在京，另一方户口在三门峡市的。

这里除了个别的因特殊原因，虽是本校教工，也不想回京而到其他省份、地区工作，需要个别做特殊处理的外，更难处理的是有21户61人进京户口的问题，以及在当地或附近地区招收的17名临时工的处理问题。解决进京户口的问题，如果没有刘达同志和校党委积极争取北京市委乃至党中央的大力支持，是很难办成功的。1978年2月我回北京总校，16日上午刘达和张健同志亲自听取我关于三门峡基地工作的汇报，刘达同志当时就打电话给北京市委督促解决三门峡回京教职工进京户口问题。最后做到了21户61人无一漏掉地全部进京，落北京户口。

就近安置人员的工作，在总校的支持下，我几次去郑州省委、洛阳地委，争取最理想的结果。就近安置的17人提出种种要求，有的也要求去北京。对于这些，除了做必要的思想工作，耐心说服之外，在具体安置方面，也做到了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最后做到，每个人自己提出想去的单位，河南省委发“红头文件”，附上每个人所去的具体单位，由三门峡市具体落实。就近安置人员的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将“水利系三门峡基地”撤回北京这个决策，在以刘达同志为首的清华校党委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就这样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落实。

刘达同志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始终保持“老八路”的亲民作风，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心里总是想着群众。1988年的夏

天，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俩在谈论工作之余，他主动和我谈到他做的一件事。每年3月，中央都要召开“两会”，届时代表们分住在北京各大饭店，开全体会的那一天，所有代表要从各个饭店乘着各种车辆前往人大会堂，于是便实行交通管制。群众车辆为了给代表的车队让路，常常要在路口等很长时间。刘达同志，作为代表之一也在这个长长的车队中间，他觉得这样很不合适，就临时给胡启立同志递了个条子，说这样做不合适，不该让过路群众那样长时间地等我们。在路口，应该代表的车队过一段停一下，让群众过，代表的车再行，就这样彼此相互照顾一下。胡启立同志采纳了他的意见。从这样一件具体的事情上即可看出，刘达同志心里总是装着群众，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本色。

我的一位在台湾的舅舅，解放前在北平读书，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他跑去了台湾。多年失去联系。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他通过一位日本朋友联系上了我。并于1988年5月1日来大陆探寻亲人，第一站就来到北京我这里，住了一段后便回阔别40余年的东北老家探亲访友，6月11日从东北返回北京。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刘达同志提出要请他吃饭，11日上午，刘达同志便找我商量此事，并派他的车送我去机场接我的舅舅。次日，12日下午，我陪刘达同志去郭沫若故居，参加郭沫若铜像揭幕仪式，参观郭沫若故居展览。参观结束后，刘达同志便同我一起顺路将住在城里的舅舅接回清华，并在甲所宴请他。饭桌上，舅舅说：“老学长（解放前二位都在北平读大学，刘达在辅仁大学，舅舅在北大），我可不可以提一个问题？”刘：

“可以呀，你说吧。”舅舅咬文嚼字地说：“共产党怎么可以‘走后门’！”是他此次去东北老家听到了一些有关“走后门”的事情，对此颇有看法。刘达同志说：“你批评得很对，共产党是不应该走后门的。我们反对走后门。”

舅舅在台湾不是什么重要的、“高级”的人物，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的中学教师，为什么刘达同志这样热情地招待他？我想，他是出于对从台湾来的人做工作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这件事情的。由此可见刘达同志虽处高位，在小事上也能站在党的方针政策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处理事情。其工作的细致、考虑问题的周到令人钦佩。

1990年夏天，舅舅再一次由台湾来北京时，我陪他于6月11日专门去住在中央党校的刘达同志的家里拜访了他。

1991年我工作调动，去北京电影学院任党委书记。我仍然常常想起刘达同志给予我的教诲，怀念他对于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他没有到过电影学院，很想请他来看看。于是在我去了两年多以后的1993年5月，邀请他去北京电影学院，他欣然同意。5月27日，在清华党委办公室凌桂凤、关慧敏等同志的陪同下，刘达同志来到电影学院。那一次我没有把他作为大领导来接待他，什么汇报、视察、作指示之类的，通通免掉。而是请他完全以平民、长者、前辈的身份，走马观花地看看这所艺术院校。在我向他简要地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后，陪他去几个系、专业教室看了看，中午在学校食堂用了便餐后，他很愉快地离开电影学院返回清华。

刘达同志离开我们已27年有余，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这位可尊敬的老领导！

2021年7月13日

# 许渊冲：一生“诗舟”播美，百岁仍是少年

○史竞男

2021年6月17日，中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100岁。

许渊冲，1921年4月18日出生，江西南昌人。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48年赴法国留学，195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1952年调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任教，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

许渊冲先生从事文学翻译长达80余年，成就卓著，译著跨越中、英、法等语种，在中国古诗英译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并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现转载新华社记者2021年4月撰文，以表达我们对许学长的深切缅怀。

北大畅春园，每至深夜，总有一盏灯亮起。

那盏灯，属于翻译家许渊冲。

它陪伴着他，在一个又一个黑夜，徜徉于唐诗宋词和莎士比亚的世界；它更陪伴着他，以笔为桨撑起生命之舟涉渡时光之海……

2021年4月18日，许渊冲先生迎来了自己的100岁生日。

也许有人不了解他，也许有人因热门综艺《朗读者》知道了他。

他是谁？

生于军阀混战的乱世，炮火中求学于



许渊冲先生

西南联大，27岁留法，30岁归国；钱钟书的得意门生、杨振宁的同窗挚友、俞敏洪的授业恩师；首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的亚洲翻译家……这一堆“标签”都不如他在名片上印的简单直接：

“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北京大学 许渊冲

有人婉言相劝：这会不会显得“不谦虚”？

他理直气壮地回应：“这是实事求是！我的名字比名片还响！”

是的，他有十足的底气——

因为他，中国读者认识了于连、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罗密欧与朱丽叶……

因为他，西方世界知晓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汤显祖……

才华迥出天真，一生狂傲潇洒。

在许渊冲先生百岁之际，我们来到他家中，走近大师，也走近一段百年传奇。

## 择一事

爬上三楼，打开门，迎面是昏暗狭窄仅够容纳一张餐桌的门厅，两侧分别是专门用来打字的电脑间，以及堆满书籍和文稿的书房兼卧室。

水泥地、泛黄的墙壁、陈旧的家具。这间70平方米的公寓，他住了近40年。

书房靠窗的角落，有张不大的书桌。上面挂着一幅隶书——“译古今诗词，翻世界名著，创三美理论，饮彤霞晓露”，正是他一生写照。

见我们来了，许渊冲先生忙从打字间走出，招呼保姆帮他换上一件细格子西服。“哎呀，我没有穿衬衫要不要紧？”得到不必更衣的答复后，他还是坚持拿起挂在床头的一条灰咖色格子围巾，遮住西装里的家居服。

细腻敏感、追求完美，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一代翻译大家。

待一切收拾妥当，他坐进厚实的米色单人皮沙发，那是家里唯一上点儿档次的家具。仔细看，扶手处皮子已破裂，斑驳中露出海绵。

采访尚未开始，旧日气息已扑面而来。

此刻窗外，却是一派早春的明媚。他眯起眼睛，细数往事……

这位能够在古典与现代文学中纵横驰骋，在中、英、法文的世界里自由穿越的大师，并非天生。许渊冲说，他年少时是讨厌英文的，连字母都说不清楚，把w念成“打泼了油”，把x念成“吓得要死”，把sons（儿子）注音为“孙子”……“做梦也没想到后来会有兴趣，到了高中一年级，甚至英文有不及格的危险。”

谁知到了高二，他背熟30篇英文短文，忽然开了窍，成绩一下子跃居全班第二。彼时，他的表叔、著名翻译家熊式一用英文写的剧本《王宝钏》和《西厢记》在欧美上演引起轰动，得到著名剧作家萧伯纳的高度评价，名声大噪，更被少年许渊冲视为偶像。

各种机缘巧合，冥冥中为成长之路伏下草蛇灰线。

1938年，17岁的许渊冲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从赣江的清水走向昆明的白云”。次年1月，他满怀憧憬与喜悦进入联大校园，学号——“A203”。

“一年级我跟杨振宁英文课同班，教我们英文的叶公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他是钱钟书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还有吴宓，当时都很厉害。”

在这里，他与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同窗，听冯友兰、金岳霖讲哲学，朱自清、朱光潜讲散文，沈从文讲小说，闻一多讲诗词，曹禺讲戏剧，叶公超、钱钟书讲英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

在这里，他遇到莎士比亚、歌德、司汤达、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是把我领进世界文学的大门了。”

他的翻译“处女作”诞生于大一。那时，在钱钟书的英文课上，他喜欢上一位女同学，为表达心意，便翻译了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小诗《别丢掉》：

“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

送出去却“石沉大海”。直到50年后，他获得翻译大奖，引起当年那位女同学关注，致信给他又忆起往事。



报考西南联大时的许渊冲

“你看，失败也有失败的美。人生最大乐趣，就是创造美、发现美。”他翻译每一句话，都追求比别人好，甚至比原文更好。“这个乐趣很大！这个乐趣是别人夺不走的，是自己的。”

浪漫情怀为他打开翻译世界的大门，而真正走上翻译之路的决定性时刻，出现于他在联大的第三年。

1941年，美国派出“飞虎队”援助中国对日作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许渊冲和三十几个同学一起报了名。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75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当有人提到“三民主义”时，翻译一时卡住，不知所措。有人译成“Nationality, people's sovereignty, people's livelihood”，外宾听得莫名其妙。这时，许渊冲举起手，脱口而出：“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简明又巧妙，外宾纷纷点头微笑。

小试锋芒后，他被分配到机要秘书室，负责将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陈纳德大队长。出色的表现，让他得到一枚镀金的“飞虎章”，也获得梅贻琦校长的表扬。

在当年的日记中，年仅20岁的许渊冲写下：“大约翻译真是我的优势，我应该做创造美的工作了。”

自此，择一事，终一生。

许渊冲说，西南联大对他最大的影响是为人生镌刻下一种信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不到绝顶，永远不停’！”

### 专一业

“‘To be or not to be’，你们说说怎么翻？”

一上来，他就考了我们一道难题。

“生存还是毁灭……”我下意识喃喃自语道，毕竟朱生豪的这句译文已成经典。

“错！大大的错了！生存还是毁灭是国家民族的事情，哈姆雷特当时想的是他自己的处境，是他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他一下子激动起来，一双大手在空中挥舞。

……

在翻译界，许渊冲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也争议不少。

他绰号“许大炮”，不仅人长得高大、嗓门大，也好辩论、爱“开炮”。

于学术，他是“少数派”。他坚持文学翻译是“三美”“三之”的艺术，要追求“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他总想通过“再创作”来“胜过原作”，更将追求美、创造美视为毕生目标。

而认为翻译应忠实于原文的人，指责许渊冲的译文与原文的意思不符，“已经不像是翻译，而是创作了”。

对此，他毫不避讳，甚至将自己的译文比作“不忠实的美人”。

译无定本，但理念不同，还是带来了矛盾。

在翻译法国诗人瓦雷里描写灵感的诗《风灵》时，翻译家王佐良译为“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许渊冲译成“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别人批评他的翻译是“鸳鸯蝴蝶派”，他却说自己翻的更有韵味，把坚持直译的叫作“外科派”……

他的最新译作是亨利·詹姆斯的《The Portrait of a Lady》。前人译为《一位女士的画像》，他译成《伊人倩影》。

“‘一位女士的画像’，说实话看到这个题目就不想看书了，有什么看头？中国的文化深啊！‘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伊人两个字很妙的。你看，说一个人美丽的影子，倩影比画像好多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的译文比原文更美。”

《红与黑》引发的翻译界大论战更是轰动一时。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赵瑞蕻是第一位译者。同一句法文，赵瑞蕻译成“我喜欢树荫”，许渊冲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赵瑞蕻译成“她死了”，许渊冲译成“魂归离恨天”。

风格之迥异一目了然。许渊冲觉得这是实境与真境的区别，“喜欢树荫”是实境，但这种喜好源于“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才是真境。“她死了”也是“实境”，可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含恨而死。

“还找得到比‘魂归离恨天’更好的译文吗？”

有译坛权威把“提倡乱译，千古罪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等帽子扣在了许渊冲头上。他从不服输，始终认为自己译的最好。多年后他的《追忆逝水年华》出版，还不忘寄给赵瑞蕻一本，扉页写着“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

他的一生，有无数次笔墨相伐，但欣赏他、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数。

采访中谈及此事，他突然一跃而起，快步迈向对面的书架——从那个花15块钱买的旧书架上，迅速而准确地找到一本书，又迅速而准确地翻出其中一页——那是一篇赞美他翻译艺术的文章，题目是《美化之翻译》。

那一瞬间，面前仿佛不是一位百岁老人，而是当年在西南联大每次考试总争第一的少年。

钱钟书对他颇多赏识，常以书信展开探讨，在信中提到两种方法：一种是无色玻璃翻译法，一种是有色玻璃翻译法。前者会得罪诗，后者会得罪译。两难相权择其轻，钱钟书宁愿得罪诗。

而许渊冲认为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打破的。”

千古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第一句中“落萧萧”三个字都是“草”头，第二句“江滚滚”都是“水”旁。音形对仗产生视觉和情感上的冲击，被视为“英文无法翻译的诗句”。

许渊冲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草”头用sh头韵(sheds, shower)，“水”旁则用r头韵(river, rolls)；用“shower by shower”（“萧萧下”）呼应“hour after hour”（“滚滚来”）的译法堪称绝妙，有的美国读者甚至把译文当成了英美诗人的作品。

又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

## □ 怀念师友

雪。他译成：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

from hill to hill（千山）对 from path to path（万径），no bird in flight（鸟飞绝）对 no man in sight（人踪灭）。对仗工整，音韵皆美。

业内将他的翻译称为“韵体译诗”，情味悠长，境界全出，尽显中国古典诗词的风骨流韵。

老师钱钟书称赞他：“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

好友杨振宁评价他：“把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植在翻译中。”

他说：“在不歪曲作者意思的情况下，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精髓、灵魂体现出来。”“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也许，这就是他执着于意译的理由——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之美。

为此，他先后出版了180多本中英法文翻译著作，将中国的唐诗宋词以及《诗经》《楚辞》《论语》《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等翻译成英文、法文，将西方名著如《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托夫》《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译成中文。

他的中译英作品《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译作《西厢记》被英国出版界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

家里占据两面墙的书架上，他自己的书几乎都要放不下了，逐渐占领了墙角、

沙发、地板……一同前往的中译出版社编辑，带去他刚出版的新书——《西南联大求学日记》《画说经典》《古诗里的核心词》以及“许渊冲英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系列”21种等，摆了满满一桌。

他逐一拿起端详，面对这份“生日大礼”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很难想象，这位笑容灿烂、话语铿锵的老人，在2007年就查出直肠癌，医生保守估计他还能再活7年。

而7年后的2014年，他不但没有走向生命的终点，反而拿下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该奖项自1990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我们所处的国际化环境需要富有成效的交流，许渊冲教授一直致力于为使用汉语、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国际译联在颁奖词中如是说。

“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确为“实事求是”。他不仅印在名片上，更嘱咐家人：以后，墓碑上就刻这两句。

### 遇一人

许先生家里除了书，摆放最多的是与夫人照君的合影。夫人2018年去世，我们只能从照片中一睹伉俪情深。

虽然会写诗、更会译情诗，但如同那封“石沉大海”的信，许渊冲的感情生活一直波澜不惊。他追求过好几位心仪的女同学，“都落空了”。“联大男同学远远多于女同学，男女比例是10：1，即使女同学全嫁男同学，也有9个男同学找不到对象。”他这样安慰自己。

直到1959年除夕，已经38岁的许渊冲

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的舞会上遇见了年轻美丽的照君，一见钟情，携手走进婚姻，相濡以沫60年。

她不仅是妻子，也是许先生的生活助理、学术秘书，更是他的忠实粉丝——一路追随，永远崇拜。

这种爱，被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用镜头捕捉下来——

“老伴儿，咱们什么时候开饭合适？”

“打完（字）就开饭。”

“打完大约还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5点钟吧！还有一个钟头。”

他坐在电脑前，头也不抬。她在一旁轻声耳语，搓着双手。

画面一转，时钟滴答作响，已经快7点了。

那年，她85岁。这样的等待与陪伴，早已是家常便饭。

他们一起走过风风雨雨。“文革”中他挨批斗，屁股被鞭子抽成“紫茄子”，她找来救生圈，吹起来给他当座椅；他骨折入院，嚷嚷“我要出院！我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她含泪劝慰，“你呀不要动，不要孩子气，一切听医生的”；他上电视一夜走红，来访者蜂拥而至，她替他挡在门外……

在她心里，比她大12岁的许渊冲永远像个两岁的孩子，她爱他的纯真，爱他“灵魂里不沾染别的东西”。他坦荡如砥、心直口快，从不在人情世故上费心思，她在背后默默打理着一切，让他安心沉浸于美的世界。

别人写文章攻击他，她第一个跳出来愤愤不平：“这种人不能理，没有格”；别人夸他，她会跟着一起：“是啊他太不简单了！他真是一个奇迹！”



许渊冲、照君夫妇

她是最懂他的人，常说：“许先生很爱美，唯美主义，他一生都在追求美。”从工作到生活，从外表到灵魂，无不如此。

他有多爱美呢？接受记者采访，一定要穿上那件细格子西装搭粗格子围巾，浅棕加深灰，几乎成了“标配”。出门，风衣、皮靴、帽子、墨镜，一样都不能少。别人夸他100岁了还是很帅，他哈哈大笑：“还可以吧！”

晚饭后，他总要骑着自行车去外面吹吹风，看看月亮。纪录片里用镜头跟踪着他骑车的背影，如果不是稍有些佝偻，仍如追风少年。

直到那一夜，他骑车驶向一条新修的路，摔倒了。“倒了霉了，月亮下看见很亮的路，看不到坡啊！月光如水，从某个意义上讲还摔得蛮美的……”

那晚是中秋夜，月色正美。

“为什么喜欢看月亮？”“嘿，月亮美呀！人生就是追求美呀！不会看月亮怎么翻《静夜思》？所以别人都翻不好，我翻得好啊！”

## □ 怀念师友

遗憾的是，纪录片上映时，夫人于两个月前刚刚去世。

观众席上，有人发现了许渊冲先生，掌声雷动。

“今天许先生本人也来了，他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再多看一眼奶奶。”导演在放映结束后的一席话，让很多观众潸然泪下。

夫人离开的第二天，学生们到他家中探望。他们担心已经97岁的老先生撑不住。结果惊讶地看到，许渊冲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电脑前，他正翻译英国作家、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的全集。

他说自己几乎彻夜未眠，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想了很久很久，然后翻开了王尔德的书。“不用担心我，只要我继续沉浸在翻译世界里，就垮不下来。”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般走过一个世纪，他的秘诀就是如此简单——心无旁骛。“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啊？因为我每天都在创造美。我的翻译是在为世界创造美。”

他最爱的月亮，早已融入他的生活、生命，成为一种人生意象——

1938年11月4日，刚刚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在日记中兴奋地写下：

“今夜月很亮，喝了两杯酒，带着三分醉，走到草场上，看着半圆月，忆起往事，更是心醉神迷。”

百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至期颐。天边还是那轮明月，清辉之下，他将光阴幻化成诗，留下永恒之美……

### 译一生

采访当天，许渊冲先生照例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他的生活非常规律：早上8点多起床，上午会客或看书，下午将夜晚的翻译成果敲进电脑，而深夜则将他带进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对我而言没有日夜。每天和每天的区别只有一个，有没有翻译。”他常将英国诗人托马斯·摩尔的诗句挂在嘴边，*The best of all ways to lengthen our days is to steal some hours from the night*——“延长生命最好的办法，是从夜里偷几个钟点。”

他深感时间的紧迫，因为想要做的事情太多，想要实现的心愿很大……

40年前，他在将要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翻译的艺术》前言中写下：“我想，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中国文化中来，同时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

让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是他毕生心愿。

骨折住院，一动不能动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管子，他还念叨着：“中国文化啊，要走向世界……现在我们的科技、商业都在走向世界，所缺的就是这一项，我要填补的就是这一项。”

《我的时代和我》放映结束后，他面对观众坦陈心迹：“这个影片不只是看了我个人，其实是看了我们中国的一个象征。看到了过去，看到了现在，还看到了我们未来将要走的路。我们中国走向世界，更要在文化方面走向世界。我们中华子孙，不能妄自菲薄，希望大家再往前走，使我们中国梦得到世界认可。”

在让他一炮而红的综艺节目《朗读者》上，他信誓旦旦说出一个“小目

标”：百岁之前译完《莎士比亚全集》。

“您翻译完了吗？”面对我们的好奇，他不屑地摆摆手：“不翻了，经典的都翻过了，剩下的都没意思，我不喜欢。莎士比亚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好。”

突然，他话锋一转，直起了身子：“我在做更重要的事，写一部自传《百年梦》。莎士比亚我不翻也有人翻，但这个书我不写就没人能写了。”紧接着又补充道：“我这一百年跟中国共产党是同一百年，这一百年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走过来的，如果我走了，就没人能写这个历史了。”

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透露了已经写好的第一章内容，那是回忆母亲的。他人生记忆的第一幕，是母亲离去的那刻——母亲卧在房门后的一张竹床上，父亲抱着年仅3岁的他，哭泣不止……

他的母亲是江西南昌唯一的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是中国第一代受到新式教育的女性。在遗物中，他发现了母亲画的花鸟、写的作文。母亲笔下的花木鸟兽给了他关于“美”最早的启蒙，“她的作文题目更是大得不得了——《论项羽与拿破仑》！这对中外历史都得有了解才写得出啊！”这些美、恢宏和由此带来的震撼，在他心中足足激荡了百年。

作文题目里的“拿破仑”（即拿破仑）又将他的思绪带回到翻译上，三句话不离本行。“拿破仑有一句名言‘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你们说怎么翻？”

我们面面相觑，答不出来。

Able “能够”，ere是古英语意为“之前”，Elba即厄尔巴岛，拿破仑被流放之地，Able倒过来正是Elba。

“你说妙不妙？这太有乐趣了！”当年在北大课堂上，他也拿这句考学生。有

人译“不到黄河心不死”，有人译“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哈哈大笑：“不到俄岛我不倒！”大家拍手叫绝。拿破仑的霸气和回文诗的妙趣，“一句两得”。

“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独一无二的，我们正在走向复兴，一定要知道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要有自己的文化脊梁。”

兴之所至，他哼唱起7岁时学会的一首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我们小学的校歌，直到现在我还会唱。共产主义就是世界大同，现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很好的，是一种进步。我写《百年梦》，不仅是记录下来我们这一代如何一路走来，对你们更有用处，要看清楚前行的方向……”

所以，已近一百岁的他，仍伏在那张小书桌前，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字。

在他新出版的《西南联大求学日记》封面上，印着“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你要使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记忆。”

采访结束时，许老家中的传真机上，收到一封手书——

渊冲兄，你今年整百岁，我也达到九十九岁。不容易啊！

如有庆百岁佳作，请示知。

弟振宁

百年如梦。他用澎湃的激情、美丽的文字驾起一叶扁舟，载我们穿越于东西方文明之海，采撷文学的奇珍异宝，从一花一叶中看到大千世界。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生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蝴蝶是庄生……我的人生观就是如此，把诗变成了人，人变成了诗。”

他挥洒着诗意，走过百岁人生。

# 郑哲敏口述：我的留学和回国经历

○熊卫民 采访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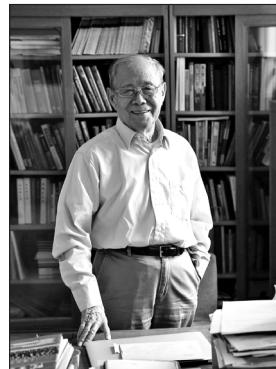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郑哲敏，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山东济南，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电机系，1947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留校做钱伟长先生的助教，1948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1952年在导师钱学森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2月归国，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随后参加钱学森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转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职，是中国爆炸力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现刊登科技史专家熊卫民教授2010年的采访，以表达我们对郑哲敏先生的深切缅怀。

## 初到美国

熊卫民：郑先生，我受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王作跃教授之托，想请您介绍您在美国留学和回中国工作、生活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有的选择回国，有的选择留



郑哲敏院士在办公室

在美国，王教授想对这两类人进行比较研究，委托我访问您。他自己则准备去访问目前还在美国的那些科学家，譬如您的师兄罗时钧。

郑哲敏：罗先生经历比我坎坷。他比我高一届，与庄逢甘是交大1946届的同班同学，他俩都比我早一年去美国留学。庄先生比我小5个月，刚于11月8日去世，上礼拜我还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我是1948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的，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兵荒马乱。我乘的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Meigs（美格斯）将军号。船一共走了25天，路线有些绕：先到香港、马尼拉、吕宋，然后经过关岛、中途岛。本来还要停檀香山，却正逢码头工人罢工，没办法装卸船只，所以径直开到了旧金山。

初到美国时挺陌生的，因为我是拿着

“扶轮社奖学金”出去的——扶轮社基本上是美国一个组织，在全世界都有分部，它设有奖学金——所以当地扶轮社派一个美国人来旧金山接我，把我放到旧金山一个不错的旅馆。住了几个晚上后，我买了火车票坐到小城市帕撒蒂娜（Pasadena）。它就在洛杉矶东北边，城市虽小，但有钱人很多，因为那里气候好，四季如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出“大王”的时代，很多人退休后就搬到洛杉矶附近，所以帕撒蒂娜住着很多“大王”，如铁路大王、木材大王等。这些人捐了很多钱给CIT（加州理工学院），对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当时坐的是夜车，第二天一早到洛杉矶，接我的是扶轮社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和一位刚从CIT拿到博士学位、到CIT航空系做博士后的中国人——冯元桢。冯先生现在很有名，是美国的三院院士，并被尊为“生物力学之父”，近些年接连获得各种奖项，譬如“美国国家科学奖”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先生，以后我们变成了交往甚多的朋友，出国访问时我常去看望他。冯元桢的基础很好，1937年考的中央大学航空系，1941年毕业，留校当研究生，导师是航空系教授流体力学的老师柏实义。冯先生可能还到国民党位于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过，研究航空，大概于1945年去美国，1948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刚开始几天，扶轮社把我安排在一个老先生家里——他是扶轮社的秘书，叫拉兹（Lutz），是位电器工程师。开学报到后，我就住在校园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第一年，我的室友是唐有祺，他在鲍林主持的化学系搞物质结构研究。住在隔

壁单间的是肖健，他当时在美国的名字是肖积健，学高能物理的，正跟着正电子的发现者安德森研究高能粒子。唐有祺与肖健本来就比较熟悉，我去了之后我们三个就常在一起。后来吴耀祖也来了，他与罗时钧、庄逢甘在交大是同班同学，1947年出国，1948年转到加州理工。罗时钧也是头一年不在CIT，第二年才转过来的。后来我又认识了罗沛霖。他与钱学森同代，比钱学森低一年级。我还认识了研究物理的李整武夫妇，以及研究生物的鲍文奎和沈善炯。因学校校舍有限，鲍文奎和沈善炯当时住在校外。那个时候，CIT没有女生，没有黑人，但有印度人和中国人。

### 梅贻琦没有动员我去台湾

**熊：**你们这些不同专业的中国同学，当时来往多吗？

**郑：**刚开始时，我们的来往并不多，没有什么公共聚会。1948年晚些时候或者1949年——就在罗沛霖去后不久——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然后大伙的聚会才多了起来。罗沛霖是留美中国科协在CIT小组的头，记得在钱学森从MIT回到CIT时，他曾组织我们去欢迎钱学森。

**熊：**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海峡两岸争夺留学人才的问题？

**郑：**我知道1949年离开大陆时，蒋介石确实采取了措施以争取人才去台湾——他不太成功，更多的人才留在了大陆。至于之后国民党政权是否也有争取海外留学生的政策，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能就个人的经历谈一谈。梅贻琦等人曾找过我几次。

我的大学一、二、三年级是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四年级时清华、

## □ 怀念师友

北大、南开复校，我被分到清华。毕业后，我留校做助教。作为学生和小助教，我和梅贻琦校长原本是联系不上的。他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后来争取“扶轮社奖学金”的事。在中国北方的西安、北京、天津以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多个城市都有扶轮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奖学金名额，要在全中国范围内甄选。

有一天，我和清华的二三十个年轻教师一道，参加了北京扶轮社的奖学金考试。主要是考英语，我记得有作文和口试，主考官是陈福田和Winter——后者是个诗人，一直单身，“文化大革命”时仍在北大，后来在中国去世。考完后，清华推荐了我。当时，北京的扶轮社委托清华、北大、燕大、辅仁等高校各推荐一名候选人，大概他们也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候选人的。后来，北京的扶轮社从北京各校的推荐人中选择了我。然后，他们又去西安、天津挑人。负责此事的是凌其峻。他是清华学校早期的毕业生，后来留美，回来后搞实业，做进出口贸易等。那些城市的人选也确定后，再在整个北方遴选。我被选中。再后来，我又与分别来自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那两名候选人竞争。最终，我被选上。

熊：全国才录取一人，您能被选上，真是不简单。

郑：确实不容易，以至于在“文革”时有人质疑我是否在这件事情上走了后门。但我确实不是靠关系。之所以能被选上，我想主要是由于机遇使然，且与我上中学时学英语的机会较好有关。在斟酌人选的过程中，梅贻琦为我写过推荐信，这是我与他打交道的开始。

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兵临城下的

北平南下。1949年底或1950年初，我记得是在我刚拿到CIT的硕士学位开始念博士研究生时，他突然来找我。没谈什么事情，只是告诉我他也来美国了，任职于“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负责美国给“清华”的基金，正在收集一些书籍，准备将来运回“清华”。

熊：没有鼓动您将来去台湾？

郑：没有。1953年左右，他第二次来找我，邀我去吃饭。当时正值他或他夫人生日，他的女儿、女婿也来了。席间谈到解放前夕，地下党来找过他，希望他留下，但他没留下，是最后一批从东单机场飞往南京的。他之所以走，是因为不认同共产主义思想。他向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但并没动员我去台湾。之后不久，我又接到原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我参加扶轮社考试时的主考官陈福田的一封信。陈福田是华侨，解放后就回了夏威夷。他在清华曾经颇有影响——那时清华园有三座小巧幽雅的庭院，分别称之为甲所、乙所和丙所，甲所是校长梅贻琦的住宅，乙所是哲学家冯友兰的住宅，丙所就是陈福田的住宅。他给我写了信，但我没回信。

熊：他们找您，是不是组织的意思？

郑：不是。只是私人交往性质，并不代表政府机构。他们也许有劝我不要回大陆的意思，可并没有明说。

### 参加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熊：共产党方面呢？

郑：那就是有组织的啦。留美中国科协实际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主要工作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大陆——刚开始时隐蔽一点，新中国成立后就明确地动员大

家回国。它与在英国的留学生组织也有联系。我通过它还收到过从英国寄来的小册子，对于如何回国，上面说得很详细。那时我哥哥在英国。我1948年出国，他1949年出国——当时英国有个工厂提供奖学金，他就去了那个工厂。后来，他给我写信说想去美国上学。可美国说中国由共产党当权了，不接受他。1950年底他就回国了。

**熊：**参加留美中国科协需要办什么手续？

**郑：**当时并不是所有留美的中国学生都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协。我参加了。参加时没什么手续，报个名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开会，商量我们能为祖国做点什么事情。冯元桢那时候正在做博士后，他说可以做几件事情：一是买点书寄回去，一是翻译点书寄回去，一是写点书寄回去。当时并没有人在会上明确表态要回国，但不久之后就有好几人回去了。1950年，庄逢甘、罗时钧、沈善炯、鲍文奎也陆续回国了。当时有三位前辈在CIT。一位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1946年他应邀到美国参观原子弹爆炸试验，然后到美国的一些实验室访问，后来去了CIT。他手里有一笔受中央研究院所托去买原子研究设备的钱。1950年，他和罗时钧、沈善炯一道回国，一起在日本被扣。一位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他于1948年赴美，属学术休假性质，临近解放时回国。他很有趣，经常和夫人一起作诗，然后念给我们听。还有一位叫余瑞璜，抗战时是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有名的教授，是应鲍林教授之邀到CIT做短期访问的。他回国参加了开国大典，后

来服从组织分配去吉林大学（最初叫东北人民大学）创办物理系，再后来被划成了“右派”。

到CIT之后的第二年，我搬到楼下，与罗沛霖一屋。罗沛霖每周末都去钱学森家。我总怀疑他有特殊任务，可至今他都不承认。罗沛霖说，钱学森的名字不适宜在我们留美中国科协CIT分会的花名册上出现，所以，那上面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欢迎会和CIT分会的成立会，钱学森一家都出席了，后来分会的活动他就没再参加过了。

当时冯元桢很积极地准备回国。他的朋友易家训，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把书



朱光亚等人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采自哈佛燕京学社收藏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8期，1950年3月18日出版）

## □ 怀念师友

都寄回来了。冯元桢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与夫人喻娴士在国内就认识，1950年时在美国的一个教堂里结婚。喻娴士的父亲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的首届学生，大学毕业后辅助校长张伯苓，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张伯苓后来从政，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要职，南开中学主要由喻传鉴管理。

**熊：**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当时哪些人比较有号召力？

**郑：**华罗庚是比较有号召力的。他是留美中国科协的负责人之一，在回国前跟大家写过公开信。葛庭燧也给钱学森写过信，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们当时与留美中国科协芝加哥总部的联系全靠罗沛霖。丁敬当时也是比较活跃的，他与我同岁，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得了老年痴呆。

### 为什么不在美国

**熊：**你们这些留学生，当时有没有选择去台湾的？

**郑：**在我们圈子里面，人们要么回大陆，要么留在西方，没听说谁要去台湾的。因为都怕蒋介石，他在知识分子中名声已经臭了。像我这种并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中间派，后期也认为国民政府贪污得太厉害，腐败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不可能靠蒋介石来清理，原来曾经对他抱有的希望全都放弃了。

1948年，国民政府派了一个叫于斌的天主教主教，把好几百位高中生——我们称之为童男童女——与我们同船送到美国去。

**熊：**几百个人？

**郑：**那条船上光中国人就有几百个。其中，有十几位年轻教师来自清华，他们

多数都是过了一年就回来了，譬如说王补宣、陶渝生。陶渝生是陶孟和的儿子，陶孟和后来当了中科院副院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

**熊：**陶孟和是“内控右派”，当时并未公布在“右派”名单之中。您在学成之后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呢？

**郑：**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历史书所记载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的教育，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我们从小就唱“打倒列强、除军阀……”之类的歌谣，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

我们能充分看到美国社会的优点。例如，美国的变化很快，汽车的款式刚推出不久，又会出新型的，衣服样式、料子更是日新月异；而国内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年过去还是老样子，而官方的腐败日甚一日。面对这些强烈的反差，我们对美国当然有好感。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也还是有所顾忌，对美国社会也还是有点看法。过去在国内时，我们认为国有的就是进步的。在美国看到铁路工业都是私人的，不太能接受；在美国吃的早点都是一盒一盒的，很方便，不过到处都如此，感觉垄断得厉害。更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例如华人不能入籍的政策，从19世纪后期开始，好像到20世纪40年代才解除。

**熊：**您刚才说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人待你们如何？

**郑：**我们一般都感觉美国人是很友好的。例如我的奖学金是美国人提供的；学习期间，我曾接受邀请在两个美国家庭居住，他们待我也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例



美回国前照片  
一九五五年郑哲敏离

外，有的美国人盛气凌人，有居高临下之感，好像中国人不如美国人似的。1950年，我还没毕业，冯元桢已经毕业，在MIT有项目。我对冯元桢说，我还有一年就拿到学位了，美国哪儿也没有去过，想出去转转。他就与他夫人和我共三人开车绕着美国，包括南方所谓的Deep South区转了一圈。在许多城市，包括华盛顿在内，都发现有饭店在门口贴着告示：我们不接待有色人种。首都也如此，南方更不用说了。在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城市中，上公交时黑人直接走到最后面，前面即使有空位黑人也不能坐。加州理工所在的帕撒蒂娜虽然小，也有黑人区。钱学森原来住的房子很好，出事以后，房东不愿意再租房给他。他只好另找住处。这种事情让人很不舒服。

除种族歧视氛围外，文化上的差异也让人不自在。毕业之后，长期在外单身旅居的我，常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很孤独，没人可以交流。总的说来，当时的社会气氛非常压抑，我们在美国过得并不愉快。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爆发，通信不便，我们对中国国内所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只是听说社会治安变得很好，通货膨胀等乌七八糟的

事情都没有了。与我父亲通信时，我还了解到，解放后，他没再摆钟表摊子，而是办了个钟厂，圆了年轻时想办点实业的梦想。这些都是好消息。事实上，那时我们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逃避。有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科协订阅的香港《大公报》和纽约的《华夏日报》，两者都是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华夏日报》经常开天窗，以示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

**郑：**在对中国留学生归国的事宜上，美国的态度是有变化的。1950年罗沛霖回国时，美国是鼓励留学生回中国的。朝鲜战争开始后，就不让回国了。1951年缓了一年，1952年他们就找我麻烦了。

**熊：**他们是怎么找您麻烦的？

**郑：**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成了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1950年下半年，我申请回国，没获批准。1951年，我又一次申请回国，仍没成功，不过也没把我怎么样，只是移民局曾经有人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有个穿制服的坐在门后的桌子边，问了我很多赤裸裸的政治问题，譬如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由苏联所控制，等等，大约有十个这样的问题。1952年上半年，来了一封信，让我某天去移民局办公室一趟。我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给扣了，还给我念东西，说我是非法居留——他们用这个“帽子”把我给扣了下来。同时被扣的还有两位CIT的同学。一位是冯元桢的夫人喻娴士，另一位是机械系一位姓陆的同学。

然后我就打官司。我说，既然你们

## □ 怀念师友

称我是非法居留，那我就自动离境。1952年7月，我接到他们的一封信，说同意我自动离境。可是4天后，他们又来了一封信，说：考虑到你回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我们虽然同意了你可以自动离境，但不允许你离境，也不允许你有任何离境企图。我就这样被扣了下来。我于1952年6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护照也被收掉了。CIT对我不错，以助教待遇收容我教了两年书，做了些研究工作。

**熊：**既不让居留，又不让离开，您的遭遇与两年前钱学森的遭遇类似。

**郑：**我估计，我的事可能与钱学森有关，1950年罗时钧他们在日本被扣押也可能有他的因素。CIT的留学人员中，最早回来的是肖健。1949年，他学业尚未完成，即找了个停靠天津港的货船回来了。罗沛霖是一年后走的。他很敏感，论文没做完，就买了船票准备回国。后来他没在洛杉矶上船，而是买了飞机票，赶到檀香山后再上船。要不是这样走，他肯定会被扣下来。

**熊：**真的不容易啊。美国政府设法将你们留了几年。在这期间，有不少人结婚生子，然后，就很难再回去了。您的遭遇是不是也与麦卡锡主义有关？

**郑：**麦卡锡主义在我们学校影响挺大的。有个人叫威因鲍姆（S. Weinbaum），在CIT化学系任助理研究员，因被控作伪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被判刑。他在学校的朋友也遭到怀疑，弄得学校气氛紧张。我后来才知道，威因鲍姆与钱学森相识，钱学森还曾写信推荐他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去工作。二人同时参加



郑哲敏与恩师钱学森（左）在一起

过不少活动，其中有些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有些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活动，钱学森本人不一定知道。因此，查威因鲍姆的时候查到钱学森身上来了。这件事情对钱学森造成了压力。化学系的鲍林教授也受了威因鲍姆事件的影响。鲍林是进步党党员……

**熊：**进步党？

**郑：**对，进步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一个政党。进步党出过一个叫华莱士的，曾在罗斯福时代任副总统。他在1944年访问中国，捎了些美国蜜瓜种子到兰州，后来，兰州的农学工作者试种成功，将其命名为华莱士瓜。在一次政治性的活动中，我曾和鲍林一起吃过早餐，明显感到他受到了压力。当时有一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American Activities）曾到我们学校搞审查活动。

**熊：**这些调查活动是捕风捉影，还是确实有所依据？

**郑：**那时候苏联在美国确实布置有间谍网，而美国共产党也确实有地下活动。1953年，罗森堡（Rosenberg）夫妇被判处死刑，就是因为泄露了机密给苏联。美

国政府对共产主义历来警惕，苏联的原子弹（1949年）、氢弹（1953年）出来后，更是变得恐慌起来，而老百姓也犹如惊弓之鸟，一忽悠就起哄得厉害。麦卡锡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他们在很多地方开展对共产党的追查活动，达到了捕风捉影的程度。美国政府还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要求公务员、军方人士以及大学教授等搞“忠诚宣誓”，声明自己效忠美国政府，不同情共产主义等，否则就会遭到解雇。这些调查弄得人心惶惶。有些人被说成Pink（粉红）。弄得他们也比较紧张。

**熊：**博士毕业后，您连合法身份都没有了。

**郑：**是啊。我不知如何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后来有人告诉我，移民局使用的是不同于民法的另一套法律系统，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被非法拘留过之后，我就申请自动离境。审批的结果是不让走，还把我的护照没收了，让我没法出去工作。1952—1954年，我就在学校待着做助教；还像自由撰稿人似的，做点临时的研究工作，写一个研究报告，得几百块钱。

**熊：**在业余时间您做些什么呢？

**郑：**主要是看书。毕业后我看了很多小说和纪实作品，尤其是侦探小说。印象较深的是史沫特莱写的一些东西。她是个记者，曾应邀访问延安，写过很多相关的报道和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我试图通过她的笔来了解新中国的领导人。

**熊：**您当时与国内有直接的通信往来吗？

**郑：**有，但不多，主要是与我父亲通信——直接写给他，至于路上怎么走，我不太了解。大概要经过香港吧。

**熊：**当时您父亲在哪里？

**郑：**解放时我父亲在香港，1950年，我妹妹把他接回上海。在通信中，我父亲并未向我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但我模模糊糊知道，回国后会控制得很严，因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介绍，如报纸上说中国是警察国家、已执政的共产党仍保持秘密组织的作风等。我们还获悉国内正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反对“崇美恐美”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之类的东西也听说过一些。对于这些负面的东西，我是将信将疑。所以，1954年中美日内瓦谈判后允许我们走，我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又有些紧张。我知道，一旦回去，恐怕就不会再有出来的机会了。

## 绕道欧洲归国犯了大忌

**熊：**听说您当年是绕道欧洲回国的？

**郑：**是的。之所以如此，有点个人原因。我爸在香港时，我妹妹动员他回来。他给我写信，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生意，也就积蓄了不到两万美元，都寄给你吧。我把这笔钱存到了银行。尽管当时我在加州生活很窘迫，也一直没动用它。我胆子小，怕钱会被没收，就在离开美国时，把钱从美国银行取出来，想方设法把它转移到欧洲去。我爸长期做钟表代理商，从瑞士进口钟表。我决定先让钱流经瑞士。但当时不容易拿到瑞士的签证。瑞士人说你来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去哪里。我就先办成了去日本的签证，接着就有了到瑞士的签证。瑞士签证办下来后，我又办了去法国、意大利的签证。到瑞士后，为了获得进入香港的证件，我在那等了近三个月。在香港登岸后我就溜了，把去日本的票废掉了。

## □ 怀念师友

**熊：**回国之前您有什么预期？与后来的实际情况有落差吗？

**郑：**我想在回国之后去钱伟长那里工作。我曾给钱伟长写过信，但他没回信。我妹妹于1946年考进燕京大学，1950年毕业，去北京市政府当翻译。有一次在开会时她遇到了钱伟长，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愿望。钱伟长说我可以去他那里。就这样，我有了一个工作的地方。

回国之后，我才发现，因为去了趟欧洲，我的履历出现了“疑点”。

**熊：**这件事情影响了组织对您的信任度，以及您以后的工作吧？

**郑：**是啊。这段经历没有证明人，是

一段历史空白，也许影响了对我的使用。1958年，我们力学所调整方向，重要的“上天”“入地”“下海”任务与我无关，我只管不被重视的“工农业生产中的力学问题”；“文革”时我的历史也没法说清；我后来当力学所所长较晚，也许与这个有关联。

**熊：**同为钱学森的学生，您的师兄庄逢甘、罗时钧等做的可都是与国防相关的保密工作。

**郑：**我现在年纪大了，回首往事，觉得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未尝不是一种财富。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原载《东方历史评论》，本刊有删节）

## 西南联大郭旭老学长逝世 享年 99 岁



郭旭老学长，于 2021 年 3 月 14 日去世，享年 99 岁。郭旭学长 1922 年 5 月 26 日出生，云南昆明人。1946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在云南师大外语系教学 43 年，直到 1988 年退休。曾任云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副系主任、研究生教研室主任。曾任云南省副教授、

教授评审委员会委员三届，云南省外语学会副会长，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曾参与创建云南省外国语学会、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

曾翻译英国作家费·沃尔夫的小说《达罗卫夫人》，专著《最新英文课复习指导》，主编《当代英汉词典》。1986 年受聘为访问研究员赴美国麻省州立大学与该校教授 Luciem Miller 合作完成两校协作项目。翻译云南少数民族神话故事传说，用英文形式介绍到西方国家。书名 *South of the Clouds—Tales From Yunnan*，1994 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曾担任过一些重要口译工作，如云南省政府与联合国官员谈判等。2002 年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 怀念一位真正的好人

## ——孙安利同学周年祭

○张 比（1969届工物）

转瞬之间，安利同学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

一年来，我常常梦见安利，他的音容笑貌，总是在眼前浮现。我总以为，他还在北京西土城那座塔楼的一楼，打电话过来说，想你了，一会儿就过去。一个小时后，车就停在燕郊我家楼下。是的，安利仍然活在我的记忆里。我相信，也仍然活在物九同学和所有亲朋好友的记忆中。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是好人，是个真正的好人。而这样的人，在现在的社会里，已经不多见了。

说安利是真正的好人，有许多话要说。这里，只说两点。

**第一，他乐于奉献，先人后己，不慕钱财，看重亲情和友情。**

安利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生前是铁道部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中学教

师，外祖父在清末曾任黑龙江黑河医官，参加了伍连德博士主持的防治鼠疫流行的工作。安利中学就读于北京八中，并在北京少年宫从师周思聪女士（著名画家，全国美协副主席）学画，后改学手风琴，有良好的艺术素质。

安利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在工厂里劳动，吃了不少苦。1976年调到天津不久，遇到唐山大地震，他主动请缨，赶往灾区，清理废墟，运送伤员，奋战几天几夜，受到抗震指挥部表彰。调到北京后，他的家成了物九同学的驿站，南来北往的，国内外的，他都热情接待，组织或大或小的聚会活动。久而久之，建立了通讯网络，将失散多年的物九同学重新组织起来。1998年5月，组织了毕业30年聚会活动，物九这个集体，重新焕发了活力。

此后，每五年、十年组织的多次活动大家都有深刻印象。2019年毕业50年的聚会，他拖着病体，竭尽全力，我们都看在眼里。

他在长期为大家服务的过程中，不仅操心费力，而且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钱。这些钱都是同学们自愿交纳或捐助的，如果用完了，还可以继续募集。但安利知道同学们的钱来之不易，能省则省。而他自己做联络工作开车跑路的油费、过路费等，都是自己出，有时请客吃饭，更



孙安利同学（右）与张应超（中）、张比同学在一起

## □ 怀念师友

是自掏腰包。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他退休较早，夫人从集体所有制小厂退休，收入都不高。安利经手的账目，都是一清二楚，直到他逝世前，剩下几万元，他多次与我商量，决定退还给捐助者，并想方设法，一一退还，做到清清白白。或许他已预感自己将不久人世，一定要问心无愧，走得干净？这样的为人处世，真可谓君子坦荡。

安利是长子，但他全部放弃对父母遗产的继承，留给弟弟妹妹。他说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绝不能因钱财损害了亲情。安利身后，家产很单薄。他就是这样轻财重义的人。

第二，安利有宽广的胸襟，开放包容，团结友善。

我们物九同学，毕业之后，天各一方，可谓一盘散沙。在校期间，因历史的原因，难免互相伤害，有心理隔阂。在安利和一些同学的努力下，大家才消除隔阂，重新成为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安利努力帮助同学们解除误会，忘记历史的恩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大规模聚会时，出现了同学含泪握手，“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人场面。

在组织活动过程中，他从善如流，集思广益，吸收正确意见。无论是在苏州聚会、嘉兴聚会，还是在京的几次聚会，都发挥本地同学的积极性，分工合理，相互配合。每次聚会，都让大家吃住舒服，玩得痛快，聊得尽兴，连陪伴的家属都很满意，称赞说你们那位老孙真有组织才能。

由于2019年毕业50周年活动组织工作的成功，2020年校庆前，校友总会特别邀请孙安利，为1970届毕业生代表介绍经验。安利抱病到母校作了发言。没有想

到，几个月后，他就匆匆离去了。

安利是一个心胸开阔、气度恢宏的人，他早已参透人生，看透生死。活着，坚强乐观；离去，不带走一丝恩怨和任何遗憾。

这个世界，好人坏人都是少数，多数是不好不坏的普通人。好人，就是为别人着想多于为自己着想的人。孙安利，就是一位难得的好人。这也是我们一直怀念他的原因。

安利，做了一辈子好人，离世后还有这样多的人怀念他，他可以安心地去了。

2021年8月11日

### 原北京广播学院院长 常振铮同志逝世

著名教育家、原北京广播学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常振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常振铮同志，1929年12月出生于北京房山，1947年9月至1950年12月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1950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60年4月至1966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无线电处副处长；1966年2月转业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历任无线电系教师、党总支委员、系主任；1980年4月至1983年6月任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1983年7月至1993年1月任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常委、院长。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科技委常委，中国广播影视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市电子学会广播委员会副主任，广电总局老科协顾问。

## 张宁馨老学长在台湾逝世



西南联大张宁馨老学长，2021年6月27日在台湾逝世，享年97岁。张学长1925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理工组，1944年转入联大工学院航空工程学系。

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复员北返后，张学长转入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继续就读，1948年毕业。先进入招商局，随轮船在海外走船，1949年7月起即滞留台湾，因而就地生根，成家立业，直到1993年方完全退休。45年职场生涯中，共经历五个机关，四分之三的时间皆为民营事业工作。

张宁馨校友对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感情深厚，和同学校友常常联系，对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关心支持。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100周年时，他积极返校和同学共庆母校生日。（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 艺术设计家、教育家 崔栋良先生逝世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教授，杰出的艺术设计家、教育家崔栋良先生，因病于2021年6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崔栋良先生1935年9月20日生于河北省霸州。195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1956年7月转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学习。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于

陶瓷美术系、染织美术系，曾任染织系副主任、教务处处长、教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基础部主任等职务。崔栋良先生长期从事艺术教育活动与管理工作，进行艺术设计的创作与研究。在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艺术设计人才。

## 科技部高新司原司长 冀复生学长逝世

科技部高新司原司长、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理事冀复生研究员，于2021年8月17日因突发疾病逝世，享年79岁。



冀复生，1942年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1966年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生产通讯设备的工厂。1978年被派到美国进修，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系做了近两年的研究工作。回国之后，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工作四年。1985年调入国家科委工作，先后任国家科委技术市场中心主任、新技术局总工程师、基础研究与高技术司副司长、司长等职。1998年，任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巡视员。1999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2002年底卸任回国。2005年《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创刊，担任首任执行主编。2004—2008年，担任CCF第八届理事会理事。2016年获得“CCF杰出贡献奖”。

## 影响和改变我的清华体育

○史宗恺（1980级工物）

1980年，我考进了清华。之前，我对体育的印象，基本限于中学的课间操。我没有表现出色的运动成绩，曾经有一些记忆的中学和小学运动会，我只是看客，或者是为场上运动员同学看看衣服之类的。

在清华读书的那段时光，对我产生的重要改变之一，就是我有了运动锻炼的习惯。这是环境的影响，或者说由于一种环境压迫而带来的改变，这是一种主动和被动联合起来作用的一种改变。

那时的清华，每天下午四点半后，满操场上，更准确地说，是满校园里，到处可见锻炼跑步的学生。这个时候，篮球场、排球场上满满的都是学生。东西两个操场上，多的时候，有十几支踢球的队伍，踢球的同学还因为占场地的问题时不时引起纠纷。跑步的学生，很多时候会跑出校园，穿过夕阳余晖中的圆明园，再折

回到校园。这些情形，构成了一种清华强大的体育环境。这样的环境，久而久之，就转变成为一种文化，成为清华的重要传统。师兄师姐们每天下午上操场锻炼的举动，为我们做了“锚定”，成为低年级同学的重要参照系，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跟随高年级同学的示范，也在这个时候上操场去锻炼。这是学校积极鼓励的，也是要求。

那时的清华，对体育的要求，不止是一周的两次课，还包括了明确的课后作业，每周要跑若干次800米、1500米，还要引体向上等，并且要记录下来，形成《锻炼周志》，上交任课教师，这是期末考核的内容要求之一，也大大促进了学生下午锻炼习惯的养成。体育课的任课教师，也会在下午四点后，到操场上去，辅导学生的1500米跑，测试学生的引体向上数量，等等。那时，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8—1>8”，即，每天用8小时的时间学习，不如用7小时来学习、用1小时来锻炼，而更有效率。

师兄师姐的“锚定”作用，体育课的强制作业要求，这样的环境影响和改变着我。大二以后的许多时候，下午四点半前，我会回到宿舍，换上运动服，去跑步和游泳，或约了同学一起打排球、打羽毛球、踢足球等。六点钟前后，冲到浴室，洗个热水澡，然后吃饭。七点多钟的时候，已经坐在教室里，开始自习了。我也曾代表工物系1980级排球队，作为二传手，在



2020年4月26日，史宗恺（前排左1）  
为西操接力109圈活动起跑发令，前排左2  
为王凤生老师

东操的排球场参加比赛，感受到团体比赛的氛围以及团队默契配合而拥有的那份喜悦。

在前两年的体育课中，作为课内要求，我学会了游泳。我的体育课老师是王俊华，他在清华教了一辈子的体育课。按照学校最初的课程安排，大三就没有体育课了。但是，从1980级开始，大三时，学生可以自主选修一门专项体育课，这是一个学期的选修课程。我很积极地选修了羽毛球专项课，给我们上课的是翟家钧老师。在这个专项课上，我学到了羽毛球的一些基本技能，如高远球、吊球、扣杀以及步法等，也让我从此爱上了羽毛球，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曾打断了跟腱，又打断了韧带。羽毛球技能的掌握，让我迷上了这项运动，它带给了我无数的运动和生活乐趣。

对运动的热爱和运动技能的掌握，与锻炼身体的意识和习惯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之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当然也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启发和影响，包括意志、勇气的培养，等等，这就是马约翰先生所说的“体育的迁移价值”。

毕业后，我们班以及年级中的大部分同学离开清华，开始了他们的人生和事业旅程。但是，运动，成为绝大部分同学生活的一部分，在清华养成的运动习惯，一直伴随着他们，很多同学仍然坚持每天或每周定期去做各种运动，重视锻炼身体，很多人也因掌握了某一项运动技能，更有运动的热情，因而更热爱体育。

当我们谈到大学体育，谈到体育对学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和改变时，作为一名清华的普通学生，我体会到，这种影响和改变，是针对所有学生的。因此，这种影响和改变，就有了更普遍的教育规律层面

上的意义。体育即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体育完整内涵的理解以及强调和重视，在这些教育理念指导下形成的各种具体措施，对学生的成长产生的影响和改变，它们一起构成了清华体育教育思想和实践。

去年，在诚志股份的支持赞助下，体育部联合社科学院和教育研究院，启动了《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课题研究，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我们不只是简单地去作历史回顾和总结，而要在学术的角度上，通过多个学科的参与，把清华的体育教育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上来，提炼出有清华特征的体育教育思想。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我们热烈期盼着研究结果的呈现。

这本文集的出版只是《影响我人生的清华体育》主题征文的开始，征文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学校以及校友总会鼓励校友们，继续写下你们关于清华体育的各种故事，写下体育对各位生活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和改变。这些故事，会变成传说，成为清华的大学文化和体育传统中的内容，我们非常期待。

我曾无数次地回想我在清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那些人生路途中，影响和改变了我的，无数的人和无数的事。我想说，清华的体育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我。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走出教室，走出宿舍，到操场上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走，我们一起去运动吧。  
以此为序。

2021年5月于强斋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影响我人生的清华体育》第一辑序言)

## 父亲与清华体育二三事

○何吉林（1970届无线电）

我的父亲何礼（原名何维登），是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学习的。他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都很喜欢体育运动，在南京中学上高中时，还曾代表学校参加江苏省中等学校体育运动会的田径比赛（当时是男子五项全能），可见他对体育的痴迷程度。进入清华这个体育氛围浓厚的学校，他更是积极进行体育锻炼，照片中跃起腾空做跳马运动者，就是我父亲上清华时进行体育锻炼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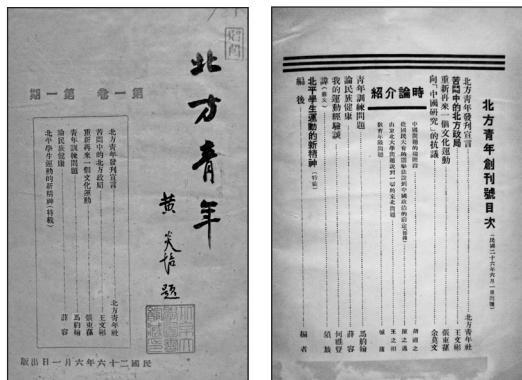
上清华后，由于积极参加进步的爱国学生运动，接触到许多新思潮，他对体育运动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当时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学诚交给我父亲一项任务，协助创办中共北平学委公开刊物《北方青年》，北平学委书记蒋南翔为主编，我父亲是刊物的代表人。在《北方青年》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两类文章，一类文章是当

时学生们普遍关注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时事评论；另一类文章是关于体育和健康问题，可见这也是当时学生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创刊号发什么文章应该都是精心选择的，说明蒋南翔同志在学生时代就很重视体育，后来他当清华校长时提出“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的口号，绝不是偶然的。

在《北方青年》的创刊号上，涉及体育和健康的文章有三篇，分别是马约翰先生写的《青年训练问题》，我父亲在南京中学和清华的同窗好友薛公绰写的《论民族健康》，以及我父亲写的《我的运动经验谈》。在我父亲的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少年时期在云南读书时，痴迷国术（即中国武术），练各种拳法、棍法、刀法。受一些迷信宣传的影响，甚至期望能练出飞檐走壁、刀砍不入的功夫。由于训练方法不讲科学，身体反而越练越坏，直至生了一场大病才停止训练，从此对国术产生了怀疑而彻底放弃。到南京上高中后，他又迷上了西式的体育运动，什么球类都会一两下，田径赛也一样懂一点，并成为学校的体育选手，那时是很神气的。上清华后，因为喜欢体育，父亲与马约翰教授很熟。在马约翰等老师的教导下，他对体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文章中写到：“（中学时的西式体育）有好多事细细一想，却也颇令人发生问题的。第一，输赢心重，运动员的道德就不免受其影响（为



做跳马运动  
何礼（上）求学期间与同学



《北方青年》创刊号

争锦标而采取不正当手段竞争，甚至故意伤人等）……其次，选手制的本意是借竞争来激发人们对体育的兴趣，但现在往往舍本逐末，运动员们给弄得嚣张跋扈，气势凌人，仿佛是学校里的特殊阶级，至于大多数同学，不在体育教员注意之列……而且各校的选手常老是这几个人，篮球他擅长，足球他不弱，田径赛他可也能来几手的。这样情形之下，普及体育云何哉？那么这极少数的选手们都是由体育得到健康了吗？也不见得。过度或不适当的运动，并不能使每一个运动员都身心健康的，像我自己就曾因苦练短跑而心脏出毛病，原因是为比赛、为出风头而运动，并非为锻炼身体而运动。好，对这一类运动我又怀疑起来了。高中毕业后，自己因吃了不适当的运动的亏，同时看了一鳞半爪的社会科学书籍，以为国术是封建的玩意儿，而美国式体育则是资本主义的玩意儿，两种东西恰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反映，都是应该打倒的，怀着这样的偏见，我就从此不运动。这么一来身体却渐渐地更坏了，仅仅药力是很少有补于身体的。因此问题还是横在心中，不得解决。在社会上

又随时随地使你受到刺激，比方你到深堂去一看，除了极少数臃肿不堪的模特儿以外，大多是一付骨头架子。而‘友邦’浪人的贩卖毒品，以及医药卫生的不普及，无往而不是民族健康的障碍。个人应该怎样锻炼身体呢？团体应该怎样提倡体育呢？”

经过在清华对体育真正意义的启蒙，以及自己的独立思考，我父亲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他在文章中写道：“如今我又在运动了，练的西式运动，虽然没有当学校代表队，每天玩玩，身体却已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使我悟到先前因噎废食的错误。我的意思是国术并非根本要不得，害处只在于囫囵吞枣，不取消许多非科学的成份。选手制的西式的科学化的体育普遍于全国中高级学校，也并非根本要不得，害处只在它的依样画葫芦，外国的好处固然学到，外国的恶习也照样学来，流弊所至，皮毛多于实际。譬如上海等地，运动成为职业，比赛变作商品，而运动场上的观客也多半把运动当作一种刺激，是怀着看跑狗或赛马的心情去的。消极方面，这些流弊应该避免。积极方面，我以为运动比赛的计分法最好多以团体为单位，以补选手制的不足，比方爬山可分为几组，而赛跑跳高之类的计分给奖，也看各团体内每人成绩总和的平均数而定，这样，体育容易普及，一方面又可培养中国人所缺少的团体精神。至于选手，各校还不妨应挑拔出来由教师加以训练，作为将来健康事业的导师，分配在各单位里负责指导。选手们只应以各该负责单位光荣而光荣。在运动会考核成绩后，由选手们作表演性质的竞赛，来激励体育健康方面的技术，作为别人的楷模。我们知道：在统计上如

## □ 荷花池

果是一条正常曲线的话，那么，左端最低的可以由极健康的选手们来代表，右端最低的可以由最不健康的‘老夫子’们来代表，中间高的部分该是健康线上的人们。而我们的体育健康事业，最要注意的就是中间最大多数的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父亲在清华期间对体育的认识，已经跳出了纯粹个人兴趣的狭隘，提升到关心全民族健康的高度。

我父亲在清华期间与体育有关的事还有一段佳话，见于著名作家黄秋耘纪念我父亲的文章，他写到：“何礼是我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他就读于理学院心理学系，专攻动物心理学，我就读于文学院国文系，他比我高两班，本来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我们同在一个排球队里打球，他打二传手，跟我配合得不错，后来又同在民族解放先锋队一同搞通讯联络工作，慢慢就熟悉起来了，晚饭后经常一起去圆明园的遗址散步。他很健谈，有多方面的兴趣，不但爱好体育运动，又擅长篆刻书法，还会唱昆曲。总之，颇有点倜傥不羁、风流名士的风度，我对这位老大哥是打从心眼里佩服的。大概是1936年的初秋吧，有一天，何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小黄，你想不想进大学，要是想，我给你介绍！’我瞪大着眼睛说：

‘你开什么玩笑？我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还要你介绍进大学？’他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说：‘你加入了民先队，只能算是进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才算是进大学！’我马上表示愿意入党，越快越好。他却说：‘且慢，按照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才能入党，你还差一个多月呢！在这一个多月里，你先好好地学习党章，考虑考虑，考虑好了以后再写一份自传和



何礼夫妇与蒋南翔（中）

入党申请书。对了，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要随便跟别人商量，有什么想法和问题就直接找我谈。’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是很顺利地履行了一切手续，入了党，介绍人是何礼和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杨学诚同志。”原来我父亲在清华期间，还注意利用体育活动结交进步同学，引导他们参加革命和入党。在《北方青年》上发表《论民族健康》文章的生物系学生薛公绰，与我父亲是明斋同寝室的好友，每天一起进行体育锻炼，也是这样由我父亲引导参加革命的。

1965年我考入清华。当开学典礼上，蒋校长提到过去清华有一个从美国传来的高年级学生戏弄新生的恶作剧“拖尸”时，我忽然想到小时候住在团中央大院里，曾看到蒋南翔（时任团中央副书记）、荣高棠（办公厅主任）、杨述（宣传部长）和我父亲（学生部兼少儿部部长）这些清华老校友，在工作之余一起打台球时的情景：他们穿着“土八路”的干部制服，却又满口洋文的台球术语。上中学时我偶尔想起这一幕感觉很好笑，问父亲当年他们是说英语吗？结果父亲告诉我，他们说的台球术语是法语，是欧洲上

流社会的语言，当时清华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时，说的体育术语不是英语就是法语。原来这种无问西东、各取所长、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精神，早已融入老清华人的骨髓之中。

1953年，我父亲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工作。当他见到马约翰教授时，恭敬地说：

“马老，我还欠您两个体育学分呢！”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年国难当头，我父亲是清华学生选出参加北平学联的三位代表之一，担任学联常委，经常在市内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根据党组织

的安排，忙于组织学生撤退和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先后辗转天津、济南、南京和武汉。后来由中共南方局派往昆明，担任云南省工委青委书记，领导西南联大和云南省的青年工作。虽然他体育一向很好，但已经无暇顾及体育这两个学分，就在西南联大补开了清华的肄业证书。16年过去，师生在清华重逢，我父亲看到马约翰教授依然精神矍铄，非常欣慰。马老也称赞我父亲当年的选择完全正确，还开玩笑说，可惜现在不能给你补两个体育学分了！师生把手言欢，成就一段佳话。

## ● 清华真情

# 情系清华 奋斗 60 年

## ——忆 1955 级水利系动 01 班

○张兆琪 张 庄（1960届水利）

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工业化的热潮。新中国自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那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之时，迎来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记得当时有一幅风靡全国的宣传画“把青春献给祖国”，画中刻画了两位严冬季节在野外作业的女勘探队员，她们的脚下是奔腾的江河，身后是巍峨的群山。这幅画绘就了我们这一代人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远大情怀。

1955年夏天，我们高中毕业，那时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深入人心。当时在苏联，世界最大的两座水电站古比雪夫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正在建设中。我国的水电建设方



兴未艾，而长江三峡的水电站工程更是我国从事水利水电建设几代人的梦想。我们是多么向往参与到这样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项目去啊！

也正是在这一年，清华大学水利系首

## □ 荷花池

次设立了“水力动力装置”专业，我们动01班31位同学就是怀抱着这样的青春梦想，全部以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大学动力类并进入水力动力装置专业。后来又转来两位同学共33人。

我们如愿以偿地开始了大学生活。

在向往已久、美丽的清华园里，老师们孜孜不倦的教诲，给我们打下了深厚、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基础，党团组织的精心培育，使我们懂得了要又红又专；蒋南翔老校长提出“至少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的口号使我们养成了锻炼的习惯，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老一辈的清华学子追求理想、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和熏陶了我们，成了我们做人做事的精神支柱。1961年的1月（由于参加密云水库设计及生产劳动，学制延长了半年）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要毕业了，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党号召我们“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班里绝大多数同学在毕业分配表上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志愿不少人填报的是分配方案中的内

蒙、宁夏、贵州、黑龙江等边远省份。同学们都愉快地服从了分配，告别了老师，告别了生活五年半的清华园，意气风发地走上了人生的新征程。

孙亦麟同学被分配到地处辽宁省的桓仁水电站工作。由于经济困难，工程下马，他被调到辽宁发电厂。那里有13台汽轮发电机组和两台水轮发电机组（大伙房水电站）。于是孙亦麟就被派去和工人师傅一起干活，维修这十几台机组。前后一共干了1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才在1980年被“借调”到东北电业管理局。经过机构的几次调整，最后担任东电水电处生产技术科科长，全面负责水电管理工作。参与东北地区鸭绿江、松花江、浑河等流域上大、中型水电站的规划、设计审查；参与水电站建成后的启动验收与试运行；统筹局属水电站机电设备的生产运行、维修与技术改造。总之，无论是老的丰满、云峰水电站，还是新建的白山、桓仁、太平哨等水电站的有关生产、运行、检修工作都归他们管理。他说自己“走南闯北”“很忙”。说起几十年的经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三中全会的受益者。”

同样被分配到东北电管局的还有郝述唐同学。他于1979年调到东北电管局所属的朝阳电力修造厂。1983年起担任厂长，组织领导企业整顿工作。针对以修配为主，既无定型产品又无主导产品难以为继的情况，经与上级协调，确定了以改造和制造大型电力变压器为经营方针，实现了工厂经营转



1957年5月，動01班团日活动留念

型。为此逐步完成了制造装备配套、超高压试验装置的完善化管理体系。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名列国内三大变压器厂之后的第四位。

为了帮助解决大型电力变压器运到厂里检修运输困难的问题，郝述唐组织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下到现场就地施工，克服诸多困难，顺利完成任务。1993年电业局成立科技开发公司，郝述唐担任副总经理。他们开展了“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并赴多地推广应用。郝述唐同学一路走来，从克艰立业到艰苦创业，他无怨无悔，矢志不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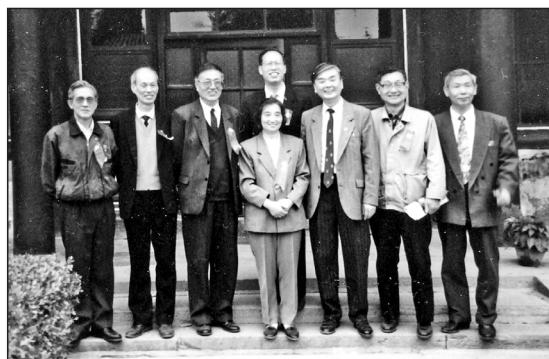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加，许多水电站工程也得到上马建设的好时机。

李明松同学毕业时被分配到西北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先后在西北院机电处担任过书记、处长和总工程师的职务，还参加了黄河上游龙羊峡、拉西瓦、尼那、李家峡、公伯峡、小峡、大峡、乌金峡和黑山峡水电站的机电设计。这些电站中除黑山峡外，其他均已建成发电。退休后他又

到长江三峡水电站担任监理工作。他的经历正如我们水利系的系歌《水利建设者之歌》所写：“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身后是灯火辉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关仁卿同学于1984年调入当年水电部下属的水利电力对外公司。由于对外开放国策的实施，对外公司的业务由过去的单纯对国外进行经济援助发展到参与国际性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从而能承包国外水利电力工程。关仁卿调入公司后，于1986年被派往公司驻伊拉克经理部任经理。那时，中水电公司在伊拉克有管理人员、工程师、技术工人等近千人的队伍，进行的工程项目如：底格里斯河上堆石坝的修复（因伊朗飞机轰炸而被破坏），幼发拉底河上灌溉水闸的土建及设备安装，摩索尔大型水利工程的蓄能机组安装等十多项。而当时正值两伊战争期间，全体人员冒着伊朗导弹袭击及飞机轰炸的风险，同心同德，顽强奋斗，按期保质完成了所承建的工程。关仁卿同学先后对40多个国家、地区的工程分别进行了考察，参与项目谈判、签约及工程的施工、运行、管理等工作。鉴于他在发展我国工程技术事业上作出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我们班的“老博士”是来自上海的朱柏松同学，毕业时被分配到贵州工学院（后改为贵州大学）。退休前他一直从事水利工程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退休后，他曾走出贵州到上海、深圳“打工”两年，看了看外面的“世界”，他的结论是，“我还是在贵州最能发挥作用”。于是他又回



1995 年校庆，部分动 01 班同学合影。左起：  
郝述唐、仲崇恕、常兆堂、张兆琪（前）、刘冀生（后）、  
吕世磐、翁耿光、陈通谋

## □ 荷花池

到了贵州大学。2007年清华大学金峰等教授去贵州做堆石混凝土筑坝技术试验研究，朱柏松受邀参加了该项试验研究。2018年贵州大学土建学院建立了堆石混凝土研究中心，82岁的朱柏松受聘为该中心主任。至今他们的研究成果已被收录入国际大坝委员会颁发的堆石混凝土坝技术公报中。现在朱柏松仍不服老，带领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在实验室忙碌着，或奔波在堆石混凝土的施工现场。问起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地投入工作，他说：“这是我国提出的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新坝型，为它的成功尽力，这很有意义。”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建设现代化强国对人才有了新的需求，我们班也有同学离开了所学、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但是他们为祖国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没有变，他们在新的专业领域谱写着新的华章。

仲崇恕同学1962年被分配到哈尔滨电机厂大电机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了我国云峰、刘家峡、新安江、葛洲坝等大型水电站水轮机叶片强度试验研究以及叶片的模型应力试验分析和真机应力实测研究。1982年组织协调我国首台高水头水轮机水力试验台的建造和调试工作，1984年经有关部委组织的专家鉴定验收，认为“该试验台运行稳定，试验精度优于0.3%，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然而，正值仲崇恕在专业技术领域工作日趋成熟、将会取得更多研究成果之际，1985年党组织调他去做哈尔滨电机厂劳资处处长，负责全厂的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的改革工作。那是由于1985年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企业内部要实行劳动优化组合，职工竞争

上岗等，这是国企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每项改革都牵涉到职工个人切身利益，稍有处理不当都会引起风波。仲崇恕同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服从组织分配去“啃硬骨头”。他无私无畏，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

刘冀生同学1984年从水利系调入我校经济管理学院。当时正值我国由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变，企业急需大量了解市场、会经营、懂管理的中高层管理干部。为了加快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他在院系领导下，为在我国建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终于在1990年获得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制度，并在清华等9所院校进行试点。

为了尽快掌握经济管理学科的理论，他向专家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厂长、车间主任学习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他“勇敢”地接下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讲课任务。这以后，他边讲边改进，将课程的名称改为“企业战略管理”，他成为国内最早开设这门课的教师之一，后来这门课也成为MBA学位的必修课。他共培养了152名硕士生，还有11名博士生，成为国内较著名的企业战略管理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刘冀生同学还为全国重点大、中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监事、独立董事以及民营企业高层管理干部主讲“企业战略管理”。他还为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中国牧工商集团等26家国营大、中型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企业给予了高度评价。30多年来为企业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型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

在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的科技大军中，也有我们班在中科院力学所工作的唐泽眉同学。

20世纪90年代初，载人航天任务启动，中科院承担了国家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的研究任务。力学所开始进行微重力环境下流体流动和传热规律的研究，为航天器在空间的利用和流体管理提供根据。唐泽眉担任微重力流体物理理论组组长，承担液桥的数值模拟研究工作（液桥是悬浮在空间跨接、连接两个固体表面间的一段液体）。从建立物理数学模型，开发三维不定常有限元数值程序，模拟结果的数据处理，到与试验进行对比。多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数值模拟、地面试验、空间搭载试验，她和她的团队耐得住寂寞，经得起一次次的失败，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系统的液桥空间试验终于在2016年天宫二号（它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空间试验室）取得成功。

唐泽眉2003年退休，2013年离岗。在她离岗时，天宫二号的数值研究已完成，试验组也进行了地面试验，正研究进行空间试验。

2014年，中科院在“关于表彰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和承担载人航天工程协作配套任务突出贡献和优秀个人的决定”中，唐泽眉获“优秀工作者”称号。说到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她很平静地说：“我正好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我的体会是：我们国家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搞大协作的威力，每个人都在付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她说得对，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付出自己的努力。季顺得同学1963年因北京市缺乏中学教师，他从中科院电工所被借调到北京63中。这一“借调”就是30多年，季顺得在63中负责高三年级的数学，担任数学教学组组长。由于他教学成绩突出，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于1987年荣获“北京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的称号。

我们班的吕世磐是一位华侨同学，毕业后曾任教于贵州工学院（现为贵州大学）和浙江大学，1975年到香港后，经过与多人竞聘进入香港大学，担任工业中心工程训练主任。他不仅为香港大学工程训练系统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难得的是，吕世磐还促成了香港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合作。经过他与清华大学有关方面的协调，1994年与1995年他两次带领三十多名香港大学学生到清华大学进行工程训练，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们自己办刊物讲述训练的实况，写体验文章、诗歌等，表达自己的心声，十分感人。在香港回归之前，建立起港大与清华的这种交流



2020年9月，动01班毕业60周年“云聚会”合影

## □ 荷花池

难能可贵，意义也是深远的。

我们班还有一位华侨同学谢志锋。他较长时间在香港从事商贸工作。在校时，是校羽毛球队员，为学校争取过荣誉，现在80多岁了还在香港体育馆打球，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是“无体育，不清华”的实践者。

我们在追求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总会遇到沟沟坎坎，当它们阻挡我们前进时，就要鼓起勇气，树立必胜的信念，以顽强的斗志跨过去。

我们班的张逢甲同学在上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大学没有念完就被送到艰苦的煤矿等地进行劳动改造，最后辗转到了新疆建设兵团。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就此消沉，他积极劳动，努力工作。平反以后，因为表现出色，党组织批准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他成为一名党员，退休前他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党校副校长。

我们班毕业时就分配到边远地区的还有王基清同学，他长期在黑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工作；张存济同学一直在宁夏水利科学研究所工作，曾担任所长。他们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边远地区的水利事业。

我们班还有几位在国家部委、部属的水电设计院、国企和中科院的管理岗位上工作的同学，他们都兢兢业业，努力勤奋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

还有留在学校的同学们，他们分别在校、系的领导岗位上，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岗位上，为把清华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培养一代代清华学子贡献了力量。

最后要说的是，我班同学公认的杰出

代表陈通謨同学。毕业时他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毕业分配到内蒙古电力局农电处工作。当时内蒙古不仅是农村，就连许多县城都没有通电。牧民说：“没有电灯就像没有眼睛，听不到广播，就像没有耳朵。”他感受到了巨大的责任和沉重的压力。而责任和压力都转换成他几十年坚持奋斗的强大动力。

从最初的自带干粮、住蒙古包，到建成风光互补系统，再到踏遍内蒙古草原寻找风场，找领导，找合作单位，和外商谈判、购买设备，建设大型风电场，还利用工作之余写论文、报告，探讨风电事业的发展和各种技术应用方面的问题。陈通謨同学不惧艰苦，不辞辛劳，淡泊名利，为了内蒙古的广大牧民，为了内蒙古和我国的风电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精力。他是我们班同学的杰出代表，我们也以《陈通謨：内蒙古风电事业的拓荒牛》（参见本刊86期53页）为题，编写了报道他事迹的文章。

2020年是我们毕业60周年，我们相聚在微信群。当在手机上晒出了老照片时，我们看到了大学时代风华正茂的一群年轻人。当同学们谈起毕业后60年的经历时都感慨万分。这60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也享受到温暖的阳光，始终和祖国共命运。而国家发展的前进步伐也在我们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我们感恩国家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为我们搭建了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我们得以尽情地施展才华，发出光和热；而我们也为搭建这个大舞台添了砖、加了瓦，实现了我们的青春梦想。我们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在母校建校110周年之际，我们祝愿母校在新的百年再创辉煌。

## ● 回馈母校

# 李真、张广平校友捐赠母校设立 “杨振宁教育发展基金”

2021年7月27日，李真、张广平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仪式举行。此次捐赠将用于设立“杨振宁教育发展基金”，支持清华大学战略发展。

苏州贝克微电子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2004级基础科学班李真、张广平校友，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家强等出席仪式，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袁桅主持仪式。

捐赠仪式上，李真表示，回顾在清华的学习和生活，得到杨振宁先生的帮助，内心充满感激和崇敬。他说公司的核心团队成员均来自清华，从创立之初，就得到了母校校友师长的关心和支持。他感谢母校多年来的培养，感谢一起拼搏的团队成员，感谢创业路上给予支持的师兄师姐。未来，他还将继续带领团队，为我国集成电路行业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张广平回忆了自己和李真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生活。他说，母校给自己学识和精神的滋养，一直是自己拼搏进取的动力。在母校读书期间，他与李真就约定，将来一定重返母校，回馈清华，希望此次捐赠能够像师兄师姐帮助自己一样，支持在校的学弟学妹，努力学习、打好基础，将来成为社会的栋梁。

杨斌感谢两位校友捐赠支持母校发展，他说此举不仅是校友感恩母校和恩师的培养，还充分体现了校友心系母校建设发展的热情，也为刚刚度过110岁生日



李真校友发言



张广平校友发言

的清华送上了一份厚礼。此次两位校友捐赠，不仅有助于支持清华大学的战略发展，还有助于传扬杨先生科学报国的赤子情怀和勇攀高峰的求索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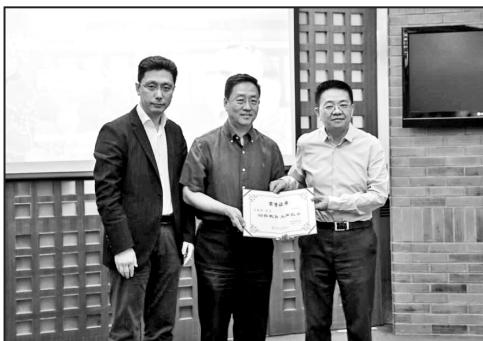
李家强代表杨振宁先生参加捐赠仪式，并转达了杨先生对两位校友的感谢。他说杨振宁先生对学生培养有着深厚感情，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希望能为像李真校友一样有志于投身科研的清华学生

“指路”，推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李家强表示，在杨振宁先生的感召下，高等研究院作为基础学科学术研究平台，已经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清华，致力于基础学科研究和创新人才培养。

最后，李真校友与袁桅签署捐赠协议，杨斌向李真校友、张广平校友颁发捐赠纪念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委董事总经理汪家胜、北京泰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余龙文、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赵劲松等也参加了捐赠仪式。

(基金会)

## “清华之友——徐葆耕纪念奖学金”成立



彭刚（右）、赵劲松（左）为刘俊君颁发捐赠证书

5月23日，“清华之友——徐葆耕纪念奖学金”成立仪式暨“徐葆耕与清华精神”座谈会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副校长彭刚，校党委原副书记、人文社科学院原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胡显章，奖学金设立捐赠者刘俊君校友（1986级自动化，1990—1992编双），徐葆耕教授家属代表徐江，以及日新书院院长王中忱、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主任梅赐琪、校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覃川等出席活动。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学术委员会主任金兼斌分别主持成立仪式与座谈会。

彭刚代表学校向刘俊君校友的捐赠表达感谢。他说，徐葆耕先生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认真勤勉的优秀学者和作家，更是一位担当得起“大先生”之称的教育家。虽然徐葆耕先生已经逝去11年，但他从没有被人们淡忘。他仍然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当下的人们：他曾经说过的话、留下的作品和书籍，以及他深刻影响、帮助和指导过的后辈，都是他留下的珍贵印记。奖学金的设立，是对徐葆耕先生作为

一个普通人做出不普通事业的表彰，也是后辈对先生深深的怀念。

刘俊君动情地回忆起徐葆耕先生对自己学生时代的深刻影响：“每次回想起以前在三教听徐老师讲授‘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课程，徐老师才华横溢的讲解、激情昂扬的语言和神采奕奕的目光，总是像老照片一样清晰地在脑海里回放。徐老师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何为无私之心，何为清华精神。”毕业后开启创业之路，学生时代传承自徐老师身上的清华精神，成为激励自己不断前行的动力。他表示十分感恩母校对他的培养，感念当年中文系编辑专业双学位以徐葆耕老师为代表的老师们，给自己留下的温暖难忘的学习生活经历。而这也成为他在创业有成后产生回馈母校、纪念徐葆耕老师想法的初衷。他希望通过这项奖学金，鼓励更多学生通过书写实践，将徐葆耕先生的精神和品格继承和发扬下去，把故事写在中国大地上。

徐江代表徐葆耕家属，向到场嘉宾和捐赠者刘俊君先生表达了真挚的感谢。金兼斌代表组委会，向大家介绍了奖学金的设立过程。在“徐葆耕教授与清华精神”座谈会上，王中忱、梅赐琪、覃川、胡钰老师先后发言。胡显章作总结讲话，他认为徐葆耕先生身上不仅体现出了对人民深切的爱，也兼备着澎湃昂扬的激情和理性严谨的光芒。他扎根在清华的学术历史和精神传承之中，将个人责任、清华历史和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身体力行地在教学和研究中诠释了“国家”和“责任”两个词的含义。（新闻学院）

## ● 诗词书画选登

## 秋日的荷塘

○冯弘伟（1988级汽车）

秋的入场，  
是告别夏季的荷塘。  
比如留下一朵荷花张望，  
比如洒满荒岛凉爽的晨光。  
曾经无数次徜徉，  
年少的初吻和成长的忧伤。  
比如在最漫长的夜晚等待天亮，  
比如在西山的秋叶采集凝望。  
你偶然驻足，在远方，  
等着我来，把思念刻在岸上。  
比如把田田的叶子摘下来埋葬，  
比如渐渐把相守当作了流浪。  
今昔九月，  
风却吹散了那些夜的霓裳。  
我饮尽盛夏的琼浆，  
也带走了秋日的荷塘。

## 为杨倩奥运首金题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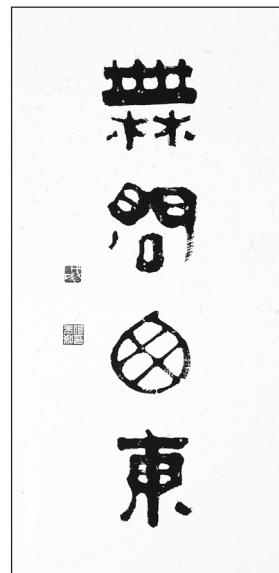
○李同振（1970届工化）

首金斩获属谁人？出自清华学府门。  
智体双优何所以？抱枪逐梦早传闻！

书法

## 无问西东

○何玉如（一九六一届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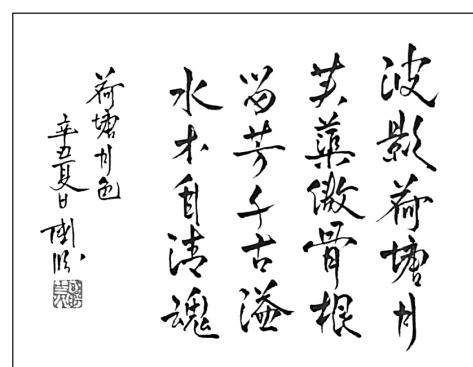


## 花开奥运

○易松孟（1991级力学）

非是无情忘相约，昨夜君来闭疏扉。  
不畏酷暑几度开，三伏优昙胜冬梅。  
为报一现喜相迎，扫榻虚席藏耕耒。  
忽闻奥运捷报传，欢饮大醉卧残杯。

8月1日夜，东京奥运，苏炳添百米决赛，欣喜酒醉。是夜，小院昙花盛开，忘观，晨起，作此篇。



诗词书法 ○袁国盼（1970届土建）

## 沁园春·登零零阁抒怀

○雷源忠（1970届汽车）

零字高阁，座落华园，远眺众山。看昆明湖水，波光荡漾；圆明遗迹，垣壁颓残。北靠幽燕，东连沧海，万里长城锦带缠。长天阔，任云舒云卷，意上毫端。

遥思入校当年，正日夜辛勤筑梦酣。却风波骤起，黉门中断；春风又沐，理想重圆。十载研读，八千路远，漫漫人生无惧难。抒慷慨，幸韶华未负，自在桃源。

## 清华二号楼忆

○张云贵（1970级建工）

位序礼堂书馆后，经风历雨几春秋。  
屋头仿古挑檐美，绿树掩迷红壁幽。  
布道频频大师影，求知殷殷学生稠。  
四年苦读终难忘，夜夜魂牵二号楼。

## 浪淘沙·郑州

○高国龙（2009—2011博士后，环境）

大雨倾中原，奔洪滔天，商都街巷可行船。苍茫昼夜仍不休，极为惊险。

逢此危难时，何能心安？八方同胞越千山。华夏神州志成城，亿手相牵。



油画 胜因院 ○吴正毅（1961届精仪）

## 荷塘暑晨

○金 峰（1982级水利）

夜阑细雨浥轻尘，仲夏清风拂碧粼。  
幽径蝉鸣欢跃鹊，潺溪垂柳伴词人。

## 七律·赞神州奥运健儿 (平水韵)

○魏赠应（1962届土木）

东京大赛九州优，获奖健儿心愿酬。  
共得金牌居二位，光荣时刻喜抬头。  
国旗升起耀华夏，禹域奋争惊五洲。  
体育强身民富寿，安康事业众歌讴。

## 七律·立秋感怀 (平水韵)

○魏赠应（1962届土木）

四季白驹轮过隙，冬春夏去快来秋。  
自然规律难违背，世上苍生莫感愁。  
珍惜时光比金贵，亚康身体静心修。  
闲情逸致诗词赋，耄耋自寻其乐稠。

# 今日清华

▶ “师生夜话”教师节特别活动在西大操场举行



▲ 清华积极参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图为以清华美院曾成钢教授为主创的雕塑《伟业》



▲ 清华大学举办杨倩、史梦瑶东京奥运会凯旋欢迎会



▲ 六百余清华师生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志愿服务工作

# 清华大学第 23 次校友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9月11—12日，清华大学第23次校友工作会议在辽宁沈阳召开，清华校友助力沈阳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三届清华校友创新论坛同期举行。200余位来自海内外校友会、院系分会、专业委员会等校友组织负责人以及产学研各领域校友代表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活动。



▲党委书记  
陈旭讲话



▲校友总会副会长  
史宗恺致辞



▲校友总会副会长韩景阳  
主持大会上半场



▲校友总会副会长王岩  
主持大会下半场



▲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作工作报告



▲校友总会副会长袁驷（左）向沈阳校友会颁发大会承办纪念牌



▲主题对话“无体育，不清华”



▲主题对话“有校友，更清华”



▲沈阳校友艺术团精彩演出



◀ 清华校友助力沈阳  
高质量发展大会暨  
第三届清华校友创  
新论坛现场



▲ 沈阳市与清华大学合作的创新项目签约仪式



▲ “校友同跑接力，赓续百十华章”活动



▲ 东北地区清华校友座谈会



▲ 与会人员合影



▶ 陈旭、过勇赴广西出席选调生座谈会并看望慰问校友



▲ 常务副校长王希勤赴新疆访问并看望慰问校友



▲ “清华校友导师计划（职业指导）”启动会举行

▶ 清华校友总会召开第八届理事会2021年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



◀ “清华校友君子文化传承发展项目”签约仪式暨项目共建座谈会举行



▲ 王晓滨校友捐赠支持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藏发展



▲ 清华大学汽车芯片设计及产业应用研讨会上校友论坛成功举办



► “清华情 津沽行”校友座谈会在天津举行



▲ 2021届本科生校友年级理事聘任大会举行



◀ 校友总会赴江西赣州开展党史学习实践系列活动

##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 瑞士校友会组织  
夏季徒步活动



▲ 美国威斯康星校友会举办2021年秋季  
迎新活动



▶ 黑龙江校友会陪同张甲洲后代张红旗  
走访巴彦缅怀先烈



▲ 贵州校友会看望驻村  
校友，助力乡村教育  
振兴



◀ 东莞校友会举办老校  
友中秋茶话会

##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海南校友会开展情系山乡公益助学活动



▲河南校友会联合校友及校友企业驰援河南  
灾后重建



▲天津校友会举办2021级清华天津新生座谈会



▶无锡校友会庆  
祝母校110周  
年华诞、校友  
会成立40周年



▶赣州校友召开  
2021年送新会

##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 佛山校友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 浙江校友会庆祝母校建校110周年暨2021年会举行



◀ 平顶山校友会  
举行换届大会



▲ 湖北校友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



▲ 上海校友会庆祝母校建校110周年并举行2021年会